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六號

民國紀元前八年創刊　※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第六號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發行

最後勝利與永久和平的關鍵……余協中（一）
和議按脈者……張君勱（三）
邱吉爾氏與陳德勒氏對德日戰略之爭辯……張君勱（六）
邱吉爾組閣三年來英美合作之進展……陳玉祥（九）
科學管理與國防……王雲五（一五）
德日一定夾擊蘇聯……龔德柏（二一）
戰後處置日本的根本問題……李毓田（二二）
中國「人本主義」之宗教及其典禮……程石泉（二四）
再論中國人的組織力……范任（三四）
印度文化東傳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之影響……陳安仁（三八）
說「不均」與「不安」……唐鉞（四六）
五月星座神話……陳遵嬀（四八）
新型炸藥發明的可能性……曾昭掄（五〇）
安南國王陳日煚考……黎正甫（五一）
緇雲游草……朱偰（五五）
詩與近代生活……楊振聲（五七）
「天府之國」……姜蘊剛（五八）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主辦三十一年度三民主義論文競賽啓事

題目（一）我爲什麽信仰三民主義（應將三民主義與其他各種思想學說作比較分析之研究）（二）三民主義與戰後世界之建設（敍述三民主義對於戰後世界建設之指導作用及其努力方法）（三）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圖案（敍述三民主義建國方案及其進行步驟）

獎金（一）最優等一名獎金三千元（二）優等一名獎金二千元（三）甲等三名各得獎金一千元（四）乙等五名各得獎金五百元

附註（一）應徵論文者不拘資格及學歷惟須於稿末詳細註明姓名籍貫性別年齡學歷經歷著述（或論文）及詳細通訊處如爲黨員團員并須註明入黨入團年月日及黨證團證字號（二）應徵者每人限作一題論文字數以一萬字至一萬五千字爲度（三）應徵論文文體不拘惟須繕寫淸楚并加新式標點（四）應徵論文七月底截止接收外埠以郵戳爲憑九月一日公佈結果（五）應徵論文請掛號郵寄『重慶羊子壩十八號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并須在信封上註明「應徵文稿」字樣

最後勝利與永久和平的關鍵

余協中

中日之戰已入第六年，歐洲之戰已入第四年，世界全面之戰亦已已入第二年。就整個局勢講，同盟已由守勢而改取攻勢，由敗局而變爲勝局。同盟方面上自政府下至人民，此刻皆具勝利的信心，勝利的徵兆確已十分的明顯——蘇聯的冬季戰果，英美掃蕩北非，美在西南太平洋初步的攻勢的成功，英美龐大的軍需生産——我們只靜看勝利的逐步實現。不過，晴朗的天空總不免常有黑雲片片，忽隱忽現，這雖然不一定是風雨的先兆，但此種黑雲如永不消散，則風雨之來臨，亦非絕不可能。

軸心國自純軍事觀點言之，已走上絕對失敗的途徑。德義在北非的勢力眼看要被肅清，德國在蘇聯的夏季攻勢事實上恐難如過去的有效，日本在太平洋上不特不能再逞，而且是逐步後退。她們在這種情勢下，惟一的希望，是同盟國家的分裂。謠傳日本曾經夢想，也許現在還企圖使德蘇停戰，德國老不忘情於散佈謠言離間英蘇或美蘇的關係，同時，同盟國家方面當局的言論又常使不明內幕的情形者以可疑之機，例如，數週前美駐蘇大使之談話，三月二十一日邱吉爾首相之廣播，戴高樂與吉羅德團結之波折，以及若干國政府當局的某國與某國間關係不變之聲明，均使抱勝利希望之局外人物爲之不安。如果這些言論與聲明都是水上的浮泡，緜任何痕迹，我們自然爲同盟國慶幸，倘萬一有絲毫芥蒂存於其間，那不僅是目前戰爭期中之最大的危機，亦將爲戰爭結束後和平的障礙。

目前同盟國的缺點，乃是到現在止，在行動上缺乏一致的步驟，在精神上亦缺乏良好的諒解。先就軍事說，上次世界大戰尙有聯軍總司令統一軍事上的指揮，乃此次全面戰爭已逾二年，同盟國家尙無統一軍事的機構，致令北非戰場有一總司令，西南太平洋有一總司令，印度亦有一總司令，中國戰場設一統帥，蘇聯方面則單獨與德國作戰。很顯然的，北非是英美聯合的戰場，受兩國聯合節制，西南太平洋由美國負責，印度由英國負責，蘇聯戰場則爲另一單位。因爲英美的密切合作，北非緊急尙可向印度借兵，西南太平洋與印度間亦可通融，但這只是臨時的合作，而不是由於軍事上的統籌。至於中國戰場因與其他戰場相距較遠，如有所需要則必須向他方呼籲，能否得到所希望的反應則胥視他方面的情形。蘇聯作戰最烈時，不僅蘇聯盼西歐能開闢第二戰場，即英美人民亦均有此呼聲，這尤是軍事不統一的顯明的象徵。幸而斯太林格勒一役蘇聯獲得最後勝利，致令德國不僅無法結束東線軍事，而且要抽調西歐的軍隊增援東線，造成了對同盟有利的局勢。第一次大戰時，德國在法國進攻最猛烈之時，俄國在東方發動攻勢，迫使興登堡抽調西線之兵對俄，俄國雖敗，但救了法國的危局，對於整個戰局則反爲有利，同盟方面對於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之遲遲不能實現，自然是由於事實上的困難，但在蘇聯最緊急之時，同盟在西方任何動作均與蘇聯有利。幸而北非的攻勢，終於在去年十一月初發動，雖爲時稍晚，對蘇聯仍有莫大助益。不過這種合作究趕不上統一軍事的指揮的有效。

關於戰場的偏重偏輕與孰先孰後的問題，亦可以看出同盟國家在軍事上意見不能完全一致，最近邱吉爾的廣播不僅在中國方面引起種種批評，即在美國方面亦引起不同的解釋。目前是否應集中兵力先擊潰歐洲的軸心，抑應同時進攻日本，各同盟國間似尙無一致的見解。自英國立場說，歐洲的軸心威脅英國本部的安全，解救本國自比較收

復興地為重要。中國一向無任何偏輕的主張，雖希望同盟國對日本早日進攻，並不主張對歐洲的軸心放棄壓力，若以為歐洲的軸心較日本為重要，亦非中國所能同意。美國官方及輿論的表示對此問題似無一致的見解，然而事實上美國的人力與軍火運到歐洲戰場的較運到太平洋與亞洲戰場的為多。由空中運軍火到中國固不無若干困難，但日本駐緬甸軍力據說並不雄厚，而對緬甸的反攻又未能早日開始，在中國方面似亦難感到滿意。其實凡此種種問題都可由同盟國共同磋商而得到合理的解決。集各國的代表於一堂從事各種問題的實際的檢討，利害兼顧，輕重要權衡，如此得來的方案似比較能使人折服。同盟中任何一個國家的元首或負責當局對於共同的軍略或政略最好不必公開單獨發表意見，因為該項意見倘聽任何一國提出之，必難免過於主觀。有了一種統一的機構決定共同的策略，這類個別的宣言既不需要，又可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糾紛或不快之感。

其次就精神上說，同盟與軸心兩個陣線業已顯明，在理論上，蘇聯無論如何不能與日本繼續友好的關係，尤其是蘇聯在遠東的領土為進攻日本本部與東三省不可少的基地。依照同盟國家的軍備生產與人力，擊敗日本，原非難事，但目前的困難乃是日本所處的地理的形勢特別有利，自中途島西行以至日本本土，沿途島嶼均經日本設防，以海軍進攻日本殊為不易，自阿拉斯加以達日本，終年多霧，海軍行動更加上一層困難。空軍轟炸日本，以基地太遠，犧牲大而收效較小，只有利用蘇聯在遠東的基地對日本進攻，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然而，事實上蘇聯一方面與德國角逐於西線時，還與德國的盟國日本維持友好關係，這雖然是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究竟是同盟國陣中一個很可惋惜之事。蘇聯單獨亦不能負此責任。

再如戴高樂與吉羅德間的關係，原不應引起外間的議論，涉及英美的團結，但是由於戴高樂一向受英方的協助，吉羅德與美國的關係較深，便生出英美各支持法國的一派的流言。最近戴高樂欲訪問吉羅德於北非，經艾思豪威爾之勸阻而止。亦有對此發生誤會者，其實北非戰爭，正當緊張之際，非討論政治之時，艾思豪威爾將軍之勸阻亦為極自然之事。錯誤是在關於此類政治問題同盟國家應早作討論，法國的統一當然不成問題，問題是在如何促成法國的統一。同盟國間如對此曾作澈底的商討，即不會發生戴高樂赴北非而遭勸阻之事。

以上所舉的數例不過在說明同盟國間行動上的一致與精神上的融洽尚未臻理想的境域，並非說這幾件事本身有何特殊的嚴重性，足以影響同盟國相互的關係。現在我們的敵人——軸心與日本——不僅是日夜祈求而且是百計千方的要促成同盟國的分裂，因為除此以外，他們便無其他可僥倖之路。「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同盟國間如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則敵人一切的希望終成泡影，一切的計劃均是白費心思。同盟國家間此刻應當捫心自問在精誠團結方面是否尚有缺憾，倘對於此點尚無堅定的自信心，則吾人最後勝利的信念的基礎仍不能稱為十分穩固。同盟國如萬一再不肯完全捐棄私念，戰事敗固然是玉石俱焚，即戰勝亦未可樂觀，因為在此種情形下，很可能的，戰事甫告結束，同盟國間又要發生裂痕，如此，不是同盟國本身分成壁壘，預備另一次大戰，即是軸心國家要利用同盟的不一致而圖苟延和平，或彼或此，均是使這次戰爭的犧牲成為毫無意義。

歷史已給予吾人以充分的教訓，那便是國與國間或私人與私人間倘不能彼此開誠佈公，則絕難相親相愛，融成一體。同時人類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又皆愛好和平，不願相互殘殺，故每一次戰爭以後，必有一次和平的努力，但此項努力，迄無一次成功。拿破崙敗後，英奧與俄普馬上成了對壘的集團，一九一八年德國敗後，英國與法比馬上背道而馳，吾人最大的矛盾即在乎此：一方面愛好和平，另一方面卻同戰爭之途邁進。在戰爭時，我們怕見屠殺的殘酷，破壞的普遍，與夫生活的痛苦，很自然的，此時我們要想到如何制止戰爭，這一次大戰爆發後，各國討論戰後和平的狂熱已達頂點，這自然是一種良好的現象，但是我們的覺悟如還不是澈底的，或者說是一時的衝動，恐怕戰爭一經過去，我們又要回到勾心鬥角的場合，如此，我們只好坐看這

□□□所犧牲的生命與耗費的金錢成爲毫無代價。一□□□並不是沒有任何憑證足以指出同盟間真有什麼不一致之處，不過，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訓太多了，簡直要使人疑心人類是永遠不能接受過去的教訓，歷史上的戰爭似已成了一種不規則的循環，多則數十年，少則數年，總有戰爭發生，過去的戰爭尚且限於一隅，現在的戰爭則輒波及全球。這些戰爭並不是絕對不可避免，乃是避之不得其道，或知其道而缺乏遠見不肯實行。上舉數事至少可以說是同盟國間的合作尚未達於理想的象徵。如果戰爭期內團結尚不能臻於理想之境，則何望戰後之合作能臻於精誠，實際上，同盟國間的合作本無多大問題，彼此亦無隔閡，但到現在止，同盟國間在軍事與政治兩方均無統一的機構以求步驟之一致，同時在言論上時現出意見分歧之痕跡，與關於□□之聲明，致令盟國一部份人士不能不感覺關切。春秋責備賢者，筆者只望同盟國的合作能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勝利業已在望，絲毫不容疏忽。只有精誠團結，才能保最後勝利之果實，只有精誠團結，才能期永久和平之實現。

和議按脈者

張君勱

自希特勒失敗於蘇俄，德意聯軍受創於北非，時有各方流傳，有所謂歐洲和議之說；如云齊亞諾之被派爲教廷大使，所以爲將來乞和之地，如西班牙外交部長佐丹納有願意周旋於各國間，促成和局之宣言。此非平和將屆之謂也，亦非議和之謂也，特和議之試探耳。以歐洲之術語名之，曰「和議按脈者」(Peace feeler)。

戰局之進行也，勝敗之分已在旦夕，勝者自知其克敵之算如操左券，敗者亦自知其無力抵抗；處此局勢之下，所以結束戰事者，惟有敗之一造無條件的投降，而不必假手第三者提出和平條件周旋於兩造之間。反之，戰事已經相當年月，而勝敗尚無把握，兩造之一以爲與其勞師費財於長久歲月中，何如就可能條件之下，與敵言和？然正式乞和，令敵人疑我之勢窮力竭，常以本國私人，或第三國私人之言辭，先行試探，以察對方之反響如何，再斷酌情形，爲條件之磋商，有因初步之試探而繼續進行者，亦有因初步之失敗而中途停頓者。此所以有和議按脈者之舉，不得與和議和局混爲一談也。

第一次大戰之休戰條約，訂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然和議之暗中進行，已開始於一九一六年。是年十一月，戰局成膠着狀態，英內閣不管部閣員蘭司唐侯爵建議政府，研究和局可以成立之基礎條件。蘭侯爵提出建議一星期之後，奧國老皇約瑟斐迪世，新皇沙爾繼位，其登位詔書，有「我願盡力所及，以結束此戰爭之殘酷」之語。於是德人知奧之無意於持久戰，爲挽救計，向英法等提出和議條件，文中謂英法等倘不同意於此項條件，則德與奧惟有作戰迄於最後爲止。德人之所以爲此者，恐奧新皇別有企圖，乃以正式公文提出條件於敵國，則議而不成之局，可諉過於英法，而不應令德獨負其責矣。是時美處於中立地位，威爾遜總統見雙方有和議端倪，乃致書於交戰兩造，請雙方聲明其戰爭目的，以爲和議入門之初步工作。其後英法復文，謂此項目的惟有留待和議開始之日再行提出。於是此三方面公文往復二三月之久者，終於一無結果而止。奧新皇認爲英法所以無條件提出，殆由於內部意見不一之所致，乃於一九一七年二月託其皇后服役比軍中之兄弟錫克思德王爵聯絡，且得比王亞爾培之同意，提出和議條件如下：(一)奧國與俄國秘密休戰，(二)比國與阿爾撒司勞倫省還歸原主，

(三)合塞爾比，蒙的尼哥羅等以成一南斯拉夫王國。此條件傳至法總統濮因卡勒與法總理物里盎之手，認爲可爲商議之基礎，然不久而俄革命爆發，德人趾高氣揚，以爲勝利在望。錫克思德王爵既得法人首肯，由法返奧，告奧皇以法政府同意之態。五月，復去英，與英皇及勞合佐治會譚數次，留英及一月之久。雖勞合佐治深以和議爲然，而繼物里盎氏爲法總理之李薄氏持猶豫之態，而與外相宰爾寧氏亦懼德之壓迫，不敢高唱和議。錫王爵知全盤和局之無望，又重提向單獨媾和之議，英法亦以分離德奧爲得計，而贊同其議，時則德奧聯軍大挫意大利於卡白立都，於是英法以奧匈之言和爲詭計，而錫王爵之使命告終。及法國克蘭孟梭爲總理，持非戰勝不再言和之策，而英國因西線上與台爾一仗大敗於德，輿論反趨激昂，力持雪恥復仇之議，雖蘭侯爵將其一年前建議政府之文公諸報端，而英之各大報反目蘭氏爲助德張目之人矣。及美國既參戰，威爾遜十四點宣佈，於是波蘭捷克等國復活之議興，而奧匈皇國卒致覆亡。奧皇沙利早見及此，思所以挽救之者終於無所成就，而此種情態下所造成之歐洲，自爲另一結構，非復奧匈與英法德俄意對峙之舊局矣。

上文所敍述，非欲記載第一次大戰中非正式方面之和議進行也，亦非追溯舊事爲借鑑之資也。歐洲之國家視和議爲家常便飯，和而戰，戰而和，爲國際關係中之自然現象。在上次正式和議未開始之前，已有私人如錫克思德王爵者奔走於英法與德奧間，先行提示和議條件之先例。而自一九一六迄於一九一八，砲火相持猶且兩年之久。則今日德意與英美間，或在廣播電台上，言辭唱酬中，或經教廷使節口舌中，有和意之表示，自爲題中應有之義，而無足怪者。吾國人所當注意者，則此種種言辭酬答中，伏有一種離間之技是矣。試舉最近德意兩國之言以明之。

德國戈培爾之言曰：「我知英國報紙又將大叫，謂德國受窘於東戰場上，戈培爾氏派出其第一次之和議技壓者矣。諸君當知德國方面絕無此意。德國人中，不願聞糊塗了事之妥協。吾人深知所以使外國發生印象者，惟有勝利而已。」

戈氏於德國電台上又有表示曰：「假令全歐洲陷入鮑雪維戒之手，英美將何以處之。」

意大利發言人蓋達氏於意大利日報中之言曰：「假令和局不能即時成立，意大利惟有抗拒，以待英國對美債台之高築，以待英國商業之破壞，以待共產主義之蔓延。待至其時，意與英美乃能有妥協的議和，以言與蘇俄之間，則無和議可言。」

以上兩氏之言，謂其有議和之意乎，則戈氏明明自否認矣，謂其無議和之意乎，何必以共產主義之蔓延相恫嚇乎？以云蓋達氏之言，視戈氏已進一步，雖拒絕與俄和解，然願與英美言和之意，則已從自己口中明白言之，既與英美和矣，謂意將厲兵秣馬與俄對峙疆場之上，又誰信之？然戈氏蓋氏輩所以發此言論者，其用意究何在乎？曰此和議技壓者之技也。醫師診察病者之病，先按其脈息跳動之度數，以驗人體之強弱與氣血之充足與否，更藉病者所感之痛苦之問答，以定其病之在心在肺或在腸胃，而疾病之療治方法，亦由此診斷而定。戈培爾氏與蓋達氏雖有意於議和，而不敢明言議和，於是藉手於電台上之言詞，以窺敵人之反響。敵人之願否繼續犧牲，或願及早結束，敵人心中是否懼俄，是否願我之繼續拒俄，而停止其西線上之作戰，各同盟國內部意見是否一致，均可一一於此中見之。惟彼此言詞中，所可試探而得者若是其多，於是最近戈氏蓋氏等竭盡心力於此方面，而其主要的不外乎二：一曰試探各國國內之輿論而分裂之，二曰試探各盟國間之意見而分裂之而已。

各國輿論對於和議之見解，大致可分爲二：一曰死硬派，是爲主張非勝利不罷休之人，二曰遷就派，即視條件是否可容納而定戰爭應進應止之人。上次大戰之中，奧皇沙利之派遣密使，蘭司唐侯爵投函報紙明主議和，德國社會黨有不割地不賠款之議決案，法國前總理加郁氏與德人勾結以圖結束戰事，此皆所謂遷就派也。若克蘭孟梭，濮因卡勒與德國軍閥中不到黃河心不死之人，則所謂死硬派也。此次

歐美交戰國中，孰爲死硬派，孰爲遷就派，尚未形諸表面，然在今日相持不下之局中，必有兩種不同見解，一派曰堅持到底，他一派曰及早結束，此二者之對峙，可以斷言。惟其有此兩派，德意方面，自必竭其技巧以誘引英美兩國中可以爲蘭司唐侯爵或加郁氏之繼起人者，出而主張和議，在英美內部將形成和戰兩派，而作戰心力因以削弱。此在德意即令和議不開，或議而不成，已有所得如此；萬一議而果成，有姑息派左右其間，以維持德意現狀，而原政府聽其存留，則德意即令退還其占領地，而實力依然保存，可以爲異日捲土重來之計。此戈氏輩所欲達之目的一也。

中英美蘇號稱同盟國，然其彼此之見解與利害，原不一致。其最大衝突莫過於蘇俄之共產主義與英美之資本主義。此次之戰，假令因蘇俄在東線上之力戰，而德國因而馴伏，則西歐方面必有慮蘇俄勢力之日張與第三國際之鼓煽各國革命者，將蔓延而不知所止。此在慕尼黑會議之前，英法政界中懷此疑懼心理者已不乏人，今戈氏復從而誘發之，且詔之曰全歐陷入蘇俄手中，於君等復有何利，不啻去一大敵而又來一大敵也。苟一英美較異於俄勝德勝之利害，而有意保存德國實力，與俄相抗之爲得，則同盟國聯合之局勢，將因而一變，或蘇俄脫離同盟，或英美強迫蘇俄遷就和議，則戈氏之計獲售矣。各國利害之不一，又寧止此一端而已，就英美言之，美國練兵千萬，製造飛機年以五六萬計，坦克與大砲不可勝計，謂美人之爲此，專爲仗義執言，而一無所求乎？殆不然矣。夫亦曰求得一較善之世界秩序，以期長享和平之幸福。故在英美間必起之問題，曰未來之世界組織如何，曰殖民地之統治如何，曰戰後歐洲各國如法如意如波之處置如何，曰國際商業政策與貨幣本位如何，此種種者如因一事之牽動而生對德和戰方針之異同，則軸心國可因此大施其離間之技，而鬆解盟國間一致之努力。此戈氏輩所欲達之目的二也。

凡此軸心國之伎倆，盟國早已窺見於先，故英之與俄，已訂二十年同盟之約，英美於卡港會議有無條件的投降之定案，皆所以防止協議形式下之不一致之爲敵所利用也。敵人雖明知之，然蹈瑕抵隙之心一日不死，則口舌之簧鼓一日不止，謂爲和平攻勢可也，謂爲離間之技可也，要其去停戰之日猶甚遠耳。戰事之結束，猶之懸崖轉石不達地不止。此吾國人所當痛切覺悟者也。

抑軸心國所以施其惑人之技，以謀其國家地位之保存者如此，而吾國與之爲敵者則如何？凡國家之戰也，歷時愈久者，則力之消耗愈多，公私兩方人力物力之損失不知其幾何。善治國者注意於持久作戰之能力，軍心也，民心也，兵力也，財力也，人力也，物力也，皆抗戰久暫所繫之關鍵。倘有萬一之失，則數年之辛勞毀於一旦，如一九一七年俄國之退出戰局，如一九四〇年法國之單獨媾和，其彰彰較著者也。不獨一國之內治因而瓦解，以言乎外，爲友邦所共棄。巴黎和會席上誰復爲當年之俄國代表其利益而爲之辯護者乎？今後法國之能否恢復，亦視吉羅德與戴高樂之代表戰鬪法國者能否建立奇功，取得英法同等地位而決耳。國家之內力充實者，自能不惑於外界之謠言，善自鎮定，且有持久之計畫，即在和會既開之日，奮有餘力，爲外人所敬畏，以至淪陷區之恢復，失土之重建，皆有綽綽有餘之人才資力以爲之，能如是者，斯之謂最後勝利。

三十二年四月三十一日

邱吉爾氏與陳德勒氏對德日戰略之爭辯

張君勱

二次大戰以來，英相邱吉爾氏之赴美，此為第三次。其在美國國會演辭中有一名句曰『日本之戰敗未必為德國之戰敗，』而德國之戰敗，斷然為日本之戰敗。』邱氏之希特勒第一主義，曾不因北非戰爭之結束而稍變也。其將邱氏觀點根本推翻之參議院議員軍事委員會會長陳德勒之言曰『如吾人先攻日本，則戰爭可以早日結束，反之而先攻德國，則戰爭永不能結束。』可謂與邱氏針鋒相對者矣。戰略上應下手之處，德國第一乎，日本第一乎，不獨邱陳二氏之所爭，亦即中英兩國之所爭。再推廣言之，英俄所持者為德國第一主義，以地理上與德國相較近故也；吾國所持者，為日本第一主義，以吾國在地理上與日本較近故也。至於美國，則介於二者之間，在今日以前，重於英國在遠東澳洲接近遠東形勢之危迫，故派遣大軍至英至北非，以分英國之勞，然今日以後，漸分多少兵機以對付日本，援助中國，與加強南太平洋之攻勢，雖未由德國第一，而趨於日本第一，然於二者之結構，以德國為第一主義，則稍變矣。然邱氏假不以此為原則為然，乃有此次對陳德勒氏方辯之言。邱氏是乎，陳氏是乎，宜本中心所發為之考察者也。

一　德敗未必即為日敗

考之歐洲歷次戰史，其對敵之兩造，常以若干國聯合而成，所以成為甲造者，為甲乙丙丁等國，所以成為乙造者亦復如是。然而同造之中之大國，不限於一，而戰略上每生意見之紛歧。上次大戰中一造為德奧，一造為英法俄意，自德奧言之，德所急圖解決者曰法國，而與心目中所認為大敵者為帝俄，其在西歐之英法，以牽制德國為先，而與次之。自此次戰爭言之，一造為德意，其後來加入者為日本，他一造為英法，其後來加入為蘇俄，為美國，兩造中之國家，既不限於一，而聯合國中所含國家之數尤多，自然甲乙丙等國所認為應解決之敵，不無先後之異。軸心中之意大利，曰先英而後俄，德國於一九四〇年，頗有先解決英法之決心，今則對俄對英美頗有不暇兼顧之苦。同盟國方面之英曰：應先德而後日，蘇俄於去年英人攻非之日，大聲疾呼第二戰場之開闢，亦以對德為先務也。其在東方之中國，自以肘腋之旁之日本為大敵。至於美國，超於歐亞之外，而位於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同情於英國之故，常以希特勒為應先解決之敵，又以日本襲擊珍珠港與逼近澳洲之故，對日本之注意絕未稍怠，因此各國觀點之各異，而戰略上意見之分歧起矣。然同為敵國，而地理上各自東西，所以解決之者，只能在數量上時間上略定其輕重先後之分。以云甲敵既倒，則乙敵隨之而倒，除其地理上互相接壤如昔日之德奧，今日之德意外，恐未必能相互影響如此其甚也。譬之一九一七年，帝俄之敗，未必即為英法之敗，及夫主力之德既敗於西，則奧保土之處於東者，不能不望風而潰，良以德奧等四國同處一隅，故甲敗而乙隨之，假定英法天各一方，故帝俄雖敗，而無以制英法之終勝，此即地理上遠近即為相互影響有無之所由決也。由此義言之，德日相距之遠，豈甚於歐洲之帝俄與英法，帝俄之敗不能影響於英法，而謂歐洲德國之敗，能影響於日本乎？試問德有德之海陸空軍，日有日之海陸空軍，德有德之戰略，日有日之戰略，帝俄之所不能影響英法者，而謂今之德國能影響日本乎？德國之不能影響日本，亦即日本之不能影響德國，遑謂德人即敗，而日本之在遠東，單獨作戰自若也。

邱氏既知日本之敗斷然非即德國之敗，何以於德國之敗，獨予以甚高之估價，謂德敗即日敗乎？此吾人所以對於邱氏德國戰敗即爲日本戰敗之言，所以斷斷不敢苟同也。

凡此淺顯之理，以邱氏之老成，豈有不知之理，知之而猶爲此言者，則邱氏視德日兩國爲國力不等之大小兩敵，若英俄美先傾全力於德，大敵既倒，小敵之日本終亦隨之，至於日本位於遠東，國力不如德，英美即以全力攻日，亦難動搖德國之地位，則日敗之中，自難詩釋德敗之推論。此則邱氏立言之基礎，不外乎大敵小敵之比較而已。然以吾人觀之，日本之海軍合主力艦與重巡洋艦，日本十二隻，德國不過六隻，航空母艦，德僅二隻，日有七隻，驅逐艦日有百〇三隻，德有六十五，潛水艇據云德有四百，日本所有依一九四〇之統計，爲六十五隻。則日本海軍力之大於德顯然矣。以云人口之數，德爲八千萬，日本爲一萬萬，日德國動員人數同可達到一千萬人以上，即令機械化部隊，日視德稍遜，然日既以本國兵力用之遠東，更利用其朝鮮台灣東四省與淪陷區之壯丁，則日之陸軍力不必居德之下矣。以云飛機，日人每月製造之數在太平洋戰前爲二三百架，今則必有增加，自視德國之月出三千架者爲大遜，然日人所感之汽油缺乏，今已無之矣，東條內閣之中新設顧問若干人，專掌國防資源之增產，飛機與船隻之製造，自爲彼等竭全力以赴之者。中國方面機場既少，汽油又乏，彼以其現有之空軍，自足應付對於吾國之美國空軍，他日自美飛日之空襲果實現，則形勢又將一變矣。要之就海陸空三者比較之，除空軍較遜外，吾人不應視日本爲小敵而輕之，即令德敗，而日本仍有其單獨作戰之實力，彼且以至堅之決心，作至強之抵抗。即曰英美將合全力以對日，然陸軍之數爲海運所限制，空軍之數，受機場與汽油之限制，海軍英美處於勞師遠攻之地位，所以制日亦非易事。故兩軍交鋒之後，英美必恃其多數飛機對日城市加以轟炸，自在意中，然其必須費若干時日犧牲多少人力物力，而後能置日於死地，可斷言也。故吾人以爲德敗之後，尚須消耗實力以擊潰日本，猶之日敗之後，亦須消耗實力以擊潰德國，其情形等耳。此吾人所以深感邱氏德敗即日敗之言之難於成立及其前後兩語之自陷於矛盾而竟不自知也。

二　德日先後之戰略之利害比較

依邱氏立言之意，似乎有人主張聯合國之敵二，一德一日，攻德之際，以全力赴之，置日於不顧，攻日之際，以全力赴之，置德於不顧。然後之實際，未嘗有此種主張也。對德對日，雖中英兩國各有其先後輕重之主張，然決非主攻日者置德於不顧，更非主攻德者置日於不顧之謂也。試問日本於東亞之啓釁已垂七年，其與之壤地相接者，首爲中國，繼爲英美，中國既不能移師以攻德，自當先就其臥榻之旁之敵而攻之，英美兩方自不能袖手以澳洲與印度授之日人，故其在目前則援之以陸軍，在澳洲繼之以海空軍，使其不至擴張過甚，而成爲異日不可制服之敵。以云所用於德國之全力，則美國租借法案之物品，英得百分之六十八，俄占百分之二十九，雖謂合美英俄之全力，既用之於德，無不可矣。故就實際情形言之，邱氏所主張之德國第一之戰略，事實上已早實行，而無待於要求者矣。然邱氏此次遊美，所以與陳德勒有此一場爭辯者，其原因果何在歟？吾人可以答曰：吾人未參加羅邱兩氏之談話，自難於窺測其內容，然以意度之，則邱氏向美國提出對歐洲第二戰場上美國增派軍隊問題是矣。美國倘於第二戰場開闢之際，須增派陸軍，則軍火飛機之數，須重新分配，而海軍與船隻之噸位隨之而增。就反面言之，亦有一種可能之事，即美方希望英國於地中海暢通後，移英海軍力用之太平洋上以攻緬甸。此乃華盛頓戰略爭辯之所由起也。在邱氏之意曰，德國爲大敵，美誠能以全力助英，則德敗而日隨之。故各國之急務，在於對德，而他事次之。陳德勒氏駁之曰：『吾人須要求更多飛機，更多軍實給予太平洋方面，以免日本隱於鋼城之後，日富而日強。』陳氏又曰『日人以太平洋上之勝利爲滿意，且利用聯合國目前之有限的活動，益圖其自己地位之鞏

固—陳氏之意苟聯合國對日不急下手，則來日之禍，益滋蔓而不可收拾。然邱氏則以爲苟將飛機與軍實分配於太平洋上，則實力不集中，而德難於擊潰，乃發爲「德敗即日敗，日敗非德敗」之名言，而陳氏則報之以「先擊日則戰爭早了，先擊德則戰爭永無了期」之駁語也。

吾人認爲德日兩敵，既在兩洲，故德日之敗，不生彼此間之影響，已如上所云云矣。然吾人不妨將邱氏陳氏之言加之研究，以窺其所以立言之根據。試屈指數之，則爲下表：

第一、「德國第一」戰略之利害

甲、北非戰爭結束，宜以空軍轟炸德意，再以強大陸軍繼之，以竟全功。

乙、俄在東歐，英美在西南歐或土耳其參加，對德意造成一大包圍之局，倘美能再以強大陸軍助之，則所以圍德而困之者益易。

丙、以全力攻德，可以減輕蘇俄以擔負。

丁、被占領地之民處倒懸之勢，急待解放，可以利用。

戊、德國將敗之際，蘇俄或者對日宣戰，則更易以羣策羣力解決日本。

已、就害言之，倘美以大部力量對德，則美之全力，盡爲英國對德之功，忘其自身之敵。即曰英有他日傾國力以對日之諾言，然日人之實力日益坐大而難制。

第二、「日本第一」戰略之利害：

甲、德國何時解決不可知，而日本憑藉其南洋新得之資源，加以開發，其國力日益雄厚。

乙、德國即令戰敗，日本遠在東亞，相互間無影響可言，既如上述，此時英美不急圖之，則爲養癰貽患，何如及早毀其工業耗其資力之爲得。

丙、日本新得之資源如汽油、橡皮、米與鐵，視德爲豐富，可謂德之資源有限，而日之資源無窮，今日宜加力於難攻者，不必急急於易攻者。

丁、此時加強中國緬甸與南太平洋之攻擊力，可以維持中國之勇氣與抵抗力。

戊、就害言之，美國軍力，用之以增強太平洋方面，則美國派至歐洲之軍力因而減少。

以上所舉利害兩方，爲吾人平情論事之比較，初不類邱氏德敗即日敗之側重一面之言，亦不同於陳氏先攻德國則戰事永不結束之悲觀論也。今雙方所爭者非攻德而不顧日之謂，亦非攻日而不顧德之謂，乃僅爲應否加派飛機，以轟炸日本，增加對華援助以強化中國之作戰力，克復緬甸以通中國之運道，此於中英美三方同爲有利之舉，而邱氏必欲高唱德敗即日敗，日敗非德敗之言，以壓倒陳氏與美國注重太平洋之軍事家，誠不知其何故矣。

陳德勸之立場，表面上似與邱氏相對立，實其心所欲言者，不過曰加強太平洋方面之攻擊力而已，初非視攻德之計爲緩圖也。太平洋戰爭之開始已逾二年，最近一年有半中，除南太平洋海空軍之接觸與中國方面之應付外，無大戰事可言。日本政府聚精會神於資源之開發，如煤鐵增產，如米穀貯藏，如飛機製造，如船隻添置，無一不晝夜不舍以圖之，近聞其鎗砲改良若干事，空軍亦有新發明，爲適應船隻之少，與運輸之累計，乃有貫通亞陸以達於新加坡之計劃，因而濾口地道已着手開鑿，洞庭湖之進攻，安知非爲湘桂鐵路之奪取。試問此各種計劃完成之日，中國恢復失地之困難，將增若干倍，英美所以懲創日本者，將延長若干時，此則陳氏曰日對日進攻之主張，所以不容稍緩須臾也。

三　盟國新方針與吾國之準備

此次美京經此一場爭辯，與羅邱譚話之後，其歸宿處如何，曰以吾人觀之，「德國第一」戰略絕未動搖。中央社二十四日倫敦專電列舉四項，爲洞中肯綮之言：(一)晝夜不息轟炸德國，(二)向歐陸多處

遣攻，以建立立足地，並刺探敵人兵力；(三)向意大利猛炸，並進攻意大利本土；(四)在東地中海與巴爾幹發動海陸戰爭。此四者殆卡港會議席上之原議也。然此次華盛頓會商，經陳氏等之力爭，關於太平洋方面，亦有若干新決定。二十五日合衆社電記邱氏譚話，有下列之語：(一)彼與羅斯福已就太平洋上加強作戰，或立健全與圓滿之結論；(二)增強對日之戰爲英美參謀部長會談主要目的之一；(三)聯合國之資源已大見擴充，如能照目前情況繼續發展，必能以同等兵力，對日本及歐洲兩戰場作戰。而中央社華盛頓電二十五日專電記羅斯福之言，尤爲用顯：(一)重開滇緬路爲我軍戰略目標之一；(二)增強對中國之援助；(三)美國駐華空軍正從事擴充。吾人試將以上兩氏報告較今年二月十一日卡港會議後邱氏在英國國會中之演辭，『英國與美國之戰略家有一一致決議，卽德國之戰敗必須優先於對日之猛攻』云云，可知戰略重點之移動爲何如。

自太平洋戰爭以來，吾人延頸以待盟國者已二年有半。始以爲東京之轟炸，可以連續不斷者，孰知一次之後而寂然矣，所望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與人庚長挈短者，孰知其大部戰艦竟在珍珠港之役遭受損失矣。香港、新加坡、菲律濱、緬甸、荷屬印度陷落之耗絡繹而至，令人神魂爲之不安。及乎中途島之勝利傳來，又以日人之被擒於瓜島，於是日本實力之達於極限，稍爲外人所窺見矣。此時期中，美國全力在於對德，在於增加生產，在於保持地中海之運道，在於防制大西洋上之潛艇，其不暇兼顧遠東，自爲吾國人所深諒者也。今則邱氏與羅氏已明言加強對日作戰：(一)重開緬甸路；(二)擴充駐華美國空軍；(三)增加援華物資。吾人所希望之外援，將一一實現，而吾國自身之準備齊全否乎？(一)英國開始攻緬之日，吾國有遠征軍多少師能與之合作；(二)吾國有事於緬甸之日，敵人在後方湘鄂之進攻是否足爲妨礙；(三)緬甸運道通後，重武器將源源而來，新國防軍之訓練如何；(四)收復失地之參謀計劃如何，應否沿江而下，先取武漢，或分兵北上，以攻晉豫冀魯；(五)淪陷區之民衆應如何發動，令其與正規軍相呼應；(六)淪陷區收復之日，民事方面善後事宜如何。此種種，必求與英美太平洋戰略相配合，而後雪恥復仇，乃能如期以償所願。英報之言曰『美有珍港之仇當報，英亦有新加坡之恥宜雪。』彼等對於殖民地之恥辱，尙能念念勿忘，而必求有以蕩滌之，則吾國四千年祖宗相傳之遺產淪於敵手，其延至十年以上者有東四省，自七七以來計之，則各省中有全陷者，如河北、山東、江蘇，亦有一部分陷入敵手者如浙江、福建、廣東、江西、湖南、湖北等。吾國人之應發憤爲雄以圖疆土之破而復完者，宜何如乎？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邱吉爾組閣三年來英美合作之進展

陳玉祥

三年前英法同盟軍在挪威的失利，盟國輿論沸騰，英國下院辯論，英首相張伯倫至此不得不退避賢路。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張伯倫在唐甯街對人民作最後一次的廣播，說道：「往者已矣！今後吾人應採取積極行動，以恢復威信，而爭取最後之勝利。……今決於今晚

覲見英王，提出辭職，英王將授命余之朋友及同僚邱吉爾另組新閣，新閣任以全國一致爲基礎，余絕信邱君必可成功無疑。……」

張伯倫辭職以後，英王即授命邱吉爾組閣，邱氏奉命，於五月十一日組成戰時內閣。想當年張伯倫任相三年，（一九三七年五月——一九四〇年五月，但邱內閣內張伯倫仍爲閣員，直至同年十月因病退休。）他的綏靖政策，蓋棺論定，是非已有公論。邱吉爾雄才大略，組閣以來，至本年五月十一日亦已三年，在這三年之中，戰局不變，同盟國家的合作日見密切，而英美以同文同種，其互助更見親切；當此邱吉爾首相組閣已屆三年，盟軍合作已入重要階段之際，容將三年來英美合作之進展作一鳥瞰，而寄希望於所有同盟國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加強盟誼，鞏固團結，共同奮鬥，爭取勝利，幸甚。

當歐戰一開始，美國政府雖然就宣言中立，可是不多時又毅然決然地行使了「現購自運」的親英反德的新中立法。意大利參戰，法國敗北，英法內閣改組，邱吉爾上台，英國陷於單獨作戰正在危急之際，羅斯福總統使從反對黨的共和黨陣營中拉出來素以親英派「國際干涉主義者」馳名的富於政治經歷者——史汀生、諾克斯兩氏而使之就任陸海軍部長要職，計議樹立強化對英援助的全國一致體制。羅斯福總統屢次的演講，把美國援助英國的必需理由講得很透徹，他一次次的說明，自從美國建國以來，美國所遭遇的危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英國一旦崩潰，軸心國家將統治歐亞非澳以及全世界的海空，到了那個時候，美國國民的生活，均將暴露於軸心國家的巨炮之前，而這些炮，都裝滿爆炸的彈丸，有的是經濟性的，有的是軍事性的，他們所提倡的歐亞新秩序，只是企圖奴役人類的卑鄙的強權與金錢的聯盟。美國將來的安全，大半依賴這一次戰爭的結果。美國必須爲民主主義國家的兵工廠；美國的對英援助，決不由獨裁者的威脅而受有影響。軸心國家是絕不會勝利的。我們（羅斯福自稱）更有下列希望：勝利的希望，和平的希望，擁護民主主義文明的希望，在將來建立起更進步的世界的希望。因此，雖然美國尚未參戰，羅斯福總統已一再要求美國國民要團結一致，有如已臨戰時一樣犧牲的決心，爲擁護民主主義而增加軍需生產，並且相信共同奮鬥，一定可以獲到成就。

羅斯福總統強調援助爲保護民主主義而戰爭的英國，漸博得朝野的贊助，在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間，那時英國隨時有被閃擊之虞，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且已聲言，必欲擊潰英國以爲快，並更進一步宣言，對於所謂「墮落之民主國家」，永持敵意。此時美國凡具有正義感的上下人士均一致主張美國應在可能範圍內力予英國以物質上的援助，道義上的聲援已不夠，必須實踐具體的幫助，總之，美國人民應爲永遠自由而奮鬥。

到美加聯防和英美海軍協定的訂立，英美合作於是有了進一步的表現。美加聯防聲明發表於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八日，其主要意義當然是美加兩國共同保護新世界以防受地球他部的戰禍延到美加。英美海軍協定則於同年九月二日在華盛頓正式簽字，協定的要旨，大略是說英國政府鑒於英美兩國之基本友誼，及英國對美國安全之關切，以及英國之願與美洲其他國家加強有效合作之能力以保衛西半球起見，英國政府願允許即以西半球英國在大西洋上的領土，租給美國九十九年，不取債價，而美國則以驅逐艦五十艘轉讓給英國。

英美海軍協定的最大目的，是在增益美國的安全和加強西半球的防禦，自從美國租得這些海空軍根據地以後，美國可從格陵蘭以南特里尼達以北各海軍根據地聯成一氣，所以羅斯福總統說這是美國購買路易斯安那州以來國防上最大的成就。英美海軍協定的第二項目的則爲補充英國的海軍實力，並維持大西洋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說，美國支持英國抗戰。

自英美海軍協定簽訂以後，英美人士一致希望能有再進一步的合作，由大西洋而擴展至太平洋，包括澳洲及新加坡軍港，原來在一九三九年時，英國已向美國表示過，可將新加坡借美使用，其後恐怕外界以爲英美成立同盟，所以又取消原議。但暴日的侵略既有加無已，

英美的海軍合作，逐應必要而擴至太平洋，英美澳的談判機構數月之久，終於正式成立了一個聯防協定。

在一九四一年歲序更新之初，羅斯福已三度當選了美國的大總統，打破了百五十餘年來新大陸的傳習，揭開了美國政治史的新頁，這時他更佈置了一個大規模的援英計劃。除了商船大量售英之外，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財政上的援助。英財次長立浦遂有赴美之行。英國要支持一個大規模的戰爭，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能夠以財政力量援助英國的，祇有美國。

羅斯福總統軍火租借法案的提出，即為補救英國戰時財政及軍火物資的新辦法。依租借法案的規定，英國仍須盡力所能及償付貨款，但羅斯福總統既把英國國防認為對美有重大關係而以英國國防所需的軍火及器材租借給英國，則美國對英的幫助，當然不限於英方的償付能力。

軍火租借法案，亦稱援助民主國家法案，又稱加強美國國防法案，係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提交國會，大意是授權大總統，可以命令美國兵工廠製造用以保衛任何國家的任何物品；除總統反對外，得將任何有助於民主國家之防禦的物品交與各該國政府。本案提出之後，幾經參衆兩院審查，修正，於三月八日方由參院正式通過全部法案，其重要內容為：(一)總統在支配美國國防物品以前，應諮詢陸海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長之意見；(二)轉讓之軍火，其價值總額不得超過十二萬萬元，特許軍火之價值由有關各部長規定之；(三)轉讓軍火之條件得由總統規定；(四)總統的臨時大權應至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滿期，國會兩院得隨時聯合議決停止其大權；(五)他國如獲得美國軍火後，不得轉讓或轉贈或出售與第三國；(六)本案實施情形，總統應向國會提出報告，至少每九十日一次；(七)政府苟於本案規定以外為外國政府運造軍火，應請求國會通過在所撥款；(八)本案並非准許美軍艦護送軍火前往交戰區域。

援助法案既經過兩月的討論審查成為法律，羅斯福於簽署後立即從三方面推動工作。第一，他根據法案所規定，儘先提調若陸軍現存軍火的一部份，轉讓給民主國家。第二，他立即於三月十二日向國會特別請款七十萬萬元，分派各工廠製造新軍火，這是第一次的請求撥款。第三，羅斯福除開轉讓現貨，請款推廣軍火生產之外，又另組織一核心機關，以別於原有的國防生產管理局，專掌分配援助分量的決策，討論租借法案之運用及其他有關事宜。

美國政府既已盡全力援英為急務，則除了直接供給英國以需要的物品外，還要間接幫助英國加強對德意的經濟封鎖，因此便陸續採用了下列的幾種方法：

一、封存軸心國在美銀行的存款。他封鎖軸心國在美的存款，軸心便失掉了在美購買貨物的力量，也失掉了在其他國家用銀元購買貨物而後轉運至軸心國的力量。不特此也，羅斯福總統為決定對德意商國實行經濟鬬爭，又下令沒收德意商船。

二、擴大禁運，統制出口。限制出口，其目的一方固然是為了阻撓輸出於軸心侵略的國家。同時亦未嘗不是在於貯存原料，以供自國及同盟國之用。美國官辦的金屬保管公司為了增加美國的貯藏，在南美購買錫鋅銘和鎢，當然一方面能夠增加美國的貯藏，一方面也能夠減少甚至阻止軸心國家或其中立的與國購買這些原料。此外，英美兩國並協商聯合運用兩國全部資源，製造國防軍器。

三、航運的武器。美國的航運同樣能夠變為經濟武器之一。政府對於駛往可疑港口或裝載嫌疑貨物的船隻，可依法拒發出港證。美國官方的壓力可以阻止美國的商號在南美或別處僱用代理人。同樣的壓力，可以限制美國在國外的商號幫助軸心國家，也就是阻止它們從別國購買美政府所禁止的貨物，轉售給軸心國家。

美國援英政策正日漸積極化之時，遠東局勢亦正在日趨嚴重，英美在遠東的平行行動也隨着而更見其必要。英美在遠東的平行行動行於此時而見於事實者，先有美國太平洋艦隊決定長駐夏威夷，繼有英國在澳洲與新加坡的集中兵力，美國派居里來華，中英合作發展公司

成立，中英中美平準基金協定訂立，美國繼續撤退遠東僑民，英國在新加坡佈置水雷，美艦分訪紐西蘭澳大利亞駐紮新加坡，英軍增防馬來亞並一再頒佈防務布告，與夫英美荷澳在馬尼剌的軍事會議，不絕如縷，這一連所表現的無一不是英美在遠東合作的明徵。

自第三次近衛內閣成立，日荷談判失敗，日越聯防議定，日美交涉頻繁——日本的野心越發暴露無遺。到這時英美宣布了凍結日本在美的資金，接着強化太平洋防務，馬尼剌佈雷，夏威夷警戒，菲列賓陸海軍併歸美國節制，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部成立，遠東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就職，緬督措講不虞侵略，英軍再度大批增防新加坡，古柏奉派至遠東聯絡……。英美在太平洋上合作抵抗暴日的戰爭，已經箭在弦上了。

在西半球方面，美國又發表了海上自由的宣示，並將格陵蘭與冰島先後置於美國保護之下。格陵蘭與冰島地介歐美兩洲之間，一旦大西洋方面有事，都將成為海空軍的主要據點。格陵蘭與冰島，原為丹麥屬地，美國接管其在美洲的屬地，實是援英自保的積極措施。

就在這美國整軍備戰的差不多時期，在一九四一年的八月上旬，邱吉爾渡過大西洋，羅斯福也以釣魚之名北上，兩氏會晤於紐芬蘭海外的兵艦上，而英美的合作也遂更由道義的聲援，物資的幫助，進至於軍事的計劃與戰略的決定。

一年多以來，美總統與英首相已有過四次會晤，每次的會晤都對國際局勢發生重大的影響。第一次會談共歷十日，會議結果由白宮發表羅邱聲明，羅邱聲明內容共為八點，我們若將這八點作一分析，則八點中的第一點在聲明英美兩國並無領土及其他的野心。此條可以約束英國，不要再如上次大戰後一樣，違背威爾遜十四點的精神，而依據事前的各項密約，作列國權益交換的買賣。第二條規定：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表現之意志所同意之領土變更，兩國不願見其實行。這與第一點有同等的功用，惟措辭較有伸縮性；第一點的目的在拘束英美兩國本身，而第二點則在拘束他國。第三點上半規定尊重政體自決的原則，這是對蘇聯的一種然諾。第三點下半規定主權與自治政府的恢復，但措辭頗為緩和，仍保留有伸縮性。第四點至第七點均有關戰後經濟問題。第四點保證各國於戰後，不論大小勝敗，均可獲得原料與貿易的平等待遇，但「在適當尊重兩國(英美)現存之義務下」一語，則又給英美兩國以伸縮的餘地。第五點有關列國間的經濟合作，其目的在為列國獲得改善勞工的生活標準，經濟進步與社會安定。第六點為羅斯福所說四大自由中生活須求自由一項的變形，在未來的和平世界中各國人民必須有此自由，但其中插入「納粹暴政最後毀滅以後」一語，以表示英美不能容許納粹存在。第七點有關海上自由。第八點有關縮軍，但對於縮軍的性質與程序，則分為兩種。凡在邊境以外「威脅侵略或可能威脅侵略」的國家必須解除軍備，而且須在「較廣泛永久之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以前」。至於各愛好和平的民族，英美兩國將幫助並鼓勵他們，採取一切「合於實用的步驟」，以減輕「軍備重大的負擔」。

這就是有名的羅邱宣言，以其會晤地點在大西洋，而又被同盟各國普遍接受，因此稱大西洋憲章。英美對日抗戰的決心，也是確定於這一次的會議。

珍珠港的大礮和炸彈之吼聲方息，太平洋的大戰剛開始不久，邱吉爾首相又於十二月下旬再度赴美，同行者有供應部大臣畢維勃魯克等多人。

羅邱第二次白宮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當然是很廣泛。但我們據那時連日的電訊加以判斷，亦可知其主要議題為：一、立即採取緊急步驟，共同保衛新加坡，菲列賓。二、共同保衛遭受德國侵略威脅的戰略要地。三、資源的分配應用，包括戰時生產的擴充及人力的適當分配。關於第一項，各方對於先集中力量應付德國，抑或先解決日本一節，頗會加以考慮。而新加坡與菲列賓如不能同時保衛，對於星洲與菲島防禦的先後緩急問題，會議中有兩派意見之分，這我們從電訊中也可看出。關於第二點，希特勒親任陸軍統帥後，企圖以全力爭取勝

利，所以歐洲戰場方面，盟國必須準備應付。關於第三項，下列各問題，會經提出研究：（一）全盤戰略的一致。包括集中與分散的計劃，各戰場的嚴密聯繫，軍力的調動；如何以最有力之進攻完成最大之戰果？何者應予保衛？何者可以暫時放棄？何方應受最大之負擔？（二）軍需生產的擴充與加速。如何依照全盤戰略上之所需，作適當之分配？包括同盟國資源，人力，軍器生產及航業之合流，如何運輸資源以完成最大之戰果等等。

在邱氏留美期間，二十六個反軸心國家，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在華府共同宣言，彼此得充分利用資源對抗軸心，及不單獨對敵停戰或講和，對於大西洋憲章的目的與原則（亦即作戰的目的），一致表示贊同。

上述的第二項，所謂保衛遭受德國侵略威脅的戰略要地，不過是消極的保衛，同時英美兩國還積極的計劃對德意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渡過英倫，對德國佔領地正面進攻，或者在法屬北非做較小的攻擊。但是對於西歐的形勢——渡過英倫，進攻德國問題，愈加研究，越發覺得困難重重。雖然如此，但當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五月中先後訪問倫敦與華盛頓，分別訂立英蘇新盟約及美蘇新協定，並且要求早日開闢第二戰場的時候，這西歐戰場的計劃仍在進行。所以六月十一日，盟方發出一個聲明，說對於一九四二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迫切需要，已經成立了一個完全的諒解，這個聲明至少是對於納粹的神經戰，但英美雙方都暗中謹慎地告訴莫洛托夫，盟軍並不能保證一定可以開闢這個戰場。以後不久，終於顯然地看出，要是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成功的機會是很少的；於是盟軍領袖開始這樣想：還是延遲一切的攻勢，直到人力武器和船隻都足夠跨海發動猛烈進攻的時候呢？抑是在一九四二年做較早的，但是規模較小的攻擊呢？為了討論這個問題，邱吉爾和他的軍事顧問們於六月十八日又到了華府，這是邱吉爾的第三次訪晤羅斯福。

羅邱第三次會議的前後，蘇聯各線戰況雖暫形沉寂，然德軍正猛攻塞巴斯托波爾，利比亞的戰事，已使多布羅克遭受威脅，馬耳他的威脅亦未解除。而軸心在希臘本部克里特島與羅德島亦集中大批滑翔運輸機，以備進窺埃及。在遠東方面，緬甸失陷，浙東大戰，且敵人隨時有奪取太平洋中盟軍外圍據點的企圖。兩氏對於這些戰略形勢在會議中自然俱加檢討。我們的宋子文外長及蘇聯的駐美大使李維諾夫也會分別參加羅邱會議，對於「每一大陸及每一海洋上聯合國家進行中之各項重要會議，舉行詳盡之商討。」而對於一九四二年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急迫問題，商得一致的協議，接着美國陸軍部宣布開闢歐洲戰場，任命艾森豪威爾少將為總司令，決定了發動歐洲的攻勢。

邱吉爾首相抽萬幾之暇，冒戰時越洋的勞頓與危險，三度訪問華府。邱氏第一次訪問華府，會產生了大西洋憲章，釐定了作戰目的；第二次訪問華府，會簽訂了二十六國同盟宣言，結成了作戰團體；第三次訪問華府，則確立了作戰的計劃。

在這計劃之下，英美的盟軍首腦，對遠征軍的編制和補充等大問題，苦心思慮。美國的聯合參謀本部各長官，——馬歇爾將軍，金氏海軍上將，亞諾德中將——從事於計劃兵力的工作，同時，聯合參謀本部和以李海上將為主席的英美聯合參謀會議，安排了英國艦隊和美國遠征軍的合作事宜，並且決定了護航隊的組織。聯合參謀會更排定程序，使得英軍進攻埃及，和美軍在法屬北非登陸的時間吻合，工作的進展極速，所以在八月杪，一切都已佈置好了。在十月二十三日，英國先在埃及發動了攻勢，大獲全勝，十一月八號，美國軍隊便在陰暗陌生的北非一千英里的海岸上，在二十幾處據點登陸。十一月十日，美軍從海空方面，向卡薩布蘭卡大舉進攻，這裏便是以後羅邱第四次會晤的地方，十一月十一日，卡薩布蘭卡投降，盟軍攻取法屬的工作，經了四個多月的準備，七十六小時的鏖戰，至此告成。

本年一月下旬，國際間盛傳盟國舉行重要會商，到二十四日，英美官方對新聞界發表正式聲明，說邱吉爾首相與羅斯福總統已於法屬摩洛哥之卡薩布蘭卡郊外自一月十四日起至二十四日止完成十日之會

請，當時聯合參謀部人員均參加，聲明中說：「英美兩國領袖及其參謀人員對於各項作戰計劃以及在一九四三年對德日進行攻勢所應擔任之事功，均已獲得完全同意。」邱吉爾首相說，這次會議，是他所參加或曾親見的軍事會議中最為成功的一次，會議範圍的廣泛無與倫比，他與羅斯福決定了擬定的目的，就是：「使舉世陷於憂愁與破壞之惡勢力必須無條件投降。」羅斯福總統說，他與邱吉爾保證和平將重現於世界，但必須徹底摧毀德日兩國的作戰能力。「以一切可能之物資送往蔣將，助其進攻。」「竭盡一切可能之援助，并予英勇抗戰已達六載之中國，因而永遠終止日本統治遠東之企圖。」

「這些聲明，應該就是卡薩布蘭卡會議所決定的正確統一的政略與戰略。但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戰鬥法國領袖戴高樂與法屬北非高級委員吉樂德的被邀參加這次會議而獲得達成法國的解放同心一致的諒解。自然，法國的奮鬥是應該統一的。

我們要進一步問卡薩布蘭卡會議所決定的全盤戰略究竟如何？據二月十一日邱吉爾首相在英議會中發表的演說，可以知道一些梗概。邱吉爾首相說：「吾人之行動，現已有完全計劃，其中包括各部份之軍力於其方向與行動之細節。此一計劃，將依照吾人未來九個月內所能運用之能力實行之。」這是說卡薩布蘭卡會議已決定了一個「九個月戰略計劃」，這個計劃的大方針，與一年以前羅邱第二次會議的相同，即如邱吉爾所鄭重說的：「英美均曾聲明其一致贊同一年以前之決定，即擊首先擊潰德國」，再對日本決戰。」邱吉爾復鄭重聲言：「擊潰德國後，英帝國所有部隊屆時均將儘速馳赴遠東進攻日本。」在邱吉爾首相演說的次日，羅斯福總統又發出播講，先說明作戰到底的決心，「直至聯合國家在柏林羅馬東京的街道上作勝利遊行為止」。羅斯福說到聯合國家的戰略程序時，也是先由蘇俄突尼西亞到進兵歐洲大陸，然後再談到遠東的戰事。最後羅斯福總統呼籲聯合國家的堅固團結，使軸心國的分化慣技無效。因而代一切聯合國家告訴軸心國家曰：我們與任何軸心政府或任何軸心為徒談判之惟一條件，即卡薩布蘭卡會議所宣布的條件，即軸心國家的無條件投降。

我們對邱吉爾首相的演說和羅斯福總統的播講，都極感興奮。但在先擊潰德國再打倒日本的戰略戰術上則認為似尚可議，雖然卡薩布蘭卡會議中羅斯福邱吉爾「曾與蔣委員長互通消息」，二月五日，羅斯福總統所派的空軍總司令安諾將軍與邱吉爾首相所派的狄爾元帥由北非飛抵重慶，代表羅邱兩氏向蔣委員長報告北非卡薩布蘭卡會議的經過詳情。但在我們中國人的立場，對於九個月當中計劃是不大贊同的，當然，這個計劃也就是為日本所快。而邱吉爾首相於三月二十一日的播講中，又把這計劃拉長至明年或再後一年，並說明擊敗希特勒後有局部的復員，這當然更是為我們所認為未能滿意的。

三月十四日，英外相艾登到了華盛頓。當艾登勾留在美的期間，華盛頓有一個規模較大的軍事會議，參加者除統帥機構之諸陸軍高級參謀人員外，有來自太平洋各戰區海陸軍高級將領十五人，會議結果未宣佈，僅謂會連續舉行若干次會談，「商討未來對日作戰計劃」。我們相信先德後日的原則雖已不能變更，但重德輕日的觀念當已有相當的修正了。

艾登為什麼到華盛頓？艾登到華盛頓，主要的是商量戰時戰後各種問題，及解釋英美之間的各種誤會。我們知道，國際間的關係，總不免有些心理和政治方面等的隔閡，英美雖同文同種，但亦不會完全沒有一點間隙。在此，特摘錄四月八日艾登在英下院發表訪問美加經過的報告中之一段，作為本文的結束，並望所有各聯合國家精誠團結，堅固合作！艾登說道：「英美之關係，不應僅以感情同種同文為基礎，而應以維持世界和平及防止世界每二十年發生戰爭慘禍之共同興趣，為其真正之基礎。倘吾人堅持此一基礎，則英美關係有時一起一伏之現象將少有發生之虞。」我們衷心祈盼盟國政治家均深體斯意，英美幸甚！世界幸甚！

科學管理與國防

王雲五

現代國防有賴於物質與設備，物質與設備又有賴於工業生產；而科學管理實為增進工業生產之必經途徑。

美國是首倡科學管理之國，盡人知之；然知之者輒以科學管理僅有助於工商業，此外亦有知其適用於行政，能促進效率，顧鮮有注意其與國防之關係者。試舉一最近之例。美國因酷愛和平，平時對軍備不甚擴充。以空軍言，在珍珠港事變前，祗有軍用機約五千架；然自事變迄最近，雖閱時僅一年有半，已完成軍用機五萬架以上，而按其計畫，則一九四四年底當可有十二萬五千架，換言之，則兩年之間新製之機多至十二萬架，聞生產總量中以供租借法之八分之一尚不在內。以海軍言，則珍珠港事變前，美國所有軍艦僅足應付一洋之作戰，及珍珠港遭遇猝不及防之襲擊，當時留駐該港之軍艦八十餘艘幾無一幸免，經此一役，美國殘餘之軍艦僅當原有十之五六，以供一洋之作戰，尚感不敷；曾幾何時，今所擁有之軍艦已遠過於珍珠港事變前，以供兩洋同時作戰尚無不足。此外一切軍需產品及其他產品皆有極速之進展；計一九三九年全國工業總生產值美金八八一萬萬元，一九四〇年值九七一萬萬元，一九四一年值一、一九五萬萬元，一九四二年值一、五二二萬萬元，四年之間約增一倍；而其中軍需品，則一九三九年占總生產量百分之一．一，一九四二年則占總生產量百分之三二．九，四年之間約增五十二倍。此種迅速之進步除與其資源豐富人力充足有關係外，主要者仍有賴於科學管理，使其工業生產之效率大增。

俄聯在帝俄時代，生產原較落後。其政府雖有幾度工業化之計畫，然初以農奴制度妨礙工業活動之途徑，繼以因沿舊習，生產方式未能革新，成就尚小。革命初期，社會經重大之改革，一切不免紊亂，生產自亦不足觀。及采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先之以第一次五年計畫，繼之以第二次五年計畫，其對生產之方式，盡力採行美國行之有效的科學管理法。各工廠有發明家俱樂部，合理化研究組，生產會議等之組織。一九三五年九月在頓巴斯礦區發動之斯太哈諾夫運動，以一工人之努力改善工作方法而大增產量，與美國科學管理之首倡者泰羅氏之工作後先輝映，而蘇聯全國響應之迅速與熱烈，百十倍於十九世紀末美國對於泰羅氏之響應。試將第一次歐戰前一年之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五年計畫開始之一九二八年，其終止之一九三三年與第二次五年計畫終止之一九三七年若干種基本工業之產量一為比較；查煤之產量在一九一三年爲二九、〇四〇千噸，一九二八爲三五、二〇〇千噸，一九三三爲七五、八三七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一五二、五〇〇千噸，計末期等於首期之五倍強；石油在一九一三爲九、二四三千噸，一九二八爲一一、六五一千噸，一九三三爲二二、五一九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四六、八〇〇千噸，計末期等於首期之五倍強；生鐵在一九一三爲四、二一六千噸，一九二八爲三、二八三千噸，一九三三爲七、一三三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一六、〇〇〇千噸，計末期等於首期四倍弱；鋼在一九一三爲四、二三一千噸，一九二八爲四、二五一千噸，一九三三爲六、八五二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一七、〇〇〇千噸，計末期等於首期四倍強；銅在一九一三爲三一．三千噸，一九二八爲三〇．一千噸，一九三三爲四五．三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一五五千噸，計末期等於首期五倍弱；鋁在一九一三及一九二八均無產量，一九三三則爲四．四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八〇千噸；鐵路機車

在一九一三爲六五四輛，一九二八爲五八〇輛，一九三三爲一、〇〇八輛，一九三七預計爲二、八〇〇輛，計末期等於首期四倍強；貨車在一九一三爲一四、八三二輛，一九二八爲一〇、八六八輛，一九三二爲二二、三〇〇輛，一九三七預計爲一一八、四〇〇輛，計末期等於首期八倍強；汽車在一九一三無產量，一九二八爲六七一輛，一九三三爲四九、七五三輛，一九三七預計爲二〇〇、〇〇〇輛，計末期等於第二期三百倍弱；拽引機在一九一三無產量，一九二八爲一、二七二架，一九三三爲七八、二六三架，一九三七預計爲一六七、〇〇〇架，計末期等於第二期一百三十一倍強；硫酸在一九一三爲一二一千噸，一九二八爲一九四千噸，一九三三爲五七〇千噸，一九三七不詳，計第三期等於首期五倍弱；水泥在一九一三爲一、四三八千噸，一九二八爲一、八五〇千噸，一九三三爲二、七四九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七、五〇〇千噸，計末期等於首期五倍強；紙張在一九一三爲二四千噸，一九二八爲二九五千噸，一九三三爲五〇八千噸，一九三七預計爲一、〇〇〇千噸，計末期等於首期四十二倍強。以上所列一九三七年之產量係第二次五年計畫之預計，雖其實施之結果尚多未詳，然試以第一次五年計畫之成績，則第二次五年計畫之結果必較其預計有增無減，可以斷言。據可靠之調查，則一九一三年俄國之生鐵與鋼之產量僅當德國同年百分之二十七；然一九三七年蘇聯之生鐵實際產量爲一四、五〇〇千噸，鋼爲一七、六〇〇千噸，已達德國同年高度之實際產量百分之九十以上。又一九一三年俄國之生鐵產量僅當同年英法兩國合併產量四分之一，其鋼產量則不及英法合併產量三分之一；但一九三八年則生鐵與鋼兩項蘇聯所產均遠過英法兩國同年合併之產量。蘇聯鋼鐵產量既達如此高度，於是機械工程之產量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度竟占全國工業產量百分之三十之巨額，超過德國之倍數。至關於軍需品之產量，由於保守祕密之故，雖不易得其確數，然截至第二次五年計畫終止之時，則一九二〇年布坦尼將軍之騎兵隊業於一九三五年進展爲伏羅希拉夫將軍之坦克隊，計彼時蘇聯已擁有各級坦克車一萬輛，軍用拽引機一萬五千架，軍用摩托車十萬輛，使紅軍在歐洲機械化步隊中占領袖之地位。此外所有大小型之砲，則據德國人民觀察報在一九三五年之調查，業已超過七千門；艦隊則據國聯一九三五年出版之軍備年鑑，在一九三四年蘇聯已有戰鬥艦四艘，乙級巡洋艦七艘，驅逐艦三十六艘，潛水艇十九艘，計共七十六艘，總排水量一九一、七八九噸；軍用飛機則據德國布勢上校 von Buelow 的估計，在一九三六年蘇聯所有者已超過八千架。總括言之，一九一三年蘇聯農業產量占全國總生產量百分之五七・九，工業產量則占百分之四二・一；至一九三七年則工業產量擢升至全國總生產量百分之七七・四，農業產量則降至總生產量百分之二二・六。設使農業產量實際較一九一三年低落，則工業產量之增進僅爲生產種類之轉變，不能表示生產實際之增加；然而一九三七年蘇聯之農業實際產量仍較一九一三年有增無減，祇因工業方面所增特多，致農業之比例下降。由是觀之，蘇聯工業化之猛進誠足驚人，而其得力於科學管理尤爲顯著。

德國夙以工業化及科學著稱；然在第一次大戰後，由於財政之困難，賠款之壓迫種種問題，致工業陷於一時之厄運。於是德國盛行所謂合理化運動，以謀經濟之復興。所謂合理化實即美國所謂科學管理。據美國藍森氏 Walter C. Langsam 於其所著一九一四年後之世界所言『有助於經濟復興之另一因素爲合理化運動之流行於德國工商界各方面。德人對美國工業之非常發達歸功於合理化的觀念與大規模的生產，深信祇有同時采行此兩種政策方能導向經濟的更生。泰羅與福特 Henry Ford（一爲工業效能的，一爲大規模生產的鼻祖）在德人眼中均成爲英雄；於是彼等推派專家往美國研究其方法與制度。』一九二一年德國設有全國效率改進局，其任務爲研究分析並力圖解決德國工業界所遭遇之許多問題；其他研究提高農業、管理、與建設的工作效率之公私機關亦紛紛成立。雖在推行之初期，間有趨於極端，以致一方面工作之效率雖大增，他方面卻使失業人數一時的增

加；然經過調整之後，正如德人所稱『將合理化運動加以合理化』之後，工業界所收之利已達最高峯，而所受之害亦降至最低度。茲舉若干實例證明之。煤之產量在一九三八年爲一八六、〇〇〇千噸，約倍於一九三二年，於其吞併捷克後再增一八、〇〇〇千噸，則較任何歐洲國家爲多；生鐵產量在一九三八年爲一八九、〇〇〇千噸；等於一九三二年之三倍，於其吞併捷克後，年增約二〇、〇〇〇千噸，較英國或法國各超過三倍，較英法兩國合計約倍之，較蘇聯約增三分之一；鋼之產量在一九三八年爲二三、〇〇〇千噸，等於一九三二年之四倍，於其吞併捷克後，年產合計將超過二五、〇〇〇千噸，等於法國之四倍，英國之兩倍半，較蘇聯約增四分之一；化學原料對於德國之戰爭經濟關係特重，年產價值約六千兆馬克，在歐洲實居首位；機械工業之產量雖爲崛起之蘇聯同種工業之龐大產量所蓋，然其在一九三八年所產之五千兆馬克價值在歐洲實居第二位；汽車之產量在一九三八年爲三四〇、〇〇〇輛，等於一九三二年之六倍強。至於軍需工業則初時因凡爾賽條約不僅限制德國製造重砲坦克軍用飛機及其他新式兵器，且強迫德國將原有兵工廠的重要設備完全撤除。依該約第一六九條規定，德國之軍需生產祇限於供給十萬國防軍之需要，每一種兵器並限定某一工廠生產；因此在國社黨秉政以前，德國除在荷蘭瑞士瑞典等國以掩護的方式建設許多工廠，以製造凡爾賽和約所禁止之兵器外，在國內則盡量發展與軍需有關係之工業，如化學航空及汽車工業等，俾一日有事，則剩用以改造軍需品；及至希特勒撕毀和約後，此舉立即加速實現。德國自其重整軍備以迄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動之日，爲時未久，然一方面藉其合理化工業之基礎，他方面再適當推行合理化的軍需工業，雖因其嚴守保持祕密，使人對其在第二次大戰前擁有各種軍備之實際數量猶難確定，僅能臆斷，例如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紐約泰晤士報估計其第一線飛機爲八千架等，實際上大都超過一般的臆斷。一九三八年慕尼赫協定簽署後，前森省長當波文（Terboven）於同年十月三十日有如下的一段演詞：『如果張伯倫先生願意簽著慕尼赫協定，這祇是因爲德國意志的背後具有強大的空軍。』在此時之前數日，德國空軍部之某宣傳員在戈林的國家日報中亦有如下之諷刺語：『這定是因爲大量的轟炸機準備待發和無數的驅逐機準備起飛，才把英國的獅子和法國的雄雞變爲和平的鴿子。』此等言論，在第二次大戰揭幕後，皆已證明其非恫嚇之言詞，而爲實力之表示。

科學管理之效用既如上述，然科學管理究爲何？其定義因諸家主張不一，頗爲紛歧；然一九二七年五月世界經濟會議對『合理化』所下之公式的定義爲『合理化是求精力或材料的最低限度之消耗而設的技術與組織的方法，包括勞工之科學的組織，材料與製品之標準化，工作程序之簡單化，以及運輸與交易之改善。』此定義實可移用於『科學管理』而尤覺適當。至於科學管理的效果，集諸家所主張者，約有下開各項：（一）生產集中於從事全部時間工作之最有效率的工廠，（二）製造分部化，（三）製造標準化，（四）設備現代化，（五）使用動力之經濟，（六）消除不必要之工作步驟，（七）節省物料之消耗，（八）經營的行政費之減低，（九）致全部生產最大可能的效用，（十）銷貨與儲藏之集中，（十一）產銷運費的減少，（十二）大宗購買之可能性，（十三）增加研究與調查的工作，（十四）供給與需要的調節，（十五）失業與停工的減少。但任何事必不能有百利而無一害；科學管理亦如是。在其實行之初期，常使一部分工人失業或從事學理堅苦之工作；此兩點無可諱言者。然而此種暫時之缺點與實行科學管理之利益相較，實微不足道；況前車之失後車可鑑，即此一時之缺點亦未嘗無解決之道也。

茲按照定義，分別就（一）勞工之科學的組織，（二）材料與製品之標準化，（三）工作程序之簡單化各點略加論述；至於運輸與交易之改善，則因與本題無關，姑不置論。

（一）勞工之科學的組織　在生產的程序中，人的因素，無論機械化在若何程度，畢竟占最重要之地位，故有最先注意之必要。科學管理對於人之因素至少須注意下開四項：（甲）職工的選擇，（乙）職工的

訓練，(丙)工作的報酬，(丁)權責的分配。現分別說明如左：

(甲)職工的選擇　用適當之人，作稱當之事，則個人得展其所長，樂其所業，效率自高，公私兩利。同時人各有所長，宜於此者未必宜於彼，不宜於此者亦未必不宜於彼；故適當的選擇，其結果一方面固可使人與事相宜，他方面亦未必使落選者久陷於失業。又能力對於職業之成功有直接關係，能力低而工作難，必致成績惡劣，不克勝任；能力高而工作簡，必生厭倦，或不能久於其職，或遇事敷衍，轉不如能力較所任職業為低而肯努力者之成就。因此，職工的選擇有賴於(a)智力測驗，(b)特能測驗，(c)職業測驗三種。智力測驗定各人智力之高下，務求智力與所任之事相稱，正如上文所述，固不可過低，亦不宜過高。特能測驗則因各種職業需要特別之能力，例如駕駛汽車者須能判別距離，售貨員須長於交際等；又如依工作之種類，或需腕力，或需指力，或需靈敏的觸覺，或需精細的視覺，惟經過適當的特能測驗及格者，始能望其勝任愉快。職業測驗係指某種工作所需之能力不易分析為各種特能者，換言之，即其工作所需之特別能力非特能測驗所能測知者，或其所需括有多種之特能，分別測驗殊嫌手續過繁者；則對於此類職工的選擇當利用職業測驗。泰羅氏於其所著科學管理原理一書，述其所為關於工人選擇之兩種實驗，其中一種即關於鋼鐵之搬運者。泰氏按科學的方法，就七十五名的工人試驗，結果每八人中祇有一人每日能搬運鋼鐵四十七噸半，而能力最低者僅能搬運十二噸半；但就科學的研究之結果，每日四十七噸半實為適當的工人每日應有的效率，初非特殊人材始能勝任；於是以此為標準對前此業經雇用之工人尚未達此標準者加以適當之訓練，結果亦多能及格。此項選擇人材之原則，適用於國防上之例正多，即如適於陸軍之人材，未必適於海軍，適於海軍之人材，亦未必適於空軍。為謀用得其長起見，自須於徵集各種人員之時，依科學的方法，嚴格選擇，則入選者自可勝任愉快。

(乙)職工的訓練　工商業選定職工之後，依科學管理之原則，須加以適當的訓練。所謂適當的訓練係將前人的經驗及科學研究的結果，以系統的方式，傳授於人，不僅可使學習時期縮短，並能令生產增加。據加拉特博士 Dr. Garrard 在瑞士的實驗，科學的訓練方法采行後，學徒時期可縮短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而生產平均約增百分之二十。美國柏爾特教授 Prof. Harold Ernest Burtt 對於工人訓練實驗多次，結果均甚完滿。十二名新工人經過有系統的訓練後，其工作速度平均為三十七分鐘，而未經訓練之另一組新工人，經過同樣的六星期工作後，其工作速率則平均為四十六分鐘。再就產品言之，則上述工人中，經過訓練者較未經訓練者之成績增加百分之二十三乃至百分之四十；其他之例，不勝枚舉。在國防方面，訓練亦廣為施行，尤以機械化部隊及海空軍人員，為需要；而需要最高特殊技能者如空軍人員之訓練，往往費時甚久。美國自遭珍珠港一役之打擊後，一方面以最高之速度加造軍用飛機，他方面以最省時之方法訓練飛行人員。聞將於一九四四年底以前訓練完成飛行人員二百萬。以如此複雜之技能，在如此短促之時期，訓練如此龐大數目之人員，乍聞之下殊足驚人，而或疑其不可能。不知以美國科學管理之發達，對於訓練技術之簡單化自必能收特效；且按照連鎖工作 Chain Work 之原則，儘可使同時參加訓練之多數人構成一連鎖，而像川流不息一般，晝夜不輟，利用設備，則以短時期而訓練許多人，自亦有其可能。

(丙)工作的報酬　如問工作的報酬如何始為適當，則第一答案當為「公允」，第二第三答案亦必為「公允」。然如何始能達公允之原則，則首須有工作標準，次須使報酬與工作相稱，最後尚須使共同工作者之間各人所得之報酬與其負責之輕重，致力之大小有正確之比例。工作標準由於各種工作之科學的研究結果而獲得；報酬與工作相稱，除需有工作標準外，主持者須毫無偏私；至於共同工作者間之各得適當的報酬，除能完滿的履行上兩條件外，仍須對各個人詳為比較，此一項尤為複雜。大抵按件計酬輒較按時計酬易達公允之原則。科學管理為求達增進生產節省耗費各項目的故，除對報酬須能公允

外，係須特予激勵，俾能興奮。激勵之法常藉激勵工資之給與行之。激勵工資常稱為獎金，其種類甚多，互有短長，當斟酌情勢，分別采行，往往能收大效。據美國紐約大學工業合作部主任黎特爾 C. W. Lyttle 於所著之工資激勵方法 Wage Incentive Methods 中有言：『很多的經驗證明優良的工資支付法如經適當采行，當可增加非熟練工人的生產力至百分之百，增加運用機器之工人的生產力至百分之一百五十，增加完全的機械化的生產力至百分之二百，增加高度熟練之工人的生產力至百分之三百。』查激勵的工資亦為科學管理的出發點。泰羅氏提倡之差別的工資制，對於生產量在水平線以下之工人給以較低一級的工資，而生產量在水平線以上者則給以較高一級的工資；是為最初按工作標準所給之一種激勵工資，此外原則相同方法不同者不下數十種，茲不具述。國家對於人民之從事國防工作者，雖亦可勉以國民職責，或獎以名譽；但其效力仍不若激勵的工資之普遍與切實；因此，許多國家許多事業仍注重金錢之獎勵也。

(丁)權責之分配　此為管理上最要之點。科學管理對於組織方面特加注意，則所以謀權責分配之適當。科學管理對於工作之研究，其主旨在消除不必要之工作步驟；其對於組織亦然，一方面固須周密無遺，他方面力避衝突重複。某種事業為求辦理迅捷上下貫澈也，於是有直線式之組織 Line Organization；某種事業為求分工合作各盡所長也，於是有職能制之組織 Functional Organization；某種事業於簡便之中仍寓精密之意也，於是有直線與職能合併之組織 Line & Functional Organization。某種事業於無礙執行之際仍寓慎重研究之意也，於是有委員會之組織，要當因事制宜，以求至當；然無論如何，一、切忌同一職權分賦於兩部分，以致衝突推諉；二、切忌職責分配不明，以致無所適從；三、切忌執行以外無從旁考核研究，以資改造。組織上千頭萬緒，歸納於此數語。工商界固應如是；一般行政與國防事業亦不能例外也。

(二)材料與製品之標準化　標準化是依照科學的分析所規定之標準，使製品與所需材料的式樣大小及性質趨於一致，是增加生產減少存料最有效因素之一。欲使存備之材料能供最大的利用，則材料必須標準化；然欲使材料標準化，必先使製品標準化；而製品標準化之結果，不僅可使材料標準化，並可使工具標準化與工人專門化，因而得收節省資金與增加生產的效用．同時又因製品的各部分能互相利用，亦可收增加供應的效用。標準化雖遠在十九世紀之末已由泰羅氏提倡之，然其大規模的實施，實際始於上次之歐戰。其時美國有戰時工業部之組織，該部之工業保持組即從事於此種工作之機關，其目的在節省國內之勞工資本原料機器，以供戰時工業之特別需要。經與各業領袖詳細會議之後，決定將各種製品之式樣大減，計六六六種之瓷器僅留一七七種，一三〇種之鋁鍋僅留一三種，七五種之磚僅留二種，七八種之床褥僅留四種，一〇〇種之男帽僅留九種，其他大致相若。同時有許多標準化的機關，由各工業協會分別組織或聯合組織，研究各業製品之標準化，以期種類減少。戰後美國商務部於一九二七年擴充其簡單化實施組繼承戰時工業部工業保持組之任務，雖戰後緊縮之程度漸弛，各業製品有逐漸恢復戰前繁雜之趨勢，然因政府與工業領袖之繼續提倡標準化，此趨勢得以稍遏。當美國前總統胡佛氏任彼時之商務部部長時，曾估計美國製造業如能實施標準化與采行其他避免濫費之建議，則每年節省金額當在六萬萬元以上，其關係之大可知。上次歐戰後，歐美各工業國幾無一不采行工業製品標準化政策，而行之最澈底者除美國外尚有德國及捷克。據統計捷克因實施標準化之結果，每年全國節省金額約捷幣一萬萬元。以上為關於一般工業標準化之情形。至關於國防之軍需工業，則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時，美國因急需供應大量之飛機與軍火，其專家集議之結果，認為最經濟最迅速之生產飛機引擎方法，莫如使之標準化；乃建議各式飛機引擎應用標準化之汽缸活塞汽門齒輪等；因此，八汽缸或十二汽缸之引擎損壞後可互易其機件，集若干損壞機器之各部分亦可配成一新引擎。據胡佛委員會印行之合衆國最近經濟變動一書所稱：『多數工廠於軍需

品準備上使狹小之特殊部門專門化，且組織許多單一目的之工廠，如隸屬於戰時商船公司之賀格島 Hog Island 造船所，因附設有多數之材料供給工廠，對於實行空前之大量生產，卒告成功。」法國於上次歐戰時，所製步鎗機關鎗及大礮皆力求標準化，俾彼此有交換性；各兵工廠爲使此交換性得以完滿實現，必須嚴守原器測尺檢定器及製作圖面之尺度。英國雖於一般製品之標準化較他國發展稍緩，然上次歐戰之新興工業如飛機汽車等無不積極采行標準化。此次世界大戰，英美兩國於猝不及備之下，臨時趕製大量之軍需品，卒有驚人之收穫；其得力於標準化實非淺鮮。

(三)工作程序之簡單化　工作程序縱的方面包括個人與全部而言，橫的方面包括手工機器及設計而言。簡單化之目的在節省一切非必要之步驟，換言之，即避免勞而無功之工力。泰羅氏科學管理的出發點，即在求個人手工之簡單化。爲求達此目的，工廠方面須將每種工作先分析爲單獨的工作，再將單獨的工作分析爲各步驟，然後研究何者爲必需，何者可節省，何者應改善，經此項動作研究 Motion Study 之後，可發見過去使用工力之錯誤，並知如何防止工力之濫費，庶可決定各該工作最適宜之基本動作，然後以之教授工人，使其實地施行。美國吉爾皮里斯氏 F. B. Gilbreth 對於砌磚牆的研究，發見平時砌磚所爲不同的動作步驟計有十八種，經分析及研究後，知其中大多數的步驟實非必要，乃盡量節省，僅留改善後之五項步驟，已能獲相同的結果，於是每小時一人原祇砌一百二十塊者，至是可砌三百五十塊，其速度約等於原速度之三倍。動作研究加入時間之因素，即稱爲時間研究 Time Study，其結果可資以比較優劣得失之程度，而爲訂定工作標準之根據。此法不僅在進步的工廠廣行之，即商業與公務機關亦有行之者。國防方面對於工事之建築與軍需品之製造，當然亦可采行工業界行之有效之此種方法。至就機器而言，則機器雖有一定之速度，然輔助機器與準備利用機器之時仍有賴於人力，此項人力之不宜濫費亦如純粹手工一般，有待研究與改善。又就全部工作程序言之，則工力之不致濫費有賴於彼此銜接。欲使全部銜接，一方面有賴於設計，他方面亦有賴於設備。所謂設計包括生產途徑的設計 Routing 與生產時間的設計 Scheduling 兩項。前者之目的在於準備工作之時按各工作之性質，決定所需材料製造順序及各段作業等；後者之目的在於派發工作之前，按各工作區間及人員之能力與負擔，調劑支配，不使過忙過逸，俾於規定其可能完成之時日得以如期完成。所謂設備係指機器之布置與廠內之運輸便於銜接而言。美國盛行所謂連續工作 Chain Work，即將工作之材料或製品之部分連接不斷從一人傳遞於他人，每一工人分別從事一項工作，直至全過程完成爲止；而所有參加工作之人構成一連鎖，彼此牽制，不許任何分子懈怠，此法之實施，除工人緊張工作外，自當有新的自動設備，俾製造之標的物得自動的從一人而遞交他人。曾經參觀美國福特工廠者，驟視之驚爲奇蹟，實則祇須有適當之設計與設備，則於工作全程之進行不僅絕無複雜之嫌，且益趨於簡單化；蓋其程序固定不移，一經習慣，轉較無一定程序者爲簡單矣。又此方法最適於標準化物品之大量生產；故於國防上軍械之製造尤有采行之必要。美國自珍珠港一役海軍損失奇重後，趕即重建軍艦多艘，以資補充。在平時一般軍艦之完成需時甚久，今美國於一年之短期內，使僅當戰前十之五六之殘餘軍艦數量，一躍而遠超過戰前之原有數量，實亦因製造過程上厲行連鎖之原則，故能有此特殊效果也。

五月十三日在國防研究院講

德日一定夾擊蘇聯

龔德柏

駐華英大使館發表四月二十三日倫敦電：土耳其某報論稱：軸心將放棄攻勢，而以歐洲爲一堅固的堡壘。許多人對此推測，頗表贊同；但我則認爲不然。德國在其侵略性上，有攻無守。倘到不能進攻之程度，則離崩潰不遠，要想以歐洲爲一堡壘，採取守勢，不但英美蘇能將其攻破，恐更有自潰的危險。所以德國苟有掙扎力量，一定還是進攻。

德國在其本身上需要進攻，而在與日本聯繫上，更需要進攻，以求一逞。到目前止，軸心國似爲各自爲戰，不相聯繫。譬如德國攻蘇聯；日本則攻英美，雖屬對「敵」共同作戰，但較之共同進攻一國，則力量分散，不能收決定的效果。其實德日原決定共同進攻蘇聯，而美國一定阻其進攻，所以逼得日本對英美開戰，而使其戰略上發生重大齟齬。世人苟懷疑此點，則請一讀美國關於美日交涉的白皮文書，即可獲得日本不願先與美國作戰的證據。日本最初政略，本擬先解決蘇聯，再解決英美，所以三次對美保證不南進。其不南進，即要北進。但美國不肯與日本妥協，允其自由處置中國及北進，才逼成美日開戰。去年太平洋戰爭暫告一段落，日本應已決定攻蘇，但須德國獲得更大勝利，使蘇聯撤去東方若干軍隊，援救西方，日本乃可毫不費力，而佔領西伯利亞，以完成其侵略圖策。不料德國攻史達林格勒始終未下，使日本對蘇進攻不能早日發動，致遲到今天。這是德日戰略不能密切聯繫的經過。

日本前年爲美國所阻止不能攻蘇；去年又爲蘇聯堅強戰鬬力所阻止，不敢攻蘇，致使德國受重大挫敗，幾不能支持。這在日本實爲嚴重打擊。因爲日本的前途，繫於德國的勝利，倘德國失敗，美蘇一定聯合解決日本，並且相當容易。所以日本一定須與德國共同行動，對蘇進攻。勝則軸心尚可維持若干時；敗則同歸於盡。據我看：日本今年進攻蘇聯的政略戰略，均已決定，不過等候天氣溫暖，然後進攻。

日本進攻蘇聯的象徵，舉其最重要的，則如左述：

一、日本軍閥素來自高自大，苟非有重大要求於人，決不有絲毫客氣之表示。最近東條以「大日本帝國内閣總理大臣」之尊，竟訪問走狗汪兆銘，與傀儡溥儀，這在歷史上無其先例。這說明日本對汪賊與傀儡必有重大要求。關於物的方面，日本素來自由掠奪，用不着這樣客氣；惟人力的要求，方須汪賊與溥儀等幫忙。至這些人力，除對蘇外，並無其他用處。

二、今年戰費爲二百七十億元，較去年多九十億元。去年太平洋大戰，海陸空軍全部出動，用費鉅大。今年太平洋戰爭已告一段落，用費應該減少，而反增加九十億元，當然另有大戰爭無疑。而這種大戰爭，需費這樣大的，只有對蘇的陸空軍大決戰，其他方面均無此需要。

三、板垣征四郎爲少壯派領袖，其資格較東條爲老，東條對之亦極恭順。然板垣於德蘇戰爭爆發後，調任朝鮮軍司令官，至今尚未他調，若非攻蘇，則對板垣爲重大侮辱，而在東條當政之今日，決不應有。最近任命第一蘇聯通秦彥三郎爲參謀次長，亦爲異數。蓋秦資格甚淺，竟超越許多前輩，而任該職，當然有其必要。而去年在南洋作戰的重要將領山下奉文，飯田祥二郎，酒井隆等，均已調回本國，雖尚未見新任命，其準備參加攻蘇戰爭，似無疑問。

四、東條在議會數次聲明：「今年為決戰年」；大本營報道部部長谷荻那華雄也說：「將以國運爲孤注，求獲得最後勝利。」這都是攻略戰略已決然後才能說的話。這種話雖已說了多久，尙未見諸行動。若是攻澳，攻印，攻美，攻華，都無時間的限制，則早動一日即有一日之利益，當然早已發動了。惟攻蘇有時間的限制，卽蘇聯有黑龍江爲界，在三月以前，雖可由冰上渡過，然一旦解冰，流冰可以擊碎一切船隻，後路必被截斷，所以須待流冰完全溶解，方能動手。這種流冰須五月中下旬方能溶解完畢，所以日本至今還未動手。

我根據上述數點，判斷日本一定是侵蘇無疑。因爲侵蘇是日本傳統國策，在陸軍閥當政的今日，決沒有不執行之理。倘若今年不執行，俟德國戰敗，蘇聯已無他敵，日本不但不能侵蘇，反有被蘇進攻的危險。到這時候，日本卽令戰勝英美，亦不過一敗塗地，前功盡棄。所以日本必於今年與德共同侵蘇。這是東條說要「決戰」，谷荻說要「孤注」的命意所在。

日本旣要侵蘇，德國當然是與日本一致行動。因爲這是軸心最後突擊的機會，放過此機會，只有束手待斃了！希特勒東條輩都不是束手待斃的弱者，所以我判斷他們一定共同行動，以爲最後死中求生之計。世人若不肯信，請懸吾言以待事實證明！

四月三十日稿

戰後處置日本的根本問題

李毓田

戰後如何處置日本？這一問題現在已成爲美英朝野討論太平洋問題之核心。就一般主張歸納起來，可分爲五點：

(一)完全解除日本武裝，卽交出日本一切殘餘的軍艦、飛機、坦克、大礮，毀滅日本所有海軍根據地及防禦工事。

(二)日本退出所有侵略地，卽退出琉球、台灣、南庫頁島(日人稱樺太)、朝鮮、南洋委任統治地、一二八與八一三事件以來佔領的中國各地，及太平洋戰爭以來佔領的西太平洋及東印度洋各地。

(三)佔領日本本土，卽聯合國家軍隊佔領東京及日本其他大都市。此項佔領之期限，聯合國家人士尙主張不一，有人以爲不妨暫定爲兩年。惟不問久暫爲如何，此項佔領，已足以打破日人以日本本土從未被他國佔領之妄念，對於日人精神上所施之打擊，實至重大。

(四)拘禁日本上級軍官，並由聯合國家組織法庭，對於此等「戰爭罪犯」，開庭審問，判以罪名。審判戰爭罪犯，在上次大戰後，對於德國雖未實行，但在此次大戰後，對於日本及其他軸心國家均有實行的必要。

(五)在日本本土附近各軍事要地，設立監視地，由聯合國家管理並派兵守衞之。如千島羣島，小笠原羣島，對馬島等，皆應闢爲監視地。此項監視地制度之存在，應有較長之期時，並不隨聯合國家軍隊將東京及日本本土其他大城市交還日本之新的負責政府而消滅。

戰後對待日本，這些辦法固屬必要，但是否卽能防止住日本永不會再侵略了呢？卻是一個疑問。我們可以拿上次大戰後德國爲例，凡爾賽會議中協約國不是解除德國所有的武裝，講求各種防禦設施嗎？然而，二十五年後德國卻又崛起來了，而且比上次力量還大，氣勢還兇，可爲殷鑒。所以戰後對於日本如何處置，實在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日本的力量，大半建築在它人民意志之集中這一種精神上。日本

人民意志何以集中？可以從兩方面論之，即：

（一）皇室中心　日本天皇至今仍為神權時代的偶像君主，他享有絕對權能，皇位至尊至高，人民對這偶像不能說一個「不」字，人民須無條件服從之。日本自從大化改革，建武中興，乃至明治維新的幾次政治運動，可以說都是皇室的中心運動。皇室在人民心理中，實發生一種說不出的魔力。一九一二年七月　治天皇忽罹疾病，迨消息發表後，東京市民齊集於宮城二重橋祈禱者，不下十數萬人；及既死，大將乃木希典且自殺以殉。二二六事件，儼然不可收拾，但昭和天皇下一道勅令，便立刻風消雲散了。這魔力卻為日本軍閥利用之，他們驅策其國民向外作無止境地侵略，謂為發揚皇威，實現神武天皇大詔使八紘為一宇。

（二）武士道　照日本人山岡鐵舟解釋：『武士道要素有四：一、報父母之恩，二、報衆生之恩，三、報國家之恩，四、報三寶之恩。三寶者，即佛、法、僧也。實行此武士道無他義，一言以蔽之，至誠無我而已。』如此說來，日本武士道似乎實儒實佛，非儒非佛，幾於參會融化，兩取其長，而自成一道。這未免故玄其說。老實說，武士道的由來，即起於人類之好名心，重然諾，輕生死，不問是非，不問曲直，惟以對施恩者（主子）至死不變為快，以期死後留名而已。其初，武士道是指中世紀時，日本武士（家臣）對封建諸侯首領（大名）盡忠的一種精神；後擴為君為國獻身犧牲的意義。這只能說是奴才的忠，不能予以過高的評價。不過，後世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征服世界，故推其擴而大之，為『大和魂』，為『日本精神』，為『日本主義』，為『新日本主義』，以造成一種訓導國民精神之原理，使人民了解當礮灰是為大我而犧牲小我的。日本軍閥利用此『道』，曾佔領了旅順口，曾擊沉了威爾斯親王號，曾偷襲了珍珠港。

所以，聯合國在戰勝日本後，處置日本的根本問題，我以為必須消滅日本以上的兩種思想。然如何消滅之？

第一　首先要推翻所謂「萬世一系」的皇室，使日本人民失掉此一中心思想，軍閥無從再利用之。

第二　日本的皇室既已推翻，日本原有憲法當然亦應修改。日本原有憲法名為天皇憲法，實為軍部憲法；故日本陸海軍大臣在名義上雖受內閣總理大臣之統制，但因第十一條十二條之規定，卻可利用傀儡天皇統帥大權，而左右內閣，致形成為軍部獨裁之局。故聯合國家應使日本之新的負責政府採用一種合於民主精神之新憲法，以替代原有之軍部憲法，俾日本將來得列於世界民主國家之一。

第三　上列二點，施於戰敗的日本，固非難事，但仍嫌欠徹底。不觀上次德國戰敗後，雖將霍亨瑞隆皇室傾覆，並使德人有威瑪憲法之頒布，但曾幾何時，即有希特勒之崛起，其野心之大，實不亞於威廉第二；納粹的政綱便替代了威瑪憲法。因此有人主張，對付日本最徹底的處置，不如把日本的人種加以改造。此說確有見地，並非感情之談。日本大部分人民是系出馬來，小部分是系出通古斯和蒙古，至於原有土著則為蝦夷人，實日本之舊主人，現已人數無幾。當史前時代，通古斯人先由朝鮮半島南渡入居日本。後有馬來人由在日本西南之太平洋島嶼中乘船順着暖洋流（日人稱黑潮）而漂流到日本，由於移入人數特多，故其種族型及性成之遺傳於後嗣者，亦特普遍。今日大多數的日本人既為此蠻南洋漂流民的子孫，所以遂成為一種殘暴陰詐，不顧信義之民族。我們為未來世界永久和平計，對於這樣的種族，自應加以改造。美國人類學家胡敦主張「戰後處置日本之方法，應委任中國人在日本管理殘餘於本土的日本人民之任務，將中國人及其他亞洲人民一部分移殖於日本，並禁止純日本人間結婚。」此種方法固極徹底，但是否切實可行，則視戰後殘餘於日本本土的人民多寡。如戰後日本本土尚有男子人數頗多，此種方法殊不易付諸實施，如戰後男子稀少，則行之似不至有多大困難。日本在戰後，其男子數目定比女子少得多，但男子既尚有相當數目，若一概禁止其與本土女子結婚，在實行上，恐亦頗有困難，不過日本既為女子過剩，則從亞洲他處移居日本的獨身男子，自易與日本當地的女子結婚。如果此等移入

的男子是人數很多，且在若干年內還是繼續不斷地移入，則對於日本種族改造或可發生有重大的影響；若移入的獨身男子是數目不多，或數目有相當多，卻非繼續不斷地移入，如是對於種族的改造，實難望其有什麼成績。

第四　假定戰後日本國內的男子尚相當多，而我們又不能禁止他們和本土女子結婚，那末，我們對於日本，還有什麼較易實行的，較妥善的處置的方法呢？

有許多人以為聯合國家如使日本吃了幾次大敗仗，則日本國內一定會發生革命。這種意見我卻不敢輕於附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斐弗爾在去年十一月號美國亞細亞雜誌內發表一文，稱西方國家向為日本宣傳所矇蔽，多認為日本人民亦愛好和平，其侵略行為僅為軍閥跋扈所致，這種見解實在是大謬不然的。「在事實上，軍事統治是日本社會上傳統的特色，他們軍人的作風也就是日本立國精神的真相。若說日本人民反對軍人專政，卻是確與事實相反的。為了認識戰時和戰後應付日本的對策起見，這一點是必須要明瞭的。現今和過去，我們均從未有任何事實，足以證明日本軍人的行為，是為大多數人民，甚至為知識份子所反對。日本軍人和人民對於所採的方法，也許有意見上的紛歧，可是對於目標，他們是一致的。」我們讀了斐弗爾教授此文，可知日本的侵略暴行，是軍民一致同謀的，侵略中國，以及發動太平洋戰爭，不能說是日本軍閥的野心，實是日本全國人民的野心。斐弗爾教授又說，「假如日本人民有權自由決定對華作戰或放棄侵略的企圖的話，誰敢相信他們會選擇後者？假如把『承認侵華失敗抑或向美宣戰』一問題付諸日本全國人民公決，他們是一定要對美宣戰的。」日本全國人民既為與軍閥沆瀣一氣者，自非要走到無路可走時，決不願輕和軍閥分道揚鑣，或發生革命。黑龍會是日本一種最有勢力的，半公開的祕密結社，其宗旨和軍閥的「大政方針」並無二致。日本舉國上下，所以時時刻刻皆在侵略他國這個念頭上痛下工夫者，實在不能不歸咎於日本的國民教育。這種國民教育，實與德國的國民教育以「德意志超越於一切」，可說是同樣地荒謬。日本人自幼即腦筋中充滿了所謂「八紘一宇」之征服世界的荒謬觀念，因此全國人民遂成為一種妄自誇大的，好侵略的民族。益以自甲午以來，日軍閥又打了幾次勝仗，故日本全國人民的侵略野心遂越發變本加厲了。故我以為，聯合國家在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應該徹底改造日本的國民思想。教育固不能改變人民的天性，然而殊足以增益人民的知識，糾正人民的不健全思想。所以，我以為，對於戰後日本的處置，以修改教科書和灌輸民主思想和中國政治哲學，為最易實行，最易收效之最切要的方法。上次大戰後，凡爾賽和約對於戰敗的德國所作的處置，可說是束縛重重，然而還是無濟於事，這就是因為當時戰勝的協約國政治家，疏忽了應如何使德國人民放棄「德意志超越於一切」的那個荒謬觀念，未能對於德國實施一種可以改造德國人民思想的教育之故。那麼，我們現在談到處置今後的日本，豈可忘記了這一件重要工作，重蹈以前協約國政治家的覆轍。

中國「人本主義」之宗教及其典禮

程石泉

一　立總義

中國人之宗教情緒，得自藝術之神思，詩與之觸發。
中國人之宗教精神，不以超性生命為理想，不以天堂永福為論。

的，祇在體會天地之神功妙用，鑑照天德，律己向善，而以天人合德爲理想，天人交感爲表徵。蓋所以盡生靈之本性，合內外之聖道，贊天地之化育，參天地之神工，以完成人之所以爲人，故謂之爲「人本主義」。

中國人所以爲齋戒犧牲，欽崇膜拜之事者，蓋出於神道設教之意，是故中國宗教無聖蹟，無聖事。有官守者其祭祀有典，庶人之祭祀無常規。邀聖寵端在爲善，「天威」，「天命」，「天譴告」，皆所以昭炯戒；其能改過遷善者，天無棄民。

中國人所謂上帝神鬼，皆爲古之聖王，而爲執政者之祖宗（如見於五典者），但非『擬人主義』。蓋以聖王功德在民，死後民受其利，民感其德，民畏其威，但又無以名之，於是神之，聖之，欽崇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其源本乎崇德報功，其過程則爲民族歸聖(Deification)。

中國民族重生德，爲政亦以好生而治民。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他如日月星辰，民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用，故皆足以引起崇德報功之心；加以其生德妙用，莫可明言，故亦足以觸發虔誠膜拜之情；更以洪鈞運轉，生死無常，有非證理所可明者，焄蒿悽愴，亦足抒發神靈在上之感。凡此與『生殖器崇拜』，『自然物崇拜』，大異其趣，原難牽涉。

至於巫覡通靈，鬼魂作祟，天災地異，人祆物怪，魑魅罔兩之談，原背乎宗教之聖情，事出於人類推理作用之失敗。其禜、祓、禳、禱之道，行於黎庶愚氓，一概不入國家祭典；且士大夫之有官守言職者：如申繻、宮子奇、梁季、晏子輩，向不與以鼓勵，但持人本主義，以闡明神道設教之旨而已。

二　辨稱謂

(甲)天　稽於六經諸子百家，多有致疑於鬼神者，但人事之外，更有所謂天者，似無所用其懷疑。孔子論鬼，則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棄而不養；吾欲言死者無知也，恐孝子順孫棄不葬也。」有知無知，皆從人事立論，然一言及天，則毅然斷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至臨危殆，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顏淵死，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則曰：「余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此蓋於無可如何中，呼天以自誓者。孟子崇仁義而尚王政，以仁義之在人心，如日月之麗乎天。天者乃性命之所賦者，故謂「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譬如耳目之官，受自天，心之官亦受自天，若不思則耳目蔽於物，而心則馳放不得矣。故孟子之天，乃性命之天，並引太誓「天視自我民視」，太甲「天作孼猶可違」之語，用以策勵人君，努力於盡性知命，施行王政。故孟子乃人本主義者也。荀子論天，重在材官天地，役使萬物，蓋所以重乎人治者；故謂「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國之興亡，人之禍福，非操自天者，故「聖人不求知天」。凡崇天威者爲可恥，畏天命者爲無益。荀子於墨子之尊天事鬼，則謂：「大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此乃極端之人本主義者。孟荀兩氏，乃孔後儒之大宗，其對於天人關係，所見如此，而於天之所以爲天，亦諉神秘之域，不作宗教之推演。孟子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荀子則謂「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疑作所）形，夫是之謂天。」蓋皆感於宇宙間爲具神功妙用，有非人知所可盡知者，於是悉呼之天。此乃本乎哲學之直覺，藝術之想像者也。老莊哲學之妙諦，端在稱述沖虛周行之妙道。老子有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或存，」「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故道乃「萬物之奧」，「天地之根」，莊子有謂：「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天所以不產而萬物化者，蓋有道之妙用在，故舉天地之間，無非「妙道之行相」也。凡

老莊所論之「道」、「天」、「鬼」、「神」，俱爲哲學之「名言」，原不具若何宗教之含義也。墨子論天，頗具主宰萬物之義。天爲最初之創造者，爲最尊貴，最智慧，是公平之權威者。然天亦不能恣己爲政，有爲民政之。蓋天之於民，恰如父母之於愛子。故曰「天之獨厚於民」，「天之愛民厚也」。墨子雖欲尊天鬼，但亦讚美人生，故力倡「兼愛利與偕同」。蓋愛者乃藏於心而用之不竭之眞情也。（墨子有謂「生以兼愛」，「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利者乃材官萬物，役使萬能，兼羣美而利天下者。是則墨子之道，並無大艱難行之處，一本乎人情之所與，特以天道爲之推動力耳。詩書每言天與上帝，「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言上帝者。又如「天敍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唯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此言天者。綜合詩書論天之品德：有天秩、天敍、天命、天休、天討、天罰、天戒、天監、天視、天聽、天矜、天威、天聰明、天眷祐、天孚佑、天降災、天震怒、天弗保、而君王雖可「恭行天罰」，「克享天心」，「克配上帝」，但應「弗僭天命」，「顧諟天命」，「永保天命」，「欽崇天道」，「明天所欲」，「避天所惜」。是則於人類外而有一「擬人」之皇天上帝在，司人世間善惡賞罰，而爲意志之裁判者。究實仍依神道而設教，藉皇天上帝以勸善耳。所謂「天道福善禍淫」（湯誥）。「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訓）。且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皐陶謨）。是則吉凶禍福之事，其權仍操之在人。若我德彰，則「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大禹謨）、若我誠著，則「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大禹謨），「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大禹謨），若不幸而夭，則「非天夭民，民中絕命，」（高宗肜日）。若不幸而敗，則「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酒誥）。即如尊天事鬼之墨子，亦謂：「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欲，」是則與摩罕默德左手執劍，右手執可蘭，以訓示下民者，大異其趣，又與猶太人上帝，身居昊天，號令萬方者，亦不相牟。要而言中國人之宗教爲人本主義之宗教，就西方歷史中之宗教而言，乃爲一自相矛盾之名稱：其故一以中國人向未假想在人世之外另有一超人世之極樂界；二以中國人之「天人關係觀」，既非敬者與主宰之關係，又非治者與被治者之關係，乃天人交感之關係也。其義當於下文中見之。

（乙）神　鬼　妖精、魑魅、罔兩　易經對於「神」之解釋，最盡其妙。有謂「陰陽不測謂之神。」（繫傳）「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繫傳）「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傳）總括其義，則見於說卦傳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故後世往往以「神妙」並稱。蓋萬物中有妙不可言之品德在，既妙而不可言矣，但又不得不言，姑以「神」字形容之。老子論神，亦有妙解。「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信」「申」爲叠韻，而通假，申則爲神之本字。所謂「其中有信」者，即謂「其中有神」也。據此則老子所謂神，乃惟恍惟惚之象，窈兮冥兮之精也。其意亦重妙用。禮記諡法則謂：「民無能名曰神」。孟子則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論語贊堯之爲君，則謂「蕩蕩乎民無能名」。民所以無能名堯者，蓋以堯之爲君，克配天德，民蒙其澤，而感其恩，於是呼之爲神，贊之爲聖，以頌其欽崇感佩之情。

古人每以鬼神並舉。易繫傳有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遊魂，皆所以貌情況，非實指。中庸有傳「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弗聞，體物而不遺，」是在表明鬼神之德無實體性，非可以感覺知者。又禮記宰我問鬼神於孔子，孔子答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神教之至也。衆生皆死，死必歸土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祭法）此種解釋，似有就人之死後，靈魂着眼之意，但究實其形狀，則爲精氣，則爲

昭明，蓋仍爲恍惚窈冥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章太炎先生於國故論衡中，就文字學之立場，對於鬼、神、祇、各字之義，更有解說：「何以言鬼。鬼者歸也。何以言神。神者引出萬物者也。何以言祇。祇者提出萬物者也。此皆以德爲表者也。」此說最得鬼、神字之本義。實則皆所以形容宇宙間神功妙用之德者也。

就老子言「精」者窈兮冥兮，亦爲道體品德之一。就孔子言，乃人死之後氣，揚於上之昭明。王充則有謂：「物之老者其精爲人。」此亦就「精華」，「精神」而言者也。

老子有謂：「正復爲奇，善復爲祅，」復者傾反也，正之反爲奇，善之反爲祅，正之於奇，善之於祅，乃相反相對之名詞，與老子上文禍福相反相對之義相似，荀子論祅，着重人事，「人祅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生，夫是之謂人祅。祅生於亂。」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之伯宗說明當代變爵之理，有謂：「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蓋無論其爲人祅物祅，皆以其失時反常，遂覺詭誕。

江紹原於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一書，對於「魑魅」，「罔兩」有精審之考訂。其歸納音及形體而通假者，有「魑魅」，「罔象」，「方良」，「罔浪」，「罔閬」，「無傷」，「蝄蜽」諸字。就其意義言，皆爲形容詞之名詞：『其所形容者，明明是「恍惚窈冥」「虛無」「無形體，無實質，若雲若煙若影，而又決非雲非煙非影的狀態，似有實無，似無而又實有的狀態，簡言之「神」，或「精神」的狀態。』（見上書四九頁）

綜合上文之義，所謂神、鬼、祅、精、魑魅 罔兩者，無一非形容詞，或者本乎哲學之直觀，或者本乎藝術之想像。蓋皆緣於天地人物間，有某種「不可究詰」，「不可方物」，「反乎常道」，「出乎意表」之「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其品德爲「莫知其然而然」者。於是以神、鬼、精、祅、魑魅、罔兩諸詞形容之耳。至於是有是無，亦在未定之天。善哉莊子之言曰：「有以相應，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也。」

三 人神與禮

吾前言中國宗教，無宗教人，有之則爲史 祝 宗、巫。但觀其職掌，實爲朝廷之官吏。據國語楚語下謂：「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見鬼者——韋昭解）。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祝太祝也，掌祈福祥，——韋昭解。）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宗伯也，掌祭祀之禮，——韋昭解。）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由此以觀 巫、祝 宗、各有其職守，但不外乎熟習祭儀，管理祭器祭品，必知祭典所由。韋昭於另父解巫覡爲「主接神」，史爲「主次位序」。故合之爲史、祝 宗、巫、覡之五官，各有專職，奉行故事。其職守見於周禮者，則「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之禮，……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又「大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春官）。「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誅之。」「小史……其

贊世，辨昭穆，……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敍昭穆之俎簋」（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恆，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春官）。他如見於周禮之古人職人古夢眡祲保章諸人，其職掌亦不外「辨吉凶，觀妖祥，」其分位似卑於史、祝、宗、巫耳。如今見於甲骨卜辭之卜人（卽史官），亦不過爲朝廷掌史料，或參與灼龜辨兆刻辭而已。以上五官及卜人，其職掌之見於國語左傳者，大抵備君王之咨詢，解說災異之事，其自身實無若何神權可言，當不能與其他宗教之宗教人，相提並論也。

然則就中國之宗教而論，其措爲神人之中介，且操萬民幸福之運者，究屬何人？蓋於入祀典之古代帝王聖賢豪傑，無不具「通神明」「參化育」之聖德，此輩人格神爲從王所崇禮，百姓所膜拜，皆以其在生之時，功德煥著，百姓蒙其恩，感其惠；日居於其恩惠而不忘其德業成就之所以，不覺發生敬畏之思，呼之爲神，贊之爲聖。易繫傳贊包犧氏之作八卦，可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蓋以天地化育，日月運轉，四時代興，其神妙處皆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唯明君、哲王、聖、賢、君子，方能「窮神知化」，「知幾通神」，又以天道「苞容萬類」，「變通化成」，「致仁存愛」，「繼善成性」，「無偏無私」，「悠久長存」，雖「生而不有」，雖「爲而不恃」，雖「成功而不居」。

唯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況於鬼神乎？（易乾卦文言傳）

唯天子：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居處有禮，百官得其宜，萬物得其序。（禮記經解）

唯聖人：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故聖人之德，蓋綜乎天地者也。（墨子尚賢中）

唯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易繫辭傳）

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

唯大聖：知通乎大道，應變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隣。（荀子法行篇）

唯包犧氏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唯神農黃帝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至於孔子乃不位之「素王」，但其通德類情參贊化育之功，上可配天，下可儀民，中庸言之綦詳，而歸結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所謂參天地之化育，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原爲「理想人格」。此種理想之產生，實本乎中國人之「天人之際」觀。蓋中國人自始卽未嘗離乎天者。人之於天，原取協作參與共同分演之態度，天地卽爲歡愉欣悅無間之場所，人便爲其參與者。兩者相需相待，實難略輕略重，缺一則無以實現價值矣。荀子見之最明，論之最當，如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性惡）「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王制）就中國民族哲學智慧而言，所謂「道」者，分言之爲諸般價值，合言之乃價值之統會。「聖人爲道之管。」（荀子儒效）卽聖人爲價值統會之樞紐。凡見於天地之諸般品德，大人、君子、聖王、明君、亦應有諸般品德符合之，是爲參乎天地，是爲「天人合德」。書之堯典有謂：「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大禹謨有謂：「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舜典有謂：「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老子謂：「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凡此稱謂，無不一一本於「天人合德」之價值標準。考古代帝王入享祭典，其功德可得而言者，計有下列五項：

(一)法施於民則祀之；
(二)以死勤事則祀之；
(三)以勞定國則祀之；
(四)能禦大菑則祀之；
(五)能捍大患則祀之。

據禮記祭法及國語魯語

其入於五典，如皇帝、顓頊、嚳、湯、契、冥、鯀、禹、稷、文王、武王。(以上爲禘、郊、祖、宗、四祀之人格神)又如舜之後幕，禹之後杼，契之後上甲微，后稷之後高圉(以上爲報祀之人格神)，無不功德在民，合乎上列標準者。茲依禮記祭法、禮運、國語魯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所載之五典兩祀人格神，表列於下：

祭典＼帝名＼時代	有虞氏	夏后氏	殷人	周人	杞	宋
禘	黃帝	黃帝	嚳(舜)	嚳		
郊	嚳(堯)	鯀	冥	稷	禹	契
祖	顓頊	顓頊	契	文王		
宗	堯(舜)	禹	湯	武王		
社	后土(句龍)					
稷	農(柱)		周棄			
報	(幕)	(杼)	(上甲微)	高圉		

凡見於括弧中之人格神，爲國語魯語所舉者；而社稷兩祀人名，爲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所舉者。

其功德：

神	功德 禮記祭法	功德 國語魯語上
嚳	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三辰以固民
堯	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舜	勤衆事而野死	勤民事而野死
鯀	鄣鴻水而殛死	鄣洪水而殛死
禹	能修鯀之功	能以德修鯀之功
黃帝	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	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
顓頊	能修之(能修黃帝之功)	能修之
契	司徒而民成	爲司徒而民輯
冥	勤其官而水死	勤其官而水死
湯	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文王	以文治(去民之菑)	以文昭
武王	以武功去民之菑	去民之穢
稷(農、周棄)	能殖百穀	能殖百穀(柱)；勤百穀而山死(周棄)
社(后土(句龍))	能平九州	能平九土
幕		能帥顓頊者也
杼		能帥禹者也
上甲微		能帥契者也
高圉		能帥稷者也

在周用以配郊之稷爲周棄，商以前作爲社稷之祀的稷，乃厲山氏之子農(國語左傳作烈山氏之子柱)，商以後則爲棄，是則周人社稷之稷，與用以配郊之稷一人也。

由此觀之，凡入祀之古代帝王，無不有赫赫之功，萬民共沾其利，而後之帝王不論其何所自出，亦概以其功而禘之、郊之、祖之、宗之、報之，一所以自尊自神，一所以從民望也。故孔子稱黃帝，謂民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於以見其膏澤之悠久，而民族崇敬之忱，亦歷久而不替也。

人神之祀，除五典外，尚有五祀。祀名為門、戶、竈、井、中霤，亦皆以功德在民，因以入祀。據左傳古有善於木工、水工、金工之三官守，謂之三正，繼以火正土正，名為五正。是則五正者乃五種工程師也。死後以其功在萬民，經帝王「受以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於是由工程師一變而為神明，受朝廷及人民之禮拜。五祀成立似有先後。禮記祭法有二祀、三祀、五祀、七祀，月令以五祀配春、夏、秋、冬、季夏之節令，而神名祀名，亦排列整齊，至於其功德究竟如何，白虎通亦有說明：

官正	人名	神名	祀名	品德
木正	重	句芒	戶	人所出入
火正	犂(黎)	祝融	竈	人所以自養也
金正	該	蓐收	門	所以閉藏自固也
水正	熙修	玄冥	井	井水之生藏在地中
土正	句龍(后土)	后土	中霤	象土在中央

五祀之形成，究因戶、竈、門、井、中霤、各具妙用，入於祀典；抑古代原有五正之官守，與夫木火金水土五項工程，以其功勞在國，澤思下人，而入祀典？殊難論斷。若屬前者，則所祭者為妙用，若屬後者，則所祭者為功德。要亦不背中國人之宗教心靈也。

前言五典禘、郊、祖、宗、報、之人格神，於春秋戰國時，「各有後裔，世有分疆。」（國語魯語）故雖入於朝廷祀典，為萬民崇拜之對象，其神化之程度，究不甚深。後以年代悠久，神化日益加深。漢儒司馬遷五帝本紀已有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而班固白虎通演說聖人，更顯過情誇張。至於梁五代人沈約注竹書紀年，對於入祀之古代帝王，其誕生與儀表，更多怪誕不經之談矣。究其實似仍受「天人合德」之理想所支配耳。班固有謂：

聖人皆有異表。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星名）。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皋陶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白虎通聖人）

上舉伏羲　黃帝　帝嚳、堯、舜、禹、皋陶、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以其聖神而入祀典，不拘於容貌上，亦有如此異表。班固據緯書，將其異表舉而出之，作一論斷，謂：「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其心理或出愚昧，但似仍不背「天人合德」之理想。據禮記及孔子家語所載帝繫姓五帝德所言五帝德，更不雅馴。（據司馬遷五帝本紀謂：「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則今之帝繫姓與五帝德皆非眞。）後之竹書紀年（梁沈約註明范欽訂）對於古帝王誕生及儀表，更多怪誕不經之談矣。

考五典五祀，非必盡屬帝王之禮。據禮記月令帝王奉行五典五祀，而五祀似亦流行於民間。五典中之祖宗兩典，民間亦可奉行，惟禮有隆殺，祭廟祭品有差等耳。祭法有謂：「王立七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皆月祭之，大夫立三廟，……享嘗乃止。顯祖考無廟，有禱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蓋庶士庶人所祭者，仍為祖考父母，以其無專廟，故名之為祭鬼耳。於此是見祖宗兩祀不論朝廷民間，皆屬重典。其故則祭義有謂：「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近遠，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又謂：「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敬也。」郊特牲有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孝經聖治章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荀子

於禮論中言之更爲精闢：「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先祖乃類之本，無先祖則人類絕，無父母則族類無以續，於是「報本返始」，「追宗溯遠」之情，不覺油然而生，是爲人類孝思之所源，儒家厚葬久喪之所本也。孝敬之忱至乎其極，對於祖考父母，亦有「神化」之要求，故孝經聖治章謂：「子（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禮記郊特牲則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哀公問則謂：「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事天所以如事親者，蓋以天者，親者，並爲宇宙萬類之生原也。論究其情，仍不背乎「天人合德」之要求也。

四　演說災異

吾前文謂見於詩書中中國人認爲於人類外，有一擬人之皇天上帝在，司人間之善惡賞罰，而爲意志之裁判者，蓋認爲天人之間，有交感之作用，民之爲善者，天降之百祥，民之爲不善者，降之百殃。但禍福殃祥之未降也，往往天垂象以示告之；示告之不足，則以異驚駭之；驚駭之而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此董仲舒之高論，實爲古代星象學發生之根源也。星象學志在究明天人之關係，基於如下之信念，即認爲人事天象間，具有普遍因果性，所謂「天事恆象」者也。此種信念以今日觀之，或有背於科學理趣，但當時實有無上權威，既足以指示政治之設施，又足以支配個人之行爲。觀乎左傳國語所載天災人禍之事，及史臣大人演說災異之辭，深感「人本主義」之宗教聖情，日益隱墜，而壞宗教（迷信鬼壇宗教）日漸滋長。迄乎秦漢如太儒司馬遷（專見封禪天官兩書）班固（五行傳）董仲舒（春秋繁露）亦深中壞宗教之毒害，而嗜星象災變之譚，甚至拘牽瑣碎，禁忌重複，殆若天地之間乃百妖之所窟，而人生則日在妖禍警懼之中者也。所幸代有賢明，不忘人本，仍以神道設教爲旨，持天人交感之說，用以破除迷信，勸人爲善。

古之執政者，對於天體天象本有祀典，如禮記祭法有謂：「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有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據春官則天子亦祭飌師、雨師、五嶽、百物、四望、墳衍、據月令則更有四海、名源、淵澤、井泉等等，遇有天災物怪（即天象之反常者），則祓之、禳之、禜之、禱之、祈之、詛之、獻之、酒之，蓋所以求免者也。

於易有所謂：「天垂象，示吉凶，」但聖人可以「象之」「定之」「斷之」，（如繫傳「八卦定吉凶」，又謂「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繫辭焉以斷吉凶」）換言之，聖人可以預測，可以先見，於易又傳「吉凶以情遷」，左傳僖十六年周內史叔興謂：「吉凶由人」，蓋謂吉凶隨人之情以轉移，是則天象與吉凶之間，並無因果必然之關係，荀子論之最爲精審：「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而無傷，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天論）是則災異與政事之間，亦無因果必然之關係。

但洪水倏至，廬舍爲墟，火災降臨，人獸爲灰，驚駭恐怖，不可抑止，至此理智推論，往往失其作用。然惟智者出而勸善，史者出而彈政。其見於左傳國語，有周內史過，內史叔興，魯之臧文仲，楚之子玉晤王，鄭之申繻子產，虞之宮之奇，齊之晏子。他如史嚚、仲幾、伯陽父、范蠡，無不藉災異以糾彈政事，對於民間愚昧行爲，頗多指摘。此蓋假神道以設教，認天人交感爲可能者，故荀子所論是也。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

凶。（天論）

所謂「文之」者，蓋以其行動非出諸知識之信念，乃故爲節儀以安慰人心者。據春秋左傳所載之災異，計有隕石、彗星、日食、大雨雹、火災、山崩、川竭、地震、等等，史臣大夫之所見，各有不同。

隕石

十六年春，隕石於宋，五隕石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僖公十六年）

叔興之「吉凶由人」論，誠爲「至理名言」，誤在以造作之謊言，迎合襄公之意旨耳！後之賈逵於穀梁疏將叔興之言，加意渲染，有謂：「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陰中之陰象，君子之訟鬩也。」似乎言之鑿鑿，頗能聳人聽聞也。而史記漢書亦屢引此事，作爲「天尊恆象」之例。

彗星

據史記天官書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彗星凡三見。張守節正義謂係文公十四年，昭公十七年，哀公十三年，據左傳昭公十七年及二十六年之彗星見，言之頗詳。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六物之占，在宋、衞、陳、鄭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昭公十七年）

申須以彗星見必有火災，用以除舊布新。梓愼以彗見之時間方向，而推論宋衞陳鄭同有火災，以水火干支之相配，而推論火災之時日，裨竈則思出鄭國除火之方法。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爲理由，」拒不之信。明年鄭果大火，子產乃「遷火死者之柩」，「出新客禁舊客」，「使郊人助祝史襏於玄冥回祿」，更「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子產之所爲，似乎有背於其理知信仰，實則子產爲之節文，以安慰人心者耳。正如荀子所謂「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

日食

據史記天官書謂春秋二百數十年間，日食凡三十六見，據左傳對於日食之解釋，謂陽氣爲日，陰氣爲月，陰氣侵奪陽氣，是以日食，伐鼓可以助陽氣之長，用牲於社，可以媚陰，是爲日食應行之禮也。

文公十五年左傳：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牲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又宣公十七年左傳：

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據左傳所載關於日食之禮，似乎頗有爭議，據平子謂伐鼓用幣，祇行諸正月朔之日食，其餘則否，且日食非必爲災禍之徵兆，梓愼謂「二分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因爲「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若是「至相遇也，其他月則爲災。」有則以爲日之有食爲陰勝陽，有水災，有則以陰陽薄鬬，而旱災，如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愼謂將火，昭子則謂將旱。

以上所舉之隕石，彗見，日食，都屬天體自然之象，皆非直接加害於人者，俱爲殃禍之先見，凶災之徵兆也。惟火水雨雹，直接致禍於民。

大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御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昭公四年）

申豐防雨雹之策，在藏冰與用冰，藏之所以固塞沍陰，用之所以消陰氛災，蓋皆所以助天地陰陽之宣化者。今既不能防患於未然，災害之生，亦莫可如何矣。

火災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命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昭公九年）

子產於十八年之火，亦曾有種種佈置。大體有關於消防營救者多，而於禳祓之事亦略有舉動，實則率行故事，慰安人心而已。

除上舉之災異外，其他災異見於左傳國語者，大都語焉不詳。如國語周語載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因以推論周亡。左傳成公五年，載晉侯以梁山崩而問計於伯宗，伯宗謂「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出次、祝幣、史辭、以禮之。」又襄公二十八年，春日無冰，梓慎推論宋鄭將有饑饉之災。又昭公八年，九年，晉國史趙鄭國裨竈都謂歲在鶉火，陳國將亡。又昭公二十年，日南至，梓慎望氛，謂「宋有亂，國幾亡。蔡有大喪。」司馬遷演繹其義，總論秦晉燕齊吳楚宋鄭之疆，皆有星象為應。

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史記天官書）

因以開後人演說災異之風，如董仲舒班固劉安王充輩務在鼓吹「天感」，以聳人聽聞，其距「人本主義」之精神愈遠，至於後之王莽劉秀輩偽造瑞應符讖，以為政爭之藉口，是乃製造迷信，其去乎宗教之聖情，實不可以道里計矣。

但春秋時代，對於天人之際或人神之際，有正確之認識者，並非無人。如左傳桓公六年，載隨之季梁止隨侯追楚，有謂：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如左傳莊公十四年，申繻謂鄭厲公曰：

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如左傳僖公五年，載宮之奇諫虞公曰：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焉。

如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晉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

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人，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

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欒季謂：

非神敗令尹，令尹不勤民，實自敗也。

昭公二十年，齊侯病疥，有誅殺祝史之意。晏子藉此諷諫修德：

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於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

史，修德而後可。

晏子之言，冰雪聰明，此於一班淫君暴主，擬借「豐粢肥腯」以邀福於神者，可謂當頭棒喝。蓋人神之間，原非諂媚賄賂之事。邀福端在爲善。

所謂神者，乃聰明睿知之士，假之以設教者，藉之以勸善諷德者也。其理趣則本乎中國人之「天人交感」說，究實以人爲本者也。

其上焉者，則以天道詔明，爲鑑殺價值之準會。其能通[illegible]情，參乎化育者，乃人之所以爲人之至高理想。凡能遵乎此種理想者，人亦神也。其理趣則本乎中國人之「天人合德」說；而其精神上則爲中國宗教之聖情也。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草於湄潭

再論中國人的組織力

范任

我們曾就中國社團的興廢消長的現象說明中國人的組織力，那完全是以個人爲研究對象的。現在請換一個角度，就民族本身的組織來考察一下，看看中華民族如何組織他自己。這種組織活動是民族天才的一種最高的綜合的表現，不復是個人或某幾個人的才智問題了。因爲全民族組織的最高原則，就是該民族的立國精神，而一個民族的立國精神，又是該民族人與自然長期接觸的結果，是該民族累世相承的集體創造。我們都知道文化是人的產物，聰明才智不夠的民族決不會產生一個高深的文化出來；但是我們還要注意，民族的風格與文化的特徵又要決定於其所接觸的大自然，因爲愈是優秀的民族愈善適應環境。大抵一個民族立國精神的形成，總是依照下列的程序進展：最初，自然環境給民族生活內容印上若干特質，這些特質又配合着自然環境，養成該民族的一種特殊風格；經過很長的時期，這風格的表現都只是潛意識的，一直到該民族產生了一些偉人，用行爲，規制，或著作，將民族風格意識化了，將民族思想系統化了，這纔形成明確的立國精神；立國精神再經許多後知後覺的人們不斷地闡揚，與夫無數不知不覺的人們一致地接受，便成爲該民族的生命原則，也可以說就是該民族的靈魂；它沁透了該民族每個人的心靈，浸潤着該民族的全部文化，支配着該民族的全部組織，除非該民族的分子和自然環境完全變掉了，否則這原則，這精神，這靈魂，是不會完全消失的。

我們試先舉希臘羅馬爲例。

希臘人和羅馬人本來都是所謂智勇雙全的北歐族，但因遷徙後所居住環境不同，終於形成兩種性格，造成兩種文化。希臘多山，有多變化而又規則的氣候，有曲折極美麗的海岸線，有良好的港灣和澄碧的海，有蔚藍的晴明的天空，所以希臘人不棄農而業商，智慧特別發達，既活潑而又樂觀，所以希臘文化以和美爲頂點，以哲藝爲骨幹，其政體尚自由，其理想的人物是哲人，詩人，藝術家。羅馬的天然環境沒有希臘那樣幽美，有地可耕而不肥沃，有海可航而無曲折的海岸線，氣候溫暖而無鉅大的變化；這種環境，初只宜於耕種，而耕種又是人與瘠土的一種艱苦的鬪爭，這種鬪爭是發展意志的，所以羅馬人意志特強；到後來人口蕃殖，單靠耕種不能維持生活了，不能不向外發展，能艱苦奮鬪的人向外求發展自然是多所征取，但羅馬人又是農業民族，農業民族都善保守，所以他們征取了一個地方便會長久地管制住；所以，羅馬文化以宏壯爲頂點，以法制爲骨幹，其政體尚權力，其理想的人物是戰士，是法律家。

中華民族在周以前的情況，我們還不十分明瞭，但是我們有兩個印象：一個印象是中華民族的始祖不論是土著的或是外來的，卻有一致的遷徙動向，由西而東，並且長久在黃沙流域的大平原上活躍着，各個支族就和希臘各支族一樣，浪潮式的一陣一陣，一層一層，向新的住所衝來。另一個印象就是那些最初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支族都是同族的分支，只因爲遷徙的先後形成主客關係而互相敵視；他們都各有其聰明才智，各有其文化貢獻，只因爲遷徙的遲早而有發展程度的不同。這些支族在黃河流域的大平原上同居既久，他們的血統和文化都被大自然環境所陶鎔而終於統一了。我們黃河流域的大平原，與希臘羅馬的環境相較，都截然不同。土壤是肥沃的，幅員是廣漠的，氣候是溫和而規則的，天色是晴朗的，四季均勻，萬物繁茂，生活優裕，生殖日蕃，易經裏所歌頌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大哉坤元，萬物資生！」以及中庸裏所說的「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都是中國大自然的寫照，決不是希臘人或羅馬人所能說得出來的。這樣和平博大的自然，必然發展和平博大的情感，所以中國文化以仁愛爲頂點，以禮制爲骨幹，政體尚道德，理想的人物是「君子」，是「仁人」「志士」，是「聖賢」。

中國思想之系統化是在東周時代，那時候百家競鳴，各以其學說炫世。但是他們無論如何紛歧，卻有兩個共同點：一個就是對大自然博大慈祥生生不息的現象之認識，老子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墨子也說：「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他們所接觸的大自然事實上是如此，怎麼能不一致承認呢？另一個共同點就是各家哲學都重視人的因素，而忽略物的因素，如道家倡「無知」「無欲」，儒家倡「仁義道德」，墨家倡「兼愛」與節儉，法家倡「刑名」「法術」，莫不以人事的治理爲中心；這種一致的偏重，顯然是由於當時土地面積與生產技能足以養活全部人口而有餘，而社會上的一切變亂都是因爲封建制度崩壞，諸侯相攻，弄得民不聊生的原故。在這種環境之下，要想恢復太平，並圖長治久安，自然要由「正人心」入手，一面發揚我民族固有的仁愛精神，一面自這精神抽繹出一些制度來，使一般人都易於遵守，永遠維持一個良好的組織與秩序。這正是當時儒家所努力宣傳的。而其他各家的理論，則不是不合民情，就是陳義過高，所以各家鬬爭的結果，儒家終於獲得壓倒的勝利了。

一般人都知道周公制禮，孔子言仁，仁與禮彷彿完全是儒家創造出來的。其實那都是長久以前逐漸形成的事實。儒家認爲仁本於「天地好生之德」，禮「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堯舜禹湯，五帝三王莫不「則天」或「法天」，亦即莫不行仁，制禮，周公孔子不過對這傳統的仁與禮加以理論化，明顯化而已。儒家這種說法當非完全託古自重，而是合乎歷史公律的。周孔以後，儒家統一了中國思想，成爲萬世一尊，仁與禮又經過許多學者闡揚，其理論愈益精深，其系統也愈益擴大了。我們可以簡單地說，仁統攝一切道德，禮是一切文物制度之總和。曾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中庸裏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中國的「五達道」都是從孝弟親親演化出來的，所以仁統攝了五達道。孔子說：「不知焉得仁」，又說：「仁者必有勇」，知勇配合了仁便是「三達德」，所以仁又統攝了三達德。人的私生活：飲食男女宮室舟車服御，公生活：祭饗飲宴朝聘酬酢；政治生活：尊君使臣貴爵尙德；依儒家看來，莫不以禮，也莫不是禮，全部禮記都是私生活，公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規條，所以禮包括了一切文物制度。或者有人可以說，仁與義，禮與教，儒家總是並舉，爲什麼在這裏卻抹煞了義與教呢？我們說，義不過是仁在施於實際時一個指導原則，教不過是傳播仁與禮的一種手段，歸根究底，只有仁與禮是中國文化的兩大基石。或者又有人可以說：禮是由仁推演出來的，談立國精神，拈出仁字就夠了，何必又特提禮字呢？我們說，我們特提禮，正因爲後世學者把禮看得太不夠重了。孔子是「深言禮」的，他說：「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可見禮的重要。禮雖是由仁推演出來，但究係一件事的兩方面，仁在內，禮在外，仁是心理底，禮是社會底；仁爲禮之體，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又說：「克己復禮爲仁」；禮爲仁之用，所以孔子說：「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舍禮何以治之？」又說：「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就仁與禮對人生的關係而論，二者同爲人生的價值：「仁者人也」，人而不仁便失其所以爲人，「禮者理也」，人而無禮，使失了人的本質，所以孔子說：士當「仁以爲己任」，又說：「不學禮無以立」，又說：「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引詩說：「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推而廣之，左傳裏所說的三不朽，也莫非以仁與禮爲指歸。仁的意義，孔子釋爲「愛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博施濟衆」等等，還很少涉及天人之際。到後來，大學裏說：「天命之謂性」，中庸裏說：「贊天地之化育」，樂記裏說：「人也者天地之心也」，宋儒又說：「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又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至此，冶宇宙觀，社會觀，人生觀於一爐，仁的意義可謂極深廣之能事了。

我們既已指明仁與禮爲我們的立國精神，現在看看它怎樣影響了中華民族的組織。

我們曾說，中國社會的基本組織是血緣組織與地緣組織，這兩種組織都是起於仁而成於禮的。宗族社會始於親親，由親親而敬宗收族；親親，仁也，所以宗族社會始於仁。宗族社會的基本任務是族衆對始祖舉行集體祭祀，在古時謂之「春禘秋嘗」，在現代謂之「做淸明冬至」；而「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所以宗族社會成於禮。鄉區社會是古代所謂之「鄰里鄉黨」。「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鄰里鄉黨之愛，即「仁民」之切者近者，自親親推演出來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以鄉區社會也始於仁。鄉區社會的重要活動是社祭，蜡賓，是鄉射，鄉飲酒，而社祭是「禮行於社」，蜡賓是「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鄉射要「進退周還必中禮」，鄉飲酒是「所以明長幼之序」，所以鄉區社會也成於禮。到了後世，血緣組織和地緣組織發達了，人口蕃殖，業務自亦隨之繁多，但是置公田，贍宗族，或獻義社，振困窮，莫非是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莫非是仁；酬應慶弔，貴齒尙德，莫非是禮，憑會長集議，旌善行，禁邪忒，也莫非是禮。仁與禮是涵養血緣社會與地緣社會的氣氛，如果沒有仁與禮，則這兩種社會儘直不可想像。過去有許多人將中國的家族制度和羅馬的家族制度相提並論，將中國的鄉區組織和歐洲中世基爾特組織相提並論，在細節上，兩種制度之間，兩種組織之間，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論其精神，則此則以仁，彼則以利，此則以禮，彼則以法，強相比擬，終不免皮相之見。

血緣團體與地緣團體是中華民族的橫的組織，也可以說就是中華民族的細胞；君臣上下的關係是中華民族的縱的組織，也可以說就是中華民族的血脈。這種縱的組織也是由仁與禮構成的。詩經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這懿德，就是仁。民是天生的，君是天立的，天立君臨民，就是要他「替天行道」，所謂「替天行道」，就是要他和天地一樣，「無私覆」，「無私載」，「一視同仁」。「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也，」大君又是「天民」的家長，也就是「爲民父母」，所以他要「子萬民」，換言之，君主要和父母一樣的仁慈。總之，君主法天也好，象父母也好，他要以「行仁政」爲唯一任務；否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會懲戒他的。假使他再有「昏德」，不特不行仁政而反賊仁賊義，則「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一夫，人人皆得而誅之，這就是革命。這種政治，充滿了神權色采，當然還談不上「民主」，但是「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我們卻可以說這是

地道的「民本」精神。再說，君與臣的關係，則完全是以禮規定的，禮本於仁，所以也就是以仁爲準。孔子說：「君仁臣忠」，又說：「事君盡禮」，又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都是說君與臣的關係是仁與禮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由父子關係推衍出來的，所以古人說：「君臣如父子」，又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但是這關係究竟是人爲的，而不是天然的，所以古人只說：「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沒有說：「天下無不是底君王」，唯其如此，所以臣的人格不被君完全吸收，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臣有此對待關係，所以中國政治很少走上獨裁專制的路。最後再說到「士」對於君主與平民的關係，這種人在中華民族組織中負着溝通上下的使命，是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的。他們對於上與下的關係，也不離仁與禮兩個中心。士出於儒，而儒，據胡適之先生考證，是殷代遺民而爲民間之職業的贊禮者；到了孔孟時代，士要「仁以爲己任」，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士的品質大有改進，地位也大見提高，他是人民的教育者，是仁與禮的傳播者；再到後來，家族社會和鄉區社會的組織日見嚴密，因爲貴齒尚德的關係，他又成了這種社會的首領，因此也就是民衆的組織者和領導人。士是要「下學而上達」的，而上達的方式很多，或者由於「選賢」制度，或者由於考試制度，或者由於「禮聘」制度，既「上達」了，他便做官爲臣，「致君堯舜上，能使風俗淳」；縱然不「上達」，只要他眞正「學而優」，眞正「抱道在躬」，他也是「席上珍」，也是「國之寶」，大臣乃至君主都是要「以禮爲媒」而諮詢他的，他也可以影響政治。所以士總是以仁爲心，以禮爲門，上而匡君，下而化民，消除上下的隔膜而防止君民的對立。英國君主常提拔平民使爲貴族，歐洲的史學家譏爲天才的壓制，可以調和社會上的階級對峙，實則「布衣取卿相」的制度，「布衣傲王侯」的風氣，在中國自古已然。不過英國的制度以酬功獎能爲精神，中國的制度以尊賢尚德爲精神，一則表現其爲功利的民族，一則表現其爲仁禮之邦，是又不可同日而語。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有四萬五千萬人口，有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國土，經過了無數的危難艱險還能巍然獨立，並且日益滋大，這是世界上唯一的例子，過去有許多歐洲學者驚爲奇迹。現在我們應該知道這偉大民族的神奇之所在了。中華民族之所以有這個獨特的命運，是因爲他過去有了一種獨特的組織，而他之所以有其獨特的組織，是因爲他有其獨特的立國精神。血緣與地緣的組織，在仁與禮中涵育着，和人體的細胞一樣，在平時便順適地自然地繁榮滋長，使民族的全體壯健充發；遇到變局則一面能保持民族全體的團結，免爲外力所壓迫而碎爲齏粉，另一面又和白血球一樣，發揮其捍禦的功用，以保全民族全體的生命。我們試看，古代每逢亂世，尤其是異族入侵的時候，有多少悲壯慘烈的鬪爭是以血緣組織和地緣組織爲基礎而發動起來的！又有多少輝煌燦爛的光復事業是以同樣的或類似的團有組織爲基礎而建樹起來的！至於君臣上下的組織，其功用也不在社團組織之下。在平時這縱的組織和人身之有血脈一樣，聯絡着，循環着，防止壅塞，防止偏枯，防止亂萌；遇變局則成爲撥亂反正的最大力量，一面有許多「仁人志士」或名儒碩望，擋住「亂臣賊子」的凶燄，掩護着地方而保存其元氣，另一方面又有所謂聖君賢相和許多英雄豪傑出來，號召人民，重建秩序，休養生息，以恢復民族的健康。中華民族已經經過幾度的分崩離析了，而終於保持着其「大一統」的局面，探本窮源，我們不能不歸功於民族自身的縱與橫的兩重組織。這是仁與禮立國精神的偉大表現，同時也就說明了中國人有其偉大的組織天才。

印度文化東傳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之影響

陳安仁

一　印度文化的鳥瞰

現在印度的面積，比較全歐的面積，除去歐羅巴俄羅斯之外，沒有比它大的，約當英國本土的十六倍。目前的印度人是移住時代不同血統複雜民族的後裔。印度在有史以前，已有各民族的侵入，這等舊住民族，可以大別為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s）和非雅利安人兩種。所謂非雅利安人，是很早移住印度的低級民族的總稱，包括科拉利安人（Kolarians）和達羅毗荼人（Dravidians）等，這等民族雖和印度文化有若干交涉，但決非印度文化的開拓者，產生印度文化的，是後來的印度雅利安人之高等民族。印度文化，遠則經過印度歐羅巴時代，近則經過印度波斯時代。在有史以後，外來民族移住印度的，計有塞種，大月氏族，白匈奴族，阿拉伯人，猶太人，波斯人，歐洲人等，然除去信奉回教的阿剌伯人，和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人之外，其餘塞種以及大月氏族等，都被印度雅利安文化同化，開拓印度文化的雅利安民族，因為同非雅利安民族雜婚的結果，在血統上有被非亞利安民族征服之感。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半島間，開發它獨特的文化，遠紀元前四世紀末葉希臘人侵入之時，印度文化，已經發達完成，普及到一般民間了。

印度感受外來民族侵入之劇烈，為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如；然而印度雅利安民族的生活與文化，並未受到侵入民族的任何妨礙與變革，一直繼續到英屬時代的今日，世界上能保持數千年獨特之文化的，恐怕祇有印度和中國了。印度文化連續三千餘年之久，其現代所存的言語、文學、宗教、戲劇、習俗等，都有淵源可索，把這長時期的印度文化史，要想確實區分，是很困難的。在印度及歐美的學者，有時把發生於印度的諸宗教作標準，來區分印度的文化史，且利用宗教的聖典作區分的標準。拔特氏（A. Baroth）區分如下的五期：（1）吠陀教時代，（2）婆羅門教時代，（3）佛教時代，（4）耆那教時代，（5）印度教時代。印度的文化可以宗教哲學代表之，這以宗教作標準的區分，是有相當的根據。考察印度的文化史，可以分成印度人的印度時代，和外國人的印度時代。所謂印度人的印度時代，是從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到紀元後一千一百九十三年。按紀元後一千一百九十三年，是回曆的五百八十九年，這是回教王摩哈默德・葛禮（Mohamad Ghori）征服痕都斯坦之年，從此年之後，便稱為印度人的外國時代。印度人的印度時代如次：第一吠陀時代，從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同八百年；第二婆羅門教組成時代，從紀元前八百年，到同二百年；第三佛教隆盛時代，從紀元前二百年到紀元後五百年；第四婆羅門教復興時代，或印度教興起時代，從紀元後五百年，到一千一百九十三年。外國人的印度時代如次：第一印度教分派時代，自一千一百九十三年，至一千五百二十六年；第二大蒙古帝國時代，自一千五百二十六年，至一千七百六十一年；第三東印度公司時代，自一千七百六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第四英國皇帝直轄時代，自一千八百五十年以降。然印度數千年的文化，可說由雅利安民族代表之。在印度和歐美諸學者，論述印度的歷史、哲學、科學、文學、美術、工藝、以及實業的時候，一定選擇吠陀教，婆羅門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印度各教系，來區劃印度文化發展的各時期。研究印度歷史的專家斯密氏（Vincent A. Smith）有說：「印度歷史中最要的部門，是它

思想的歷史。」印度的思想，是神靈的，神祕的，形而上學的思想，可以統括於哲學的思想，宗教的思想。現代印度哲人阿難陀·阿闍梨(Shri Ananda Acharya)有言：「印度是哲學和宗教的鄉土，從太古以來的印度思想家，便在哲學基礎上建設宗教，在宗教上建設社會。」因此宗教與哲學，可以說是印度文化之主要特徵。印度的宗教與哲學，以解脫的教義與實踐，爲人生無上之目的；印度文化是以解脫和其實現法的規定，內觀，作爲中心而發展的。對於解脫問題，印度各教派不一律，依印度唯心哲學之精華的梵教，及大乘佛教所說，解脫不外是歸真我或佛性直觀吾人心源中內在的大靈，而悟入神人不二的境地之狀態。用大乘佛教的學語說來，凡是開顯本具的佛性到達佛果的，便是解脫。梵教用「我即梵」「彼即汝」的妙理，獲得梵我一如神人不二的靈覺的，便是解脫。所謂解脫，即是人而神化的意義。婆羅門教崇拜之神，爲婆羅門，婆羅門譯爲「梵天王」，爲宇宙全智全能之神，人類爲「梵天」所生，死後仍歸於「梵天」，是爲「天業輪迴」說之始，其教旨謂苦行，能惹起總果，故重苦修。婆羅門教，今稱印度教，其信徒爲二億七百五十萬人，爲印度最有勢力之大宗教。印度婆羅門階級，掌握政權既久，遂生一種驕傲習慣，謂自己階級清白，餘皆卑汚，創立摩奴法典(Manu Code)，謂婆羅門生於梵天之首，嚴定階級制度，流爲階級專制，紀元前六世紀剎帝利族(第二級世襲軍政民政)，先起抗之，婆羅門原有的哲理，遂根本動搖，遂給佛教勃興的機會。佛教教義，一方面重在消極之「遮情」，即教人克己寡欲，厭離現苦，入於灰身滅智之境，脫死生輪迴之苦界(小乘教所主張)。他方面，則注重積極之「表德」，教人降伏妄心，精進於業，以臻道德之圓滿，達到涅槃地位(大乘教所主張)。印度佛教的昌盛，並不在釋迦牟尼的生前，反而在他的死後，從第二世紀到第六世紀，曾有好幾次的突變，到最後一次結集以後，印度佛教，遂分成南北兩派，南派以錫蘭爲中心，日後傳佈到緬甸、暹羅和馬來亞等處。北派則以尼泊爾一帶爲中心，逐漸傳到中亞細亞、中國、朝鮮和日本。本文所指之印度文化東傳，是指印度佛教文化東傳中國後，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之影響而言也。

二　中印文化交通之路線

中印文化，是東方文化的兩大柱石，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之古典文化與印度的佛教文化，都佔有最輝煌的篇頁。世界四大古邦的埃及和巴比崙，都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蹟，而中印兩國卻並存到現在，擅個文化傳統，可說與日月爭光，永垂不朽。中印文化之交流，並不是完全建築商業關係上，而是以佛教文化的傳播，爲其重要的媒介。中印兩國壤地相接，有三千公里以上的國境，是彼此毗連；上古之時文化已有接觸，而文化之接觸，全由交通路線的展開。中國與印度的交通，究竟發生於何時，衆說紛紜，因爲中印初期的交通，並非是直接的，而是由西域諸國間接傳遞過來的；也許在很早的時候，有一部分文物，已經由西域諸國，間接傳遞中國來。有人說，在虞舜的時候，中印間的關係，已有往來的痕跡，因爲舜帝之弟名象，而象乃是印度產生馴養的，舜帝之弟，已用它來命名，可見印度文化的色彩，已經染到中國來了。有人說，在呂氏春秋裏曾說：「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這是說明殷朝的人，已經用象作戰，而史記大宛傳，引張騫的話說：「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人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乘象的戰術，乃是印度的特色，而殷人已知道用象作戰，則中印間的交通，在殷朝時已有端倪了。有人說，戰國時代中印文化，已有傳入，如騶衍爲印度人，其學出於印度，扁鵲的醫術來自印度。我以爲中印交通，中印文化交通，當以漢時始，較爲確實。梁任公佛教之初輸入云：「秦始王實與阿育王同時，……且當時中印海道交通似已開。」朱士行經錄：「秦王政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始齎佛經來華，王怪其狀，捕之繫獄，旋放逐回國。」印度阿育王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突厥斯坦，南至緬甸，俱有確證，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中印文化之交

通，當在中印交通路線開始之後。新疆爲上古中西交通之中心地點，西北陸路的交通，在春秋戰國時有兩條路：一從陝西、甘肅到新疆，一由河北、山西、陝西、綏遠、寧夏、甘肅入新疆，由新疆逾葱嶺，而與外國交通。日人藤田豐八，以左傳三十年昭公十二年的「復陶」，漢時名爲白疊布，係波斯語或突厥語(Parhta, Pagtar, Pugtar)的說音，此物在春秋時秦晉已有，是由西方傳來的。他又以秦始皇到處刻石頌揚功德，是受了波斯及印度的影響，印度阿育王的刻石爲圓柱，秦始皇的刻石爲長方柱，形式雖然不同，而均係刻石，均含敬調之頌德文，其間似係一脈相通。漢代之經營西域，爲中華民族在上古發展之一重大事件，又爲中華民族在上古交通開展之一重大事件，史記漢書中西域一名稱含義頗廣，其近者係指玉門關以西，葱嶺(帕米爾高原)以東，即今之新疆省(塔里木盆地)，其遠者即葱嶺以西今之俄領中亞全部，以及印度，伊蘭高原，阿拉伯，小亞細亞，甚至歐洲之羅馬帝國(大秦)，漢代史家亦列諸西域範圍之內。西域諸國之大者爲月氏，大宛，烏孫；張騫奉使始開西域，其後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置列郡邑，徙民充實之，宣帝時，天山南北及葱嶺東西諸國，悉爲漢之郡縣，自漢宣帝神爵三年，至東漢安帝永初元年，漢威遠播，凡百六十載。漢代通西域之路，有南北兩道，從鄯善傍南山(阿勒騰塔格山及託古玆山)北波河，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天山)波河(塔里木河)西行，至西勒爲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等國。而安息、奄蔡、黎軒、條支、身毒(印度)等國，皆有漢之使迹。葱嶺以西，爲大宛國，大宛西北爲康居，康居西北，裏海北部則爲奄蔡，大致均爲白種人。大月氏(阿母河流域)罽賓(克什彌爾)之東南，則爲身毒，大月氏之西爲安息(即波斯)，安息之西爲條支(即敍利亞)，條支盆西即爲大秦(羅馬帝國)。可知漢代之通西域，與中印交通路線至爲重要。據梁啓超的考證：當西漢初年，居住往山谷間的小部落月氏，爲匈奴所迫，西徙大夏。其時大夏方爲希臘人遠東殖民地的根據地，亞歷山大王部將所建國。月氏人既驅逐此地的希臘人，希臘人轉徙南下，移根據於迦溼彌羅。月氏人更奪取迦溼彌羅，進而爲印度共主，這是西漢景、武間到桓、靈間的事實。張騫奉使大夏的時候，而伊存譯經，卻正當月氏初征服迦溼彌羅的時候。魏書稱武帝降昆邪王，得金人事，所謂「金人率長丈餘」當係是佛像，昆邪地爲高昌，高昌今新疆土魯番地，本來去印度甚遠，佛教勢力，能否及此，尙待考證。西北之陸路交通，比之西南陸路交通爲早，西南之陸路交通，有一總路曰孟永線，即由印度之孟加拉灣，至雲南永昌(保山縣)，其分路有四：一爲永粵路，即由永昌經廣西至廣東的。一爲永瓶路，即由永昌沿五嶺山脈的山南至浙江。一爲永蜀路，即由永昌至四川。一爲永楚路，即由永昌至楚國。我以爲孟永線，在秦漢間中印文化交通之可能性爲少。中印文化交通，當在漢武帝通西域之後，較有可能。據傳說漢明帝有遣使求法之說，此說初見於王浮的化胡經：「永平七年甲子，星晝現於西方，明帝夢神人，因傅毅之對，知爲瑚王太子成佛之瑞應，即遣張騫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衞，值佛已涅槃，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王浮附張騫於明帝是不知有東西漢之別)。其次踵述此說者，爲東晉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議有：「漢明感夢，初傳其道」一語。又牟子理惑論說：「於大月支寫取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外西雍門外，起立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梁慧皎高僧傳攝摩騰傳說：「漢永平中，遣中郎將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梁啓超著漢明求法說辯僞，則以爲完全出自虛構。有說：在東漢以前中國人只知道有佛教而已，眞正的佛教教義的傳入，使它和中國人發生關係者，當斷自安世高，支婁迦讖始。安世高名淸，安息人，他於桓帝〇年到中國，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他的傳記，見慧皎高僧傳中，所譯佛典，尙有存者。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月支人，漢靈帝時，遊於雒陽，譯出般若，通行經品等十四部。他兩人之來中國，則在桓靈之間。假

定佛教輸入中國年代，在後漢桓靈之間，然非在西漢之開拓西域，打開交通之路線，安能卽突然輸入印度佛教文化。佛教的輸入，其所取途徑，是由西域陸路，到中國北部呢？還是直接由海道，來中國南部呢？換句說：佛教先盛於北方而傳入南方的呢？還是先盛於南方而輾轉傳入北方呢？主張前一種意見的，有蔣維喬，他說：「我國佛教，自通西域始來長安，決無可疑。印度人直接由海道來中國南部者，爲時較後。高僧傳載印度佛教僧來中國南部；所謂南部者，當指船泊廣州或交州而言，但此乘船而來者至劉宋始盛；劉宋以前，航路梗阻，可謂絕無。……相傳安世高圓寂於南方，近於附會。……閱七十載，康僧會南來，建寺於建業，名建初寺，是爲南地寺院之始。南方佛教，傳自何人，眞際難明。相傳建業佛教，傳自康僧會；但康僧會之前，有支謙居士者，在古代翻譯家中，當首屈一指。……支謙之往吳也，其南方佛教之始乎？」主張後一種意見的有梁啓超，總合起來：(一)漢武初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然而不久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因爲漢代黃支，就是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的建志補羅國(Kanchipura)。時以廣東的徐聞、合浦，爲海行起點，以彼土的已程不國，爲終點，實船轉相送致。從此以後，天竺、大秦，都遵海道貢獻，可證兩漢中印交通，皆在海上。(二)江淮人對於佛教佛學，易以感受了解，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於江淮，此後百數十年，粵淮交通甚盛，所以渡海移根的佛教，不久就播蒔於楚鄉，楚王英奉佛，卽其暗示。(三)眞正佛教佛理的輸入，首推安世高，高僧傳本傳說世高南來到廣州，而在豫章、荊州、丹陽、會稽、都有他的遺跡，淮以北則無有。梁氏根據以上理由，以爲佛教，實先從我國南方得有根據，後乃輾轉傳播於北方。我以爲漢武帝遣使張騫通西域，爲中印交通中西交通之導線，姑無論漢明求法說之眞僞，然必自漢武帝使張騫通西域之後，而後中印交通有直接間接之可能。因爲武力之開闢疆土，和以武力爲後盾之開拓交通，在有遠大企圖之軍事家和政治家，是有其可能性的。張騫之通西域，有二途可循，其一爲彼所經行之途程，此道北有突厥，南有西藏種，相接於其間，漢武帝爲通道計，自紀元前一一五至一一一年間，佔領今之涼州、甘州、肅州、燉煌等地。其二爲假定之途，當張騫在嬀水（按嬀水爲古之 Oxus 今之 Amou Daria）流域之時，見邛竹杖蜀布，詢之市自身毒國 (Sindhau)，張騫以爲中國西南亦可通西域；其後累費辛勤，終不得達。張騫在嬀水北岸所發見之大月氏，當紀元初間，卽越嬀水至印度 (Indus) 河流域，在今之 Kabaul 及 Peshavar 等地，建立強有力之貴霜帝國，卽今人所稱之 Indoscythes 帝國，此國君主，篤信佛教，紀元前二年時，貴霜王，曾遣使至中國，口授佛經。此說根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西戎傳所記：「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故中印交通，在漢代當以通大月氏，爲最重要的關鍵。據繆鳳林之考證：「漢與西域之道通，佛教遂由西而東，雖其入中國之年歲，未能確定，大約在西漢之末。觀後漢書載光武帝子楚王英，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紀元六五），賜王詔書，有伊蒲塞（居士在家佛教信徒）桑門（僧）等佛教辭句，攝摩騰，竺法蘭二僧，亦於帝時東來洛陽，譯經造寺。至桓帝則於宮中立浮屠之祠，以帝王之尊，信仰異教，民間自有奉之者矣。時則西僧先後蒞華，翻譯經綸，宏布法律。據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所載，自從明帝至獻帝，緇素一十二人，所出經律，總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云。」

中印交通在西漢東漢開展之後，所以當三世紀四世紀之間，中印文化遂得溝通。魏晉以後，名僧往來，傳譯遂漸廣也。由義淨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慧輪傳中，精悉室利笈多(Crigupta)王朝之時，有中國僧人二十餘人，從蜀川牂牁道入印度，後至七世紀上半葉唐朝國勢業固之時，復有人欲開雲南一道以通印度。雲南通道，除晚近利用之紅河一道，及難於跋涉不常通行之貴州一道外，尙有宜賓（敍州）東川、昆明，復由昆明趣大理一道，及由建昌還趣大理一道，唐代所傳重者，似爲此建昌一道，此道在安寧河及揚子江上流一帶，爲域外諸蠻所過，貞觀中劉伯英上疏言：「域外諸蠻漸附頭叛，請擊之，西洱

河，天竺道可通也。」按西洱河即大理河，天竺即印度也。這爲由西南通海之一道。至由北部之通路，在四世紀時，有唐古特族西藏種也，曾取長安，建前秦國，自是以後，佛教遂藉其力，廣爲傳布。紀元四世紀之末年，佛教自健馱羅(Gandhara)傳佈至東土耳其斯坦，後經唐古特人之媒介傳佈於中國北部，中國僧人之西行，即發端於是時，自是以後，中國僧人之觀禮運動，不絕於途，其中有法顯者，歸國之後，著有佛國記。法顯歸國百年後，紀元五一八年，東胡種建立魏國於中國北部之時，有胡太后者，命使者宋雲與沙門惠生輩，赴西域禮佛跡，各著有遊記，今皆佚而不傳；惟在五四七年楊衒之所撰之洛陽伽藍記中，見其概略。紀元六四八年，玄奘亦周遊印度，著有西域記及三藏法師傳，繼之者，王玄策奉使至印度。當王玄策使天竺之日，適爲中國全盛之時，六五七年，唐平西突厥，併其廣大土地，在六五七年至六六一年間，遂道皆至都護管領。自六六三年吐蕃逐吐谷渾於青海之外以後，即爲唐之強敵，常於天山南路及西突厥舊地一帶，破壞唐之企圖，而大食國又從而侵迫吐火羅各地。因此，七世紀之後葉，西行者，多捨陸而航海，據僧人義淨求法高僧傳所記六十僧人之傳記，可以見之。義淨於六七一年自番禺赴波斯船出發，航行二十日至室利佛逝(Cri Bhadja)，此地似今之爪哇，當時爲印度文化傳佈之區域，旋至末羅遊(Malaiur)，此地似在蘇門答臘島之巨港(Palembang)附近，既至今之 Kéda，在今馬來半島之西岸，又過 Nicobar 羣島，義淨名之曰裸人國，後抵印度恆河口之多摩梨帝港(Tamralipti)，即昔日法顯之登舟處。九世紀之阿剌伯商人 Soleyman 亦曾記述波斯灣北岸之 Syraf 港，有多數中國海舶行抵此處，可以證明當時海上交通之頻繁。宋朝建國於九六〇年，初期國勢甚盛，西方門戶復開，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經。自十一世紀中以後，中國僧人遂絕行跡，原因有二：(一)宋朝受契丹之迫，力防北邊，無暇及此。(二)回教侵入印度，佛教因之衰微，前此信徒頂禮聖跡，遂鮮矣。元代從事遠征，對於中印文化之交通，似鮮注意。明代於一四〇五年，命太監鄭和率戰艦徧遊印度洋，祇從武力之開拓而已。上述各節，爲中印交通中印文化交通，其路線所經之概路也。

三　印度佛教文化對於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

中國是多神教的國家，又是宗教複雜的國家；國內各種宗教，兼收並蓄，而印度佛教的勢力，在各種宗教中，最爲廣泛普遍，上至朝廷士大夫，下至窮鄉僻壤，無不受佛教勢力之深入與影響。佛教之勢力，在於中國何以影響如此之大？我以爲印度文化之佛教思想，與中國社會原有之神道宗教哲學思想，有許多暗合處，所以能融和無間也。在神話史上楚詞天問：「鰲戴山抃，何以安之？」與印度的以山負在龜王 Kurma 背上相同。天問：「夜光何德，……而顧兔在腹，」與印度的 Vig Veda 裏以 Sasa 即兔，爲月中的形象相同。天問：「羿焉射日？烏焉落羽？」與印度的 Mitra 以雷擊 Garuda 落其一羽同。山海經海外西經的「十日」與印度婆羅門教以日有十二，佛教以日有七相同。莊子逍遙遊的齊諧說大鵬：「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與印度金翅鳥 Suparna 身體偉大，飛行迅速相同。淮南子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恆娥竊之奔月，」及張衡靈憲：「恆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與印度的飛天 Rahu 巨頭，盜食 Amrita 成爲不死，而逐月相同。然而上述神話之相同，尚屬相傳疑似之談，而印度宗教哲學之思想，與中國本土之宗教哲學思想，有許多是相同或暗合，印度佛教文化，對於中國社會思想有影響，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中國社會思想，從歷史方面觀察，可說是注重神祕思想，和天人相關，敬神祀祖的成分爲多，也可說是注重玄虛陰陽五行存心養性之成分爲重。因此，他與印度佛教文化東傳之宗教哲學思想，有許多是相聯繫的。因此佛教思想傳到中國後，爲一般士大夫及社會人士所歡迎。後漢書楚王英傳：『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後漢書襄楷傳，楷上疏：「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此道清虛，崇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據梁啓超之考證，佛教在中國實產育於老莊學派最發達之江淮間，他以爲老莊籍貫，固屬南人，其治學則尙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故江淮人，對於佛教最易了解云。老子思想注重玄虛，對於本體論之意見與認識，與佛教思想，是一致的，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所謂道與佛教起信論所說之眞如相同。起信論云：「是故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眞如。」也即是老子所說：「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錢穆在國史大綱說及：「佛教與老莊，自有本原相似處。」晉、釋道安注經錄序云：「佛教延及此土，當漢之末世，晉之盛德。」是指在這時期，黃老清談玄言，與佛教思想之東傳，有所契合也。東晉時代，名僧與名士，和玄言相傾倒，如竺法深，友道林是；孫綽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賢，又謂牟尼大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喩道論）。南朝名士世族，王朝天子，多崇信佛法，至梁武帝而盛極一時；其時京師寺剎多至七百，宮內華林園，爲君臣講經之所，梁武帝三度捨身入寺，後陳武帝幸大莊嚴寺捨身，陳後主亦在宏法寺捨身。其時南方在一種超世絕俗的要求，接近佛之教義；北方則以佛法與塵俗人事相調劑。高僧傳謂竺佛圖澄（西域人）常以報應之說，戒石勒與石虎之兇殺。又謂佛圖澄，道化已行，民多奉佛。佛圖澄，常以方術歆動石勒、石虎；姚興、托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鳩摩羅什（龜茲人），通陰陽術數，遂與北方舊學統治經學，而屬以陰陽家言者訢合。此佛教文化與中國社會思想之影響者一。梁啓超以佛教思想，能傳入中國之原因，認爲：「西漢學術號稱極盛，還其內容，不越二途：一則儒生之注釋經傳，二則方士之鑿談術數；及其末流，二者往往揉合。……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無非欲發明此法則而已。」

季漢之世，民瘼已甚；喘息未定，繼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來，人類慘遇，未有過於彼時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顧影，且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無足恃，聞有佛法如來，能救苦難，誰不願託以自庇？」我以爲人生思苦時多，歡樂時少，豈惟亂世如此，因爲歷代帝王多不注重大多數民衆的幸福，政治放任，不知建設，爲民衆謀樂利，所以大多數的民衆，自生自滅，自爲掙扎，而禍害常可以易端而至。加以中國地理環境，自然之遺害至多，據說自漢高帝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至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共計水災一、〇三〇次，旱災一、〇五七次，合計二、〇八七次，平均每百年，水旱災九七次（陳達統計）。又公元一〇八年，至公元一九二〇年，我國歷經饑荒一、八二八次，平均每百年，約九〇次（金陵大學農學會調查）。災荒饑荒，平均差不多每百年九十次以上，災荒饑荒，影響於國民整個之生活與思想。所以佛教救苦救難解脫來生之思想，能深入中國社會之一般民衆心理。此佛教文化與中國社會思想之影響者二。印度文化之東傳，影響於中國社會思想，我以爲繙譯制度之廣博，能深入文人及士大夫之間，是有很大的關係的。南北朝以前之譯經，初期多爲大月氏人及康國人，而少印度人，其後哀帝延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初期譯經，僅爲入中國之印度僧人，略通漢語，一二人相對口譯，復苦述意詰難，須華人整理，才可讀。晉宋之間，漸有數人合譯，通梵文及華文者對譯，另有校定之人。謝靈運，好佛理，殊俗之音，多能辨。隋煬帝時，設翻經館，譯事不墜其緒。唐初在長安興善寺，並設翻經館。唐代翻譯成績，無過玄奘，義淨二人；玄奘居西域十七年，歸國後，譯經凡十九年，共譯經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義淨遊西域二十五年，返國後，凡譯經典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宋初之譯經院，與隋唐制度，大體相同；譯經儀式，更視爲莊重的事情。佛教東來，繙經事業，這樣通行，對於學士文人思想，當有很大影響，此佛教文化與中國社會思想之影響者三。中國歷代佛經繙譯，這樣的廣

博，在思想上與原有的思想匯流，儒家天人之學，所推本者有四：一曰易象，二曰洪範，三曰春秋，四曰齊詩。漢書所述諸儒爲此學者甚衆。諸書有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焦延壽等之附會穿鑿，雜於陰陽、災異、神仙、方術之談，與道家淸虛佛教涅槃淨土等說，頗相一致；所以宋明理學，成爲儒家思想與佛教思想道家思想之混合體。即如唐代昌明時代之文學家，如柳宗元、王維、白居易、賈島等，亦旁通釋氏的教理。宋代在中國哲學史上思想史上，所以能產生一新的學派，創立理學，就是因爲由漢以後的儒家學說，融會了佛家和道家的哲學思想成分，重新鞏固牠的陣營。黃震（字東發）有說：「二程既歿，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戴東原說：「宋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釋老之言以解之。」梁啓超說：「唐宋佛學極昌之後，宋儒採之，以建設一種儒表佛裏的新哲學，至明而全盛。」謝無量於朱子學派論宋代儒學與釋氏之關係說：「宋初諸宗，雲門宗最盛，有契嵩者，著鐔津文集，頗論儒釋合一之旨，集中有輔教篇，以佛之五戒十善，比於洪範之五福六極；又作皇極論，中庸解，明儒釋相通。」濂溪開宋學道學一派，二程受業濂溪，朱子又私淑二程，宋學淵源，蓋有所由來。陸九淵，學主涵養，盜心樂道，頗近宗門頓悟，後人本朱熹之言，以禪學攻之，而九淵亦嘗詆朱熹爲禪學。九淵曾問禪理於宋杲門下之德光禪師，其思想亦有所淵源。明代王陽明良知之說，不離佛氏之所謂覺性，援儒入釋，援釋入儒，所謂認識本來面目，亦多佛說。宋明理學，其思想影響中國者，有如何之大，可以知道的，而佛教思想間接由宋明之理學影響於中國社會思想者亦大，其救苦救難之說，則深入下層社會之人心，齋醮之舉，成爲宗教熱烈的形式，可以思矣。

四　印度佛教文化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之影響

宗教與經濟表面看來，是沒有直接的影響，但是也有間接的影響。佛教思想，傾向於出世，所謂向後要求；牠對於現實社會，是厭世的，感嘆的，悲觀的，幻想的成分爲多。佛教傳入中國，與本宗思想，雖略有不同，但也不外擴而充之耳。如三論宗，亦稱法性宗，以八不利劍，破除有所得邪執，而示中道實諦。成實宗，以明我法二空，能得無住意。天台宗，立一心三觀。慈恩宗，立八識，三性，三無性，三時諸法。俱舍宗，以衆生心空，我不可得立義。華嚴宗，以明緣起圓融理事無礙。淨土宗，以念佛因緣，回所修業，求生淨土。禪宗，由慧生定，離文字相，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密宗，以緣生，日輪諸觀，證心體之眞。律宗，以依戒律爲本，律之小乘，隨事制裁，多同印度外道；大乘因心制戒，對外道而立。諸宗總括言之：是明心見性，看破現實社會，而寄思想於最高之淨境，入世浮華物質之相，皆爲其所反對也。依理，對於現實之經濟形態，多少是立於反對之地位的。但是宗教的教義，雖然如此，宗教之宣傳與禮祝，不能離卻經濟的協助，而中國寺廟之建立，高堂講舍，極莊嚴璀璨之能事。自晉以後寺廟之建立，遍於南北，尤以南朝爲盛。唐代天下寺廟，總共有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武宗時，寺廟且增至四萬所。宋代崇信佛教，與修佛寺，造鑄佛像；太宗時，前後度僧尼十七萬人。可以知影響民生經濟之大了。南北朝時，社會有三個主要統治勢力，就是政府，大族，與寺院，寺院藉政府及社會勢力及迷信的引誘，攫取不少的土地與人民，這些土地與人民，在寺院的屬下，分成兩部分，一個是屬於僧曹即教會的；一個是歸於寺院的。僧祇戶及其所有的土地，屬於前者。魏書釋老志說：「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爲僧祇戶。」這就屬於教會的人戶。此外，佛圖戶，寺奴，及一寺的私有土地，是屬於寺院的。梁武帝時，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有十餘萬資產，寺內之尼，皆蓄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唐代莊田的攫取，正是貴族大地主的對手。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磑，侵損百姓，其他購買典貼，不斷的增加。寺院的莊田莊園，有至十五所者。寺院中管理莊田的僧人，叫做

「知莊」，莊田的收入，在除夕僧衆集會作總報告。耕種莊田的，多數是莊客和僧人。唐代寺院的財產，叫做「常住」莊田，有此好入息，無怪當時出財依勢者，盡度爲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而道人私度者，幾至數十萬；豔商大賈，詭詐臺符，冒名僞度。另一種僧人受度也出家，但受人們供奉，施舍，自己營求購買，也聚集許多田莊。前一種僧人，身死時，莊田自歸其子孫承繼。後一種僧人的財產，生時或捨入寺院，爲常住財。寺院及僧徒之追求莊田，與利用僧徒得免課役的特權，而受度人們之多，引起官府之嫉妒與覬覦，所以沙汰僧尼，限度僧尼的詔書，有時頒下了。唐高祖，沙汰佛道詔：「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免徭役；妄爲剃度，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乘，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至乃親行刼掠，躬穿窬穴，造作妖訛，交通豪猾。」到玄宗時，更屢次下令搜檢僧尼及寺院莊田。開元十五年，有勅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天下不信之徒，望風拆毀。安史亂後，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有十五萬人。這明明指出社會畸形的經濟形態，造成社會上的不安。宋代僧尼的社會地位，雖然降低，但侵占民田之風氣仍盛。如宋時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才給土著流寓。至私荒地田，法蕊與寶興觀寺，人民多以膏腴田土作荒廢，官司不察，而人民當水旱之時，歲一不登，人民不繼，即至荒廢，觀寺得之，田地無復更入民間。元代蒙古人，非常迷信佛教，故給于許多便利與寺觀僧人。當世祖、成宗、仁宗、泰定帝、文宗等帝王，都有田賜各寺廟，而順帝至正七年十一月，且撥山東土地十六萬二千餘頃，賜護聖寺。一個寺廟而賜田至十六萬多頃，豈非社會畸形的經濟形態麽？此外印度佛教之在於民間流行，人民因迎神賽會，禮佛祝祭，香火耗費者，每年不知其幾千萬，不論直接間接，也影響到社會之一般經濟狀況和經濟形態啊。

過去中印文化之交流，在宗教哲學思想的方面，影響非常之大；而在經濟方面的影響，也不算少。我希望今後中印文化的交流，在未來方面，要從新結合，建立中印文化交流之新人生哲學，新人生理想。這就是說不要向虛玄的方面，而要向實際的方面；不要向未來的淨土，而要向現在建設的人間樂土；不要向幻想的世界，而要向科學的世界；不要向壓抑征服的世界，而要向自由獨立的世界；不要向種族差別情感歧異的世界，而要向大同友愛的世界。兩國在大戰後，切實爲文化之合作，建立一新世界的新宗教，建立一新經濟的新合作。太戈爾有詩句這樣說：「祖國有秀麗的原野，偉大的山河，豐富的藏蘊。」我們知道印度位於亞洲大陸的南端，前面有茫茫無際的印度洋，後面有巍峨高峻的喜馬拉雅山，東南有恆河，及布拉馬普得江，西面有印度河，左抱孟加拉灣，右挾亞拉伯海，中部的印度斯坦，是千里平原，物產豐富的奧區。在農業方面，印度最大的生產，是米、棉花、黃麻、糖、煙草等，恆河流域的米，年產豐熟，有了旁遮普等西北區域，造成世界最大的灌漑工程；有了七九、〇〇〇哩長的運河，使這一帶的米與棉花生產，有大規模的發展。印度棉花的出產，僅次於美國，佔世界第二位；孟買、阿麥達巴德(Amadabad)和喀喇蚩，都成爲棉業中心。黃麻的生產，在恆河的下游等地，每年所製的麻布袋約一百萬隻。印度的植物油，佔世界第二位。糖的年產，達一百五十萬噸。茶的年產，爲四萬萬五千萬磅。鑛產方面：有錳鑛鐵和煤；錳的年產量，是九十六萬七千噸，佔世界產量三分之一。煤的產量，佔英國第二位，年產計二千八百三十四萬噸。印度的鐵鑛，在馬德那斯北部，和中央省的那格不爾(Nagpur)。銅鐵煤鑛的出產中心，在孟加拉省西面，與貝合爾及奧里薩省接壤的地方。現在著名之塔塔鋼鐵廠(Tata Iron and Steel Co.)成爲印度鋼鐵業中心。此外鐵道交通，在一九三二年已達六萬九千公里。印度已成爲現代的新文化國家，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之交流，在戰後與中國成爲親愛友誼

之鄰邦。以後文化之和融，不是空虛的人生思想，而是適於現代實際的人生思想。不是山林寺廟之畸形的經濟形態，而是海洋天空之科學的正常的經濟形態。具有二千年來文化交流之中印友邦，在歷史上，是具有豐富之意義的。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撰於坪石

說「不均」與「不安」

唐鉞

論語記季氏將伐顓臾，冉求，仲由問於孔子，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均」「不安」二語，既為孔子之所聞，則時人當已有此論。此論常為世人所稱述，但多不深求其解。茲試略闡其義。

孔子時代之社會，以近代眼光觀之，實為至不均之社會。當有四海之天子，及實際等於農奴之庶人，姑置勿論，即以周代班祿之制言之，據孟子告北宮錡之語：「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代耕之祿，以孟子所言「上農夫食九人」計之，小國之君所得已為一千四百四十人之食；卿所得為一百四十四人之食；大夫所得為七十二人之食；上士所得為三十六人之食；中士所得為十八人之食；下士所得為九人之食：是僅當今一小縣之國，其君，卿，大夫，士物質享受之等差已甚大；此實不得謂之均。然此尚為小國之制；次國大國，以孟子所言比率計之，不均尤甚。大國地方百里；今亦以「上農夫食九人」計之，其君得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卿得二百八十八人之食；大夫以降，與小國同，且孟子自謂此僅為周代班祿之「略」，則所列比率，必已經孟子之理想化。孔子時代之諸侯國，以兼并之故，其君卿大夫士實際物質享受之等差，必遠視孟子所言為大。然未聞孔子及同時之人對此制度有何抨擊。故時人之所謂均，非平等之謂，乃當時習慣所認為公平而已；雖如季氏之「富於周公」而尚欲兼并顓臾者，時人始謂之不均。孔子一己所謂均之理想，固當較此為高；惟對當時現狀懸擬改革之標準，自不得不「卑之無甚高論」耳。

然當時社會，雖自時人之眼光視之，除如季氏與顏回者外，尚未為不均；但實已呈不安之象。吾人無須旁稽遠證，但就論語所載觀之，已可得其梗概。孔子云，『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是時人已有此言。孔子甚至自謂「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註一）且貧富及衣食，孔子言之不止再三：是當時此問題已甚嚴重。據論語鄉黨篇所記，孔子一己之衣食，如「狐貉之厚，以居；」「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固非「不安」之生活。然其弟子仲由則「衣敝縕袍」，顏回則「一簞食，一瓢飲；」且孔子明言「人不堪其憂」。可知如顏回之「不改其樂」者，當時亦必罕見；凡不如顏回者，皆「不安」之人也。

當時社會既不安矣，而孔子又為「手無斧柯」之人，不能實施劇烈之經濟改革，故惟有出於以學說挽救之一途。其挽救之途大要有二：一為提倡道義而輕物質享受；二為勉人安命。今以孔子之言證

之，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放於利而行，多怨；」「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今本脫「道」字）；「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其旨均在勉人安貧樂道。其餘間接表示此意之言尚多，無須盡引。不特此也，孔子對於能安貧之弟子，則讚歎不置，若欲為其他弟子樹一模範者然：稱顏回則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云，「回也其庶乎！屢空。」（註二）其稱仲由則云，『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註三）凡此均反映當時之人至貧不能安之境地者已不少；即弟子中亦不乏其人：故孔子反覆叮嚀如此。

孔子又持有命之說，故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其言君子三畏，以畏天命為先。其惜司馬牛之疾也，則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自云，「五十而知天命」；又謂「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之」，意謂已無取貧之道而仍貧，即指運命而言。其弟子卜商亦信「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孟子又嘗述孔子生平行事，以證『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論語固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然罕言，非排斥之謂，乃「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之謂。觀論語雖云孔子罕言仁，而據論語本書，孔子正為提倡貴「仁」甚力之人；可知罕言非即排斥。更以後此墨家以信有命為攻擊儒者之工具，則孔子之持有命說，尤可無疑。惟孔子之持有命說，非在學理上有愛於此說，乃欲藉此勉人安貧耳。

然實際生活困苦之壓迫，究非學說所能解除。故自此以後，社會之不安，有加無已，因之繼孔子而起之墨子，即有進一步之運動。抨擊儒家有命之說，一也；雖亦貴義而不排斥功利，二也；提倡兼愛，反對儒家所主親疏之差等制度，三也；以身作則，與弟子共甘苦，四也。墨子之改革標準，實有合於「均」之真義。惜其道「以自苦為極」，與當時尚佔優勢之士大夫不相容，卒不能大行於世。

然墨子之道雖不行，對於儒家則不無影響。孟子雖斥墨者為「無父」，但實即受此影響之一人。孟子雖亦持貴義及安命之說；然其對人民經濟之見解，則較孔子之言為具體。觀其告齊宣王之言：「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故仁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對於「難能可貴」之士，僅一語及之；此後即詳論使人民安生樂業之重要；與孔子專重士君子安貧之說不同。（註四）其所以不同之故，一部份實由於墨家之影響。此外，孟子時代，較孔子時代，兼并更烈，卿大夫之荒淫豪侈更甚，人民之憔悴顛連更劇，社會經濟之不平等更為尖銳：此自亦為孟子對人民物質生活言之加詳之一因。

樂道安命之說，可以律己而不足以為政。使孔孟得行其志，雖不能必社會之均（人人經濟平等），至少亦可使其安（人人各安其業）。以孔孟之聖智，當不至於期士之安貧而使其祿不足以代耕，期民之知命而使其產不足以事畜：蓋惡衣惡食，固不當恥，然使簞食不足療饑，敝袍不足禦寒，家人之凍餒疾病，惟有坐視，則已至「救死而恐不贍」之境界；人生至此，豈特運命之說無以慰其心，即道義之訓亦將無以堅其志。至如顏回者固當視為例外。故即以孔孟之「誨人不倦」，遽足化人，而以不得專國柄，無力作可收實效之經濟改革之故，亦不能使當時社會進於「和無寡，安無傾」之域。是何天下君

子之少，而固窮之難也！此荀子之所以繼孟子之後而倡言「人之性惡」也歟！

（註一）孔子所謂執鞭之士，其地位與現代之「司機」相當；可見當時司機一流卑賤之機會尙少；否則孔子於委吏（會計），乘田（畜牧）之外，又多一職業矣！

（註二）顏回不幸短命而死，恐是簞食瓢飲，營養絕於不足所致。孔子又以顏回與端木賜（子貢）對稱，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準此以談，子貢不特智力不如顏回（子貢自云「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修養亦不及顏回也。然子貢不爲執鞭之士而能致巨富，自當人識之，恐不免有其智力高於顏淵之處。

（註三）此後因仲由終身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之句；孔子方云「是道也何足以臧」？以勉其精進。又孔子衣弊縕；仲由所與並立而不恥者，必爲孔子以外之人。否則弟子衣服不如其師之「儒雅」，不恥固非難也。仲由正因其貴，故孔子命其言志之時，有「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之語；此與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之意相同。貴士喜作豪語，自古已然。

（註四）孔子對於衛國人民，有「既庶矣，……富之」一語，然終不如孟子對梁惠王，齊宣王之言爲詳盡深切。

五月星座神話

陳遵嬀

五月下午八時中天之星座，有神話傳說者，爲大熊，巨爵，烏鴉，后髮等四座。

一　大熊座(Ursa Major)

大神薛烏斯與森之女精卡利斯托相愛，生阿爾卡斯。大神之妻，女神赫拉，嫉妬心深，大爲憤怒，宣稱「爾妖豔女精，果奪吾夫之心耶？其速告我！」當卡利斯托跪地叩頭伸腕求憫於女神之際，其腕業已生毛，且生尖鈎之爪；大神所愛吻之唇，變爲可醜之上下二顎；人類求乞之哀聲，亦變爲獸類之可怖咆哮。美麗女精遂變爲笨憎之熊，受獵犬之威脅，爲他熊所恐懼，逃避於阿卡得亞之野。

母子之情，終難斷絕，卡利斯托雖變爲熊，仍念其子不已。逮阿爾卡斯長成，喜狩獵，某日出獵，見一大熊，不知爲母，正張矢於弓待發之際，大神薛烏斯自天空睹之，不忍阿爾卡斯犯殺親大罪，立將母子攜往天上，變爲大小二熊。今北天大熊座爲卡利斯托之變形，小熊座爲阿爾卡斯之化身。

舊怨未消之女神赫拉知之，更爲憤怒，雖使母子仍同居一處，但精海之支配者泰台斯與俄克阿諾斯之助，使此大熊與小熊永久環繞於北極周圍，不若其他星辰之有沉沒休息之機會。此誠一可哀之神話。

一說卡利斯托乃太陰女神阿提密斯之侍女，因非處女，遂觸女神之怒。

現今此大熊座之一部分，於初冬之頃，沉於地平，但古代希臘，果如神話所說，決不沉沒者。詩人何美羅斯曾作「阿爾克托斯，避大海波浪而不沉沒之星。」之歌，所謂阿爾克托斯者，即大熊之稱。密雷托斯哲學家塞利斯授北極星以前，希臘人以大熊座爲航海之標的。英雄俄丟蘇斯亦曾觀此星座而航行於大洋之中。

我國所謂北斗七星，即此大熊座之中樞，居大熊之腹與尾。此七星有認爲馬車者，即四星所在爲車身，三星爲曳車之三馬。距今四千年前，巴比倫亦視此爲車。希臘稱爲戰車，羅馬稱爲七匹犂牛。我國曾謂「北斗者帝車也」。

我國所稱北斗（七星），內階（六星），少輔，三師（三星），文昌（六星），上台（二星），太尊，天理（四星），太陽守，輔，

中台（二星），天牢（六星），下台（二星），常陳（第七星）等，皆屬此座。

二　巨爵座(Crater)

時無古今，地無東西，咸稱此座為杯。杯之主人，希臘神話曾擬有種種人物；最初認為阿波羅神所有。一說為酒神得棲細索斯之杯，當彼受伊卡利奧斯王厚遇於雅典時，援以釀造美酒之法，而贈此杯。王以此酒獻宴農民，誤取毒藥而殺之。大力士赫叩利斯，參加脫羅央戰爭之希臘勇士阿基利，與迦太基女王得伊多等，亦可視為此杯之主人。又以魔術助阿哥船遠征隊隊長耶遜之科爾奇斯王女美得阿，以飛蛇所曳之二輪車，馳騁於天空之遠國，歷九日九夜，始得魔藥之汁，曾裝於此杯之中。中世之基督教徒，以此為約瑟之杯，有時視為諾亞之杯。波斯人自希臘傳入之天文學，認其為土製之酒壺。埃及謂為尼羅河漲水之際，此座上升。

我國譯為酒瓶，又作巨爵；此巨爵乃祭孔子所用之銅器。翼宿大部分，位此星座。

三　烏鴉座(Corvus)

太陽神阿波羅乃薛烏斯與利托所生之子，司音樂，詩歌，醫術之神，飼一神聖之烏鴉。阿波羅遍游諸國之時，與帖撒利王女科羅尼斯結婚，留居數年，生子阿斯克拉皮俄斯，極為怜悧可愛。某日阿波羅返巴那薩斯之神山，告其妻曰：「余雖居山中，每晨由此烏鴉報告爾及吾兒之狀況，使余仍可安心焉。」此烏鴉之翼，呈銀色之輝明，極其聰敏，能操人語，但甚饒舌與說謊，時傷主人之感情。

某晨烏鴉向巴那薩斯山飛翔之際，途貪道草，抵山之時，先不言語，旋稱科羅尼斯已不愛神，別有他戀。阿波羅為其謊言所惑，立即回返帖撒利。將抵家門，見有白衣人影，出沒於附近橄欖樹之間，認為科羅尼斯所隱匿之男子，張矢射殺之。遠行近觀之，乃其可愛之妻，因遠見夫君返家，特親自出迎者。阿波羅睹此貞節之妻，放聲痛哭，且悲且憤，罰此烏鴉永不知人語，僅作「啊，啊啊啊」之啼聲，且使其銀翼變為醜黑之色。

又一神話，謂阿波命烏鴉持巨爵座之杯，前往取水，途見無花果之樹，坐待其熟，以致誤事，遂謊稱水蛇不許其汲水，以致遲歸。

二十八宿最後之軫宿，在此星座。

四　后髮座(Coma Berenices).

柏累奈西乃紀元前三世紀埃及王攸埃爾該提斯之后，具有琥珀色之美髮，名聞國外。某時，埃及與亞述交戰，王親自遠征。柏累奈西愛夫情深，祈誓於美之女神阿夫羅得泰曰：「望授吾夫以勝利，若然，願獻吾髮。」未幾，果如柏累奈西所願，傳到埃及軍之捷報，后果割其美髮，獻諸阿夫羅得泰神前。

奏凱旋之王，受此斷髮之妻所迎接，大為失望與驚異，逮聞其故，始感其誠，深為喜慰。翌晨，柏累奈西之美髮，忽然消失於神前，國人大為驚駭。王詢天文博士科農之意見，答曰：「大神辭烏斯愛后髮之美，使其永飾於星空。」遂指天上新現之星群，王與后聞之，皆大歡喜。其後稱星空之此部分曰「柏累奈西之髮」。今那不勒斯之國立美術館，尚有柏累奈西之美麗青銅胸像。

新型炸藥發明的可能性

曾昭掄

大戰在繼續着，戰爭猛烈的程度，有日益加增的趨勢。有些國家，始終在誇耀着，還有祕密武器，未曾拿出使用。這種情形，配合着報紙上有時披露的驚人消息，使人們惶惑了。在這次大戰結束以前，是不是會有效力驚人的武器出現呢？一般未加研究的人，大都不免要說，那是很可能的。專家的意見，卻以為這事不怎麼容易。近年來科學與技術，如此高度發達，一切可在戰場上發揮效力的工具，差不多早已都運用了。許多武器，在設計與製造上，雖是在不斷進步，而且往往進步得很快。比方說，今年造出的飛機，在式樣與性能上，比去年出品就要好得多。要是拿牠與十年前的產品相比，那真可說是有天淵之別。不過飛機究竟還是飛機；不管改良怎樣大，終久不是一種完全新穎的發明。上次世界大戰中，飛機，坦克，潛艇，毒氣等的引用，確是貨真價實的新武器。此番大戰期間，像那一類發明的機會，似乎不多。雖然如此，我們不能說，可能性是完全沒有。如果要研究這種可能性的話，不妨從機械與化學兩方面的觀點去看。在這裏所要提到的，限於化學方面的一部份。

化學對於武器一種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炸藥的發明與運用。人類使用炸藥，迄今約有七百餘年的歷史。就中最初六百年，所用全是一種炸藥，就是所謂「黑色火藥」。其他一切炸藥的使用，都是最近百年內外的事（參考二）。黑色火藥，乃是一種無機混和物；其中所含三種組份（鉀硝，木炭，與硫磺），單獨均不能（至少不容易）爆炸；惟有在適當比例混和之下，方能發生爆炸現象。十九世紀初年以來發明與引用的炸藥，卻與此完全不同。牠們大都是單獨能夠爆炸的化合物，或者至少裏面含有此類化合物的組份。從化學結構上說，絕大多數是含有硝基的化合物。這些物質，比起黑色火藥來，爆炸力大得多，因此得有高炸藥之稱，以與黑色火藥之稱為低炸藥相別。半世紀來，化學家在硝基化合物，硝酸酯，與其他氮化合物中兜圈子，設法尋求爆炸力更大而安全性亦佳的高炸藥，結果成就頗屬有限。幾十年來，我們始終沒有找到比 T. N. T. 或苦味酸這兩種標準高炸藥力量大得多的東西。當然比牠們好過百分之一二十的爆炸力的物質，曾有若干發現。可是因為別方面的條件不太適宜（主要地因為製造成本嫌高），這些較新式的炸藥，並沒有能怎樣大規模替代 T. N. T.。至於力量大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物品，則迄今始終未曾發現；而且將來發現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如果我們的研究，不脫離上述範圍。假如想要找那類東西以外，我們必需在含有硝基的物質以外，設法尋求。

去年德蘇大戰正酣的時候，德國在南路發動夏季攻勢，儘量使用其所有一切新發明。當時報紙上載過，德國曾經使用一種炸彈或砲彈，裏面裝的大約是壓縮空氣。爆發以後，令若干蘇聯兵士，絲毫不露傷痕，猝然死去。這種消息，一時認為頗是驚人，後來卻又不聽見說了。從科學眼光說，這種記載，大致殊欠正確。壓縮空氣膨脹後產生的物理變化，其所發出的能量，遠不及由炸藥爆炸（一種化學變化）所得出的數量。科學與技術高度發展的德國，對於此點，當然認識很清楚，決不致犯這種幼稚的錯誤。此類炸彈，即令偶爾用過，亦不過示奇取巧，以收心理上的功效，在軍事科學上不能認為何等了不起的發明。

一類較有希望的新炸藥，乃是有機液體與液體氧氣的混和物。原來現行炸藥的特點，在於爆炸時能量發出甚快；每克發出的能量，卻

並不見大。在下列表中，上半示出幾種重要炸藥的爆炸熱量(heat of explosion)，下半所示為幾種普通燃料的燃燒熱量(heat of combustion)

炸藥	爆炸熱量（每克發出卡數）	燃料	燃料熱量（每克發出卡數）
硝化甘油	一、四七八	汽油	一一、〇〇〇
硝化棉	一、一〇〇	柴油	一〇、〇〇〇
T. N. T.	九二四	苯	九、五〇〇
雷汞	六八五	煤	五、〇〇〇至八、〇〇〇

由表可見炸藥的爆炸熱量，比一般燃料的燃燒熱量要小得多。當然炸藥爆炸，不假外助，即能單獨進行；燃料燃燒，尚需氧氣。然而即將所需氧氣算入，燃料燃燒所發出的能量，仍然要比炸藥大得不少。問題祗在使燃燒非常迅速，成為一種爆炸；同時在別方面，適合軍事條件。關於第一點，現在用不着愁。液體氧氣炸藥在開礦上的使用，最近二三十年來，已經達到很大的成功。第二方面的問題，不怎樣簡單，對此一時仍然沒有多少把握。然而運用汽油液氧混和物的火箭與火箭炸彈，試驗結果，業已得有相當成效（參考二）。這次大戰當中，雖來不及使用；將來運用此類炸藥的武器，卻很有發展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一)曾昭掄：「炸藥工業發展的過程」，軍政部兵工署第五十三工廠月刊第四期，三至五面（一九四三）。

(二)「火箭炸彈」，世說第十五期，四至五面（一九四二）。

安南國王陳日煚考

黎正甫

陳日煚為安南國承繼李朝與開建陳朝之王，宋史及元史載其事均甚簡略；越史所載則多自相衝突之處，而宋人筆記有謂陳日煚為福建人者，然則其為安南王與鄭昭為暹羅王可以先後媲美，此亦為國史上所值得注意之事歟？爰考之於後：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傳云：安南國王「昊旵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其壻陳日煚所有。李氏有國，自公蘊至昊旵凡八傳，二百餘年而國亡。」

元史卷二〇九安南傳云：「宋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其子璉亦為王，傳三世為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主。李氏傳八世，至昊旵，陳日煚為昊旵壻，遂有其國。」

宋元二史皆謂陳日煚之得國，是因其為昊旵之壻，而宋史且謂昊旵已卒無子，與越史所載不異。越史略卷三云：「乙酉，建嘉十五年（一二二五）六月，王（昊旵）遜位於第二昭公主，諡（號）昭王，尊王為太上王，改元天彰有道。己卯，直國入於龍墀。冬十二月上王以女王而幼，召馮佐周謀曰：朕以不德，獲戾於天，絕無嗣，傳位於女；以一陰而御羣陽，衆所不輿，必致悔亡，以吾觀之，莫若遠法唐堯，近體仁祖，擇其賢者而授之。今所見太尉仲子某，年雖幼沖，相貌非常，必能濟世安民，欲以為子，而主神器，乃以昭聖配之，爾等為朕言於太尉。……冬十二月命內侍判首馮佐周，內行遣左司郎中陳智宏，將內外文武臣僚，具龍舟，備法駕，出星罡府，迎我太祖。以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受禪，即位於天安殿，尊順貞王后為太后，降昭王為昭聖王后，改元建中。太上王與其母譚太后出居扶列寺，號惠光

禪師，以建中二年八月丙戌薨於普教寺，廟號惠宗，在位十五年有奇。」據此可知昊旵於禪位後之次年方卒，先傳位於其女，因女幼乃詔陳日煚爲嗣。陳日煚爲太尉之仲子，年尚幼冲。大越史記全書卷七亦謂：惠宗（昊旵）禪位於女佛金（號昭聖），時年七歲，納其臣陳守度之姪煚爲婿，時年八歲也。次年煚承帝位。是又確言陳日煚受禪時爲一九歲之兒童，然歟否歟？若翻閱越史略前面所述，立可發見其衝突之點。

按超史略所稱太祖卽指陳日煚，亦卽當時之太尉。「建嘉十三年（一二二三）……十二月己卯輔國太尉陳嗣慶卒於扶列第，王與太后臨其喪，哭之甚哀，諡建國王。……建嘉十四年（一二二四）春正月丁未葬建國王於美祿。是春以太祖爲輔國太尉，馮佐周爲內侍判首。」（惠宗紀）是陳日煚於受禪前一年已官至太尉，並非太尉之仲子，其年齡亦非幼冲。蓋太祖之稱早已見於建嘉元年（一二一一）「阮嗣遜以蘇忠嗣之死，往說我太祖，請進兵，安輯快諸邑。」昊旵於庚午年（一二一〇）十月卽位，次年（辛未）改元建嘉元年，至建嘉十五年（一二二五）六月禪位於其女，十二月復遜位於陳日煚，（越史略稱太祖而不名）。陳日煚於建嘉元年卽能統率軍隊，其年齡當已不小，至十五年後受禪，則其年齡至少在三十以上，可證前所引謂陳日煚年尚幼冲及九歲受禪之說與事實不符矣。

又元史卷二〇九安南傳云：「憲宗八年（一二五八）二月陳日煚傳國於長子光昺，光昺遣婿與其國人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倘如大越史記全書所云陳日煚受禪時年九歲，至憲宗八年禪位止，在位三十三年，此時應爲四十二歲，則其長子光昺最多不過二十餘歲。但據元史光昺此時已有婿，而其婿又能奉使至元廷，則年齡亦當不小，由此觀之，光昺卽位之年齡斷不止二十餘歲，則此時陳日煚亦決不止四十二歲，可證陳日煚受李朝禪時，亦決非九歲之冲齡幼童也。且越史略卷三建嘉六年（一二一六）云：「冬十二月進我太祖爵列侯……太祖長子柳爲關內侯。」是陳日煚於受禪前九年已有長子名柳矣，何得謂其爲幼冲？然則越史略所載何其前後矛盾一至於此耶？

余疑李朝之亡與陳日煚之受禪，其中必有爲史家所不能直書之事。越史略作者雖未著名，然其稱陳日煚爲太祖，稱李朝末帝爲今上，可以作者爲陳朝末年之人，其對於陳朝太祖用如何手段取得帝位，固不敢直書，而有所忌諱也。至於昭聖遜位時年七歲當可相信，因其父王昊旵於次年卒，享年僅三十三也。越史略卷三亦曾言：建嘉九年（一二一九）冬十二月阮嫩已死，「庚午，嫩將費探送太后及王子公主等於太母（陳嗣慶），以降。」是又可證昊旵並非無嗣也。又建嘉十五年「王遜位於第二昭聖公主。」，昭聖排行第二，則居長者殆卽爲王子某矣。昊旵何以不傳位於子而傳女？其中當有政治原因在，此時王子若非已病故，則[illegible]人所謀害矣。

陳日煚受禪，當時人已有目之爲篡逆者，故其左輔阮正吏諫曰：「阮氏之有國也（越史略將李氏盡改爲阮氏），賢君六七作，其餘德遺澤入人也深，一旦遽以異姓爲嗣，意其試之，以觀我何如耳。苟因而受之，天下必謂太尉實有篡逆之志。」太尉本秦官，掌武事，其尊與丞相等，漢武帝時更名大司馬，光武中興，復名太尉，直至宋代猶因之，位居三公之首。安南自獨立爲國後，其官制多倣自中國。時陳日煚已爲太尉，早存司馬昭之心，恐國人不附，故以入贅昊旵爲辭。但昭聖公主年方七歲，而陳日煚早已娶妻生子，年事已長，本不相配，而強行之。後世修史者以爲昭聖時年七歲，陳日煚已爲其夫，年齡必相當，故有八歲之說。越史略作者雖明知其事，而飾言之，謂其年幼冲，爲太尉仲子，遂致書中所記前後矛盾耳。

陳日煚於建嘉六年已有子封侯，然則其初婚之妻爲誰？此亦可由越史略書中考出，按其原配卽陳嗣慶之長女，亦爲入贅性質。越史雖未明言，但由陳日煚與陳嗣慶二人間之親密關係可以推知。越史略稱陳嗣慶爲元祖，稱陳日煚爲太祖，並未言太祖爲陳嗣慶之子，而其親屬關係一若父子，是必爲贅婿無疑矣。

己巳治平龍應五年（一二〇九）七月，范秉彝范猷二氏相攻，「王寅我元祖大師舟師詣京師，逆王子昺并母元妃譚氏，及同母妹二人歸於海邑段氏家，遂於其家奉王子忱即位，時昺家臣劉紹，就元祖及遙滌人范愚言曰：沈雖長子，庶也；昺雖少，嫡也。唯二公圖之。元祖遂與愚逆昺歸茫仁即位，徽稱勝王，降忱為王。頃之，昺復歸於海邑，寓劉家村館，以我元祖仲女為元妃，以譚以蒙為太尉，阮正東為參知政事，元祖為明字，愚為上品奉御，蘇忠嗣為殿前指揮使。」（越史略卷三高宗紀）

第二年冬十月龍幹（高宗）死，昊昺正式稱帝。「已酉，順流（地名）明字（官名）陳嗣慶帥舟師次細步江，請其舅蘇忠嗣同赴高宗之喪，忠嗣亦相疑貳，嗣慶乃回軍。是月王使迎陳仲女，嗣慶不應。」（惠宗紀）

觀高宗紀所言「以我元祖仲女為元妃」，「元祖為明字」，惠宗紀言「明字陳嗣慶」，「王使迎陳仲女，嗣慶不應，」可證越史略所稱元祖即指陳嗣慶。昊昺以陳嗣慶第二女為妃，嗣慶原不答應，蓋彼本有陰謀，故舉兵赴高祖之喪，後因其舅父蘇忠嗣疑貳不贊成，始回軍。迨昊昺之帝位已定，於建嘉元年（一二一一）正月王復使迎陳氏仲女，嗣慶仍不答應。至癸酉日復迎陳女，嗣慶始「使內殿直馮佐周與其裨將稱歸阮硬送仲女於京師」。庚寅遂立陳氏仲女為元妃。陳嗣慶之次女既為王妃，故陳日煚之妻當為陳氏之長女。

是年三月以蘇忠嗣為太尉，蓋與陳嗣慶大有關係。前任太尉譚以蒙為昊昺之母舅，今已立陳嗣慶女為王后，則當任用陳家人握大權，蘇忠嗣為嗣慶之舅父，即為王后之舅祖，遂代譚以蒙為太尉。同年六月忠嗣被殺，其壻「阮麻還以忠嗣之死，往說我太祖，請進兵安輯快諒邑。麻還與其妻蘇氏登舟，欲如順流，道遇忠嗣將阮貞，為所殺，遂虜蘇氏以歸。蘇氏使人訴於太祖，太祖怒貞非義，遂謀圖貞。嗣慶葬忠嗣於稽鄉。太祖次海邑，使召貞，貞不至，乃使蘇氏誘以殺之。」（惠宗紀）太祖即指陳日煚，前已說明，此其事跡首見載於越史略者，細讀之，可知陳日煚當時在陳嗣慶部下甚見寵任。蘇氏於陳嗣慶為表妹，阮麻還以蘇忠嗣之死，往告陳日煚，蘇氏有難，亦往訴陳日煚，可見陳日煚能代陳嗣慶主持一切事，若非有親密關係，必不至是。

建嘉四年（一二一四）「夏四月甘蔗將軍潘具反，嗣慶囚之於美祿，甘蔗將軍杜備反，嗣慶使潘隣擊之，為其所敗，復使賴靈往擊之，又敗。太祖以二軍之敗，乃自將擊之，不克而退。」（惠宗紀）二軍皆由陳嗣慶所遣，今云「太祖自將擊之」，其語氣彷彿說嗣慶即太祖，然太祖乃指陳日煚，而其號令嗣慶之軍隊，一如自己之軍隊，足證陳日煚與陳嗣慶為一家人，其關係既非父子，則必為贅婿可知矣。

建嘉六年（一二一六）「冬十二月進我太祖爵列侯，馮佐周賴靈並關內侯，以嗣慶為太尉，贊拜不名，無大逆禮，賜坐局天安殿。」此時陳嗣慶以王之岳丈而為太尉，總攬政權，其子海封為王，陳日煚及其子柳皆封侯爵，故陳日煚非嗣慶之子，乃其婿。日煚之妻當為陳氏之長女，嗣慶長子海在排行上當較二女為小，因其至建嘉十二年（一二二二）始結婚，其年「孟冬王與太后御天安殿，觀太尉子顯道王海昏禮。」故知陳嗣慶至少有二女一男，長女贅日煚，次女為昊昺妃，子海為顯道王，此子尚未生時，嗣慶恐無後，乃贅日煚為婿。

據越史略所載，陳嗣慶已有篡逆之跡。建嘉二年昊昺以嗣慶權勢盛，即欲遜位，「嗣慶及羣臣皆叩頭流涕，乃止。」建嘉三年「尹信謝言，嗣慶有篡逆之心，王與太后猜忌之，」命諸軍攻嗣慶。四年嗣慶攻京師，迎英宗（天祚）子惠父王而立之，焚掠京城及宮室。五年五月昊昺復欲遜位而未果，六年五月甲辰「與夫人陳氏夜如順流，歸嗣慶。」換言之，即昊昺向嗣慶投降，雖結果受歡迎，未被廢立，然自此以後，實權操於陳氏，昊昺已無異成為陳氏之傀儡矣。至建嘉十三年（一二二三）十二月太尉陳嗣慶卒，十四年（一二二四）正月，

以陳日煚爲韓國太尉，遂以承嗣爲名，受昊旵次女之禪，爲安南國王，陳朝之太祖。時昊旵年僅三十二歲，正在壯年時期，尚有生育之希望，何至遽云無嗣而禪位乎？且陳日煚之年齡，並不比昊旵小，至少二人之年歲當相若，此可依越史所載其事跡而推測得之，可證昊旵之禪位乃被逼而出此，非自願也。

陳日煚原爲陳嗣慶之贅婿，至是納昭聖爲后，又稱爲昊旵之婿，宋史及元史即根據後者而錄載之。陳日煚旣非陳嗣慶之子，而爲其贅婿，則陳日煚之先本非姓陳，亦可推測而知也。案南宋末周密所撰「齊東野語」書中，載有一段關於陳日煚之事，可以補充此說，亦可以證實此說，特錄出如下：

安南國王陳日煚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鵾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遊，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而無聊，授受生徒自給。永守林岊亦同里，頗里人。居無何，有邕州永年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illegible]皆出爲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illegible]，因請以歸，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婿。其王無子，[illegible]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illegible]，訪其家，家以爲事不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illegible]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見卷十九）

據此陳日煚固非八歲之幼童，亦非太尉之仲子，與余在前面所考得者相合，謂日煚爲國相之婿，國相爲王之婿，與余所述大同小異，蓋陳嗣慶官至太尉，即國相。日煚爲其婿，此皆相合也。惟嗣慶爲王之岳丈，非王之婿，明載於越史，是則齊東野語所錄或爲傳聞之訛矣。陳日煚旣因贅婿而改姓名，則其爲閩人謝升卿之說，當亦可信。至於「國王無子」，顯係當時陳氏受禪後一種有作用之宣傳也。

齊東野語所記多爲南宋舊事，陳日煚爲安南國王，當宋理宗寶慶元年之時，以宋人記宋代事，當有事實之根據。又李朝太祖李公蘊亦爲福建人，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有云：「黎威死，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爲主。」案沈括爲北宋時人，學問博洽，熟悉掌故，湯修年跋其書，稱括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志之比，則沈括所記李公蘊之事，亦必有所根據。故安南國王李朝八代及陳朝十代皆爲中國人，宋代對於安南之獨立，取懷柔政策，但欲其臣服，不欲以武力相加者，殆亦因此歟。

陳日煚對宋朝甚恭順，受册封，故理宗淳祐二年（一二四二）「詔安南國王陳日煚元賜効忠順化保節功臣增守義二字」。（宋史卷四四八交趾傳又見理宗本紀）及元軍入安南，陳日煚父子抗元不屈，常與南宋互通聲氣，可見其有民族觀念。大越史記全書載：宋末有趙忠者歸越，爲越[illegible]族之家將，元至元二十二年，蒙古兵侵入安南時，趙加入安南軍，衣宋衣，執矢以戰，大敗元軍。又元史卷一六七張廷珍傳有云：「（安南國）王猶與宋爲脣齒，妄自尊大。」倘陳氏非中國人，則其事宋與事元無異，何至於與弱宋聯合，以抗蒙古之強哉！是亦足證「齊東野語」所言陳日煚爲閩人之非虛也。

縉雲游草

朱偰

一

蜀中名山，首推峨眉青城，是固馳名宇內，盡人而皆知者也。然蜀道崎嶇，千山萬水，奧區勝境，所在多有。太白詩「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概乎其言之矣。余入蜀六年，發願遍覽巴蜀名山，若三峽之巫山，南川之金佛山，北碚之縉雲山，峨邊之瓦屋山，灌縣之玉壘山，皆杖策所及；至若峨眉青城，則有二至者焉，有三至者焉。每一憶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煙容雲態，歷歷在目。然經時既久，印象漸形幻滅，平居多暇，因就當日遊草，略加潤飾，以公諸同好，此本篇之所以作也。

縉雲山在巴縣西北一百三十里，爲巴渝名勝之一。考方志記載，舊志較新志爲略，清嘉慶巴縣志云：

山接璧山縣界，高數萬仞，碧水合流，蒼松鬱翠，上有朝日，香爐，玉尖，寶塔，獅子，掇嘯，聚雲，石照，蓮花九峯。

新志則云：

白雲山又北迤爲縉雲山。蜀名勝記云：圖經：「縉雲山在縣西北百三十里，其山高聳多林木，下有溫泉，東西分流。相傳黃帝於此合鍊。」陶宏景木仙賦云：「增城瑤館，縉雲瓊闕，黃帝所以觴百神也。」方輿勝覽則謂之巴山矣。……山有九峯，寶塔峯最著，亦阿育王塔八萬四千之一也。迦葉尊者於九峯頂上示一十三足，又倣裴裴印文於獅子峯。按九峯者，朝日，香爐，玉尖，寶塔，獅子，掇嘯，聚雲，石照，蓮花也。而尤以獅子，香爐二峯爲最秀。

從北碚登縉雲山，凡有二道：一從北碚直上巉巖，宿縉雲寺，再游香爐等峯；一從溫泉越大斬龍崖，繞出山前，亦奔縉雲寺。二十七年二月，余在溫泉，遂有縉雲之游。十五日清曉，發自「激帆樓」，既登高原，林[illegible]，遙望九峯岌嶪，作龍飛鳳舞之姿，即縉雲山矣。按「縉嶺雲霞」，爲巴渝十二景之一，蓋山多松檜，朝霞映之，呈五色雲氣，[illegible]縉雲。前行可十里許，越大斬龍崖，巉巖鐵裂，對出似門，北望平原浩蕩，雲山隱現，爲璧山縣界；山口北風頗勁，吹人欲墜。太白詩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illegible]頗有獨立蒼茫之感。

過大斬龍崖，繞出山前，有牌坊高聳，大書「縉雲山」，爲此山入口。折而[illegible]上，行松林中，俯瞰原隰，水田縱橫，蓋即北碚平原矣。山多松柏，復饒楠木，以故蒼翠鬱葱，不同他山。縉雲寺深藏谷中，楠木參天，嘉卉匝地。巴縣新志云：

縉雲寺，劉宋[illegible]前廢帝景平年建，唐宣宗大中元年，賜額相思寺，以巖名也。

又蜀中名勝記云：

咸通錄：縉雲寺，即古相思寺也。以此山有相思巖，生相思竹，形如桃釵。又有相思鳥，羽毛綺麗，巢竹樹間，食宿飛鳴，雌雄相應，籠其一則其一隨之。

相思寺名色極佳，故後人題咏頗多。考諸「縉雲傳勝錄」，此山在唐宋時已著盛名，至明始改建縉雲寺。今爲漢藏教理院，有生徒百人，清淨莊嚴，遠絕塵俗。中爲大雄寶殿，右爲教室，左爲客堂。繞出寺後，爲圖書室，楠木蘢葱，一院陰涼。寺左爲「雙柏精舍」，所謂尊[illegible]班在焉。異日中國有事於西藏，非造就專門人才不可，則此院

之建，亦殊有其意義矣。

在縉雲寺品茗小坐，即登獅子峯，峯迥出九峯之上，石磴盤雲，登之頗仿。時值冬杪，彤雲四佈，落木寒山，滿目淒涼。既上最高峯，有碉堡聳峙，危臨其上，曰高踞門。下瞰縉雲寺，如觀諸掌。左右羣峯拱衛，形勢壯麗，而玉尖一峯，縹緲雲端，九峯岌嶪，競高爭秀。惟雲霧四合，不克遠眺，僅嘉陵江曲折宛轉，流於蒼茫間而已。山高風寒，不可久留，乃逕還下山，歸北溫泉。

二

北溫泉在重慶西北一百二十里，臨嘉陵江，其地重山環抱，深束江流，故有小三峽之稱。按清嘉慶巴縣志，尚不著北溫泉其名，僅有溫湯峽溫泉一則，其辭云：

泉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接合川界，由江岸攀石磴曲上至溫泉寺，石壁萬仞，古松虬蟠，鑿根泉瀉，分竇而出，瀧瀧然與松濤響應。水清澈無點塵，無礦氣。昔人迎流砌池，方廣四丈許，上翼以亭，殿谷可潛。郡守陳邦器題碑：「頓洗客塵」。歷代使節經臨，多憩沐題詠，碑碣林立。泉流繞方丈至大雄殿前，匯為大池，沸水中綠藻差參，赤魚游泳。復轉迴廊，至山門外，懸巖作瀑布，鳴玉飛雪，穿雲而下，殆為各溫泉之冠云。

按縣志所載，雖因建築公園，梵宇改觀，然泉流不息，雲影自在，山光水色，固未嘗異於今日也。余於二十七年春夏，數度來游，自重慶溯嘉陵江而上，穿小三峽，直抵溫泉。舟既傍岸，拾級而上，石磴縈迴，曲屈山光雲影間。折而左，為「竹林深處」，茅屋數椽，掩映幽篁叢中，下臨江水，遙對峽口，夏日消暑，最為勝地。再上地勢略平，夾道梅花，數以千計，花枝弄影，暗香浮動。在紅梅叢中，遙見嘉陵江水，作深碧色，風帆隱隱，遙度天際，紅碧相映，景色宜人。再上為溫泉寺，寺肇建於唐，名曰崇勝禪院，後世因之，代有增修。寺卻負懸崖，前臨深壑，飛簷複宇，氣象崇閎。寺門大書「第一山」，折而右，為第一進殿，中供關帝。出殿拾級而上，為第二進殿，中供四大天王並彌勒立像，前額「靈峯花雨」，後匾「海天慈照」。由殿前遙望，煙嵐對起，江[illegible]似帶，前殿崇脊飛簷，玲瓏剔透，古木杈枒，掩映其間，風光[illegible]佳。再上為戲魚池，赤鱗上下，游泳碧藻間，水蓬蓬然猶有蒸氣，即溫泉之餘流也。拾級而上，為大雄寶殿，上額「了外恩波」，下額「不二法門」，中供如來，法相莊嚴。後匾「青蓮妙相」。殿後為廣庭，徘倚百丈懸崖，拾級而上，為觀音閣，上額「普照大千」，中額「圓通正覺」，後額「海天佛國」，供白衣大士立像，於莊嚴之中，寄寥廓之思。左為花好樓，圖書館在焉。寺居溫泉公園正中，數帆樓，農莊，琴樓，習室，列拱左右，錯落有致。而以磬室後掛懸瀑，前臨清江，乳花洞窈窕深邃，繞其右側，最得幽窅之勝。散步其間，鳥語泉聲，悅耳清心，每令人流連忘返。

由寺左緣山道而上，虬松夾道，修竹成林，[illegible]濤雲泉，泠泠相應。山徑縈迴，三折始達其巔。上飛來閣，高出[illegible]。登臨而望，適對嘉陵江去路，峽勢縈汪，江流宛轉，而溫泉寺[illegible]景物，盡在望中。放翁詩云：「放盡樽前千里目，洗空衣上十年塵」，如為此閣寫真。流連久之，暝色漸合，乃下山歸去。

晚沐於溫泉，泉溫度不及南泉，而無礦氣，清淨過之。夜宿數帆樓，一枕松風，清寒達旦，泉流泠泠，時縈夢寐。同游者有金陵女子，遭亂流離，隻身寄居於此。烽火連年，家書隔絕，余在北溫泉竹枝詞多首，以寫其傷離哀時之思，錄之以爲殿焉：

縉雲山色鬱蒼蒼　古寺鐘聲傍夕陽　底事莫愁堂上女　長居幽谷伴空王

長夜淒清帷有淚　空山寥落只餘雲　梵宮夢醒知何處　[illegible]斷香消寂不聞

沉沉幽夜雨瀟瀟　耿耿殘燈魂黯銷　忽憶黃山秋後草　[illegible]憐人度可憐宵

曉來步雨過前橋　萬紫千紅香暗飄　滿目蒼涼家國恨　艱難又度百花朝

樂府新聲爾未忘　西來形勢轉倉皇　春光如許離憂滿　旅雁何時更著行

蜀國春深紅暗銷　百花零落水飄飄　江南生小無愁女　自入溫塘淚不消

嘉陵江上夕陽斜　天半浮雲著晚霞　極目鄉關何處是　迢迢萬里隴三巴

溫塘峽裏起樓臺　點點風帆天外來　過盡千帆皆不是　巴山桃李爲誰開

嘉陵灘急水嗚咽　雨驟風狂駕雲邊　遙指深山幽絕處　三三燈火是溫泉

鐙昏被冷未成眠　風雨深山只自憐　君本無情妾薄命　爲誰幽怨度年年

詩與近代生活

楊振聲

近代生活放逐了我們的詩神。還不如柏拉圖對待詩人那樣的有禮貌，加以桂冠，噴以香漿，甘言巧語而逐之。而只是遭了科學的冷眼，悄然逝去了。

科學趕走了我們月中的嫦娥，銀河對岸的牛郎織女，也趕走了花神林妖，川后海君，雨師風伯，一切我們用幻想組織的美麗的宇宙，用情感賦予的各種神性。總而言之，自科學使宇宙中和（Neutralization of Nature）後，世界已不復爲人神相通的感情所支配（因爲人類造了神，故可以用人的情感駕馭神，也駕馭了世界），而代之者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的冷酷世界。來封付這個世界的，不是頌神的詩歌與溫柔敦厚的詩教，而是同樣冷酷的理智！

跟着宇宙的改觀是社會環境的惡化。科學機械化了宇宙，又機械化了人生。農業時代的田園生活，是閒適恬淡的詩境；手工業時代的婦女相聚夜績，古人且以爲是產生詩歌的來源。而近世生活的中心，城市代替了鄉村，工廠剝奪了手藝。昔日竊林間的一抹翳煙或晚水上的迷離夕霧，今日變爲林立的煙囪中冒出來毒人的煤氣了；昔日的月夜擣衣或燈下機杼唧唧，帶着一點愁思的綴音，今日卻是機械的軋啞震耳了；昔日駝馬的鐸鈴，於今是汽車的喇叭；昔日的晨鐘暮鼓，於今是工廠上工放工的汽笛；火車的尖叫，代替了夜半鐘聲；飛機的雷音，壓倒了呢喃的鳥語。加以機械發達後的資本主義，釀成貧富不均，生存競爭的激烈，及生活的煩悶與頹唐。總之，機械的跋扈，壓碎了人生的一切。而支配人生的不是神，是機械，它已篡取神的地位了。諾爾度（Max Nordau）以一個醫生的資格，診斷「時代的病證」，他指出許多的時代病是由於城市的紛擾競爭，神經受刺激過度，以至於疲倦，煩悶而變成歇斯提里亞。我們再看近代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作品，特別像左拉（Zola）跟在自然科學後面描寫出來的近代生活，再也找不到絲毫詩神的蹤跡了。

神經過敏的詩人看不慣這些工廠醜陋的建築，受不了到處機械化了的環境的壓迫，吃不消一般近代生活的醜惡與刺激，他們或者逃入象牙之塔（如De La Mau），在純然夢幻中「追求那甜蜜的燦爛的樂土」；或者遁入水清草綠的鄉間（如 Blundell），去在那還保存着淳樸風味的舊俗中逃避現實。或者更自然的懷慕古昔（如 Yeats），在舊日的民俗傳奇中與賦有神秘性的山光，雲影，林妖水神的世界裏，

培育一種象徵的美夢似的詩情。

總之，近代生活是自然科學必然的產品，而花間月下隱約藏身的詩神，在強烈的正午陽光下逃遁了。不過，我們不能因此就沒有詩，猶如我們不能因此就沒有情感一樣。今日的問題是：(一)我們不借助於 Anthropomorphism 是不是一樣的可以寫詩？(二)在近代生活中(包括自然與社會的環境)是不是依然能有詩的情感與寫詩的衝動？(三)在近代生活中詩對一般社會是否仍有其昔日光榮的價值？

第一個問題並不難於解答。尤其在中國，不是產生但丁的「神曲」與密爾頓的「天國遺失」那種詩人，須皈依宗教才寫出偉大詩篇的。自國風與古詩，便多是描寫人生本位的男女之情，別離之苦，與死生之感，以至阮籍咏懷，陶潛的田園詩，杜甫的詩史，寫的都是詩人自己的胸襟與時代的傷感。就是謝靈運一派的山水詩，也只是描繪自然，抒寫性情，並不乞靈於任何神秘主義(Myslism)。這裏只舉幾個卓越的詩人，便可以說明中國人文本地的藝術，決不會因為神之退出宇宙便帶走了我們的詩歌。

在第二個問題中，比較難說一點，因為一方面由於自然科學的發達，從詩國中吸引去不少天才的青年；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得承認，襲用舊詞藻重溫舊日詩夢的，亦屬於舊詩之迴光；而不是現代環境所培育的詩園。因為如此，我們在這裏所指的詩的情感與寫詩的衝動只能限於由現代生活環境中放射出來的情感及由現代語言中琢磨出來的語言，並由這些情感與語言織成現代的詩章。

至於寫詩的衝動，自初民時代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以至於近代的「苦悶的象徵」，同是出於「人情之所不能已者」，毫無古今之不同。所不同者，近代的新詩人——讓我們姑且這樣稱呼他們，需要更大與更深的「靈魂的探險」罷了。在無神的荒江星野間，得憑他自己的靈感去探索更新的宇宙，得在官感與物象之外之上，去窺探宇宙美妙的法則，他離開了華麗的舊詩的宮闕去到街頭，工廠，罪惡的宅窟，貧苦的角落，多憂患的人生裏，從醜惡中發現更深一層的美麗，從無詩意的人生中探求幽微的詩意。他如一個慷慨放棄了一份豐美遺產的浪子，獨身離開家園，憑着「一身都是膽」跑到還在幻想中的新詩國裏去探險。我們不能不贊頌他的勇敢與歌詠他的成功，那怕只是些微的成功。

至於第三個問題的答案，必然的隨着第二個問題的成就為轉移。詩人若轉向往昔，或逃遁現實，將依附於過去之光榮，而失其現代的價值。反之，他若能吸取現代科學之果，對於宇宙與人生進入於更深一層之底裏而探索其幽微，由智慧與深情培養出來的詩篇，以此調融及領導現代人的情感生活，新詩對現代人的價值必一如古詩對於古人的價值。

近代的英國詩人及批評家亞諾德(M. Arnold)與現代心理學派批評家李曲斯(I. A. Richards)似都相信在科學發展，人類失去舊日信仰的苦惱中，詩更有其偉大的前途，它將日甚一日的為人類情感所寄託。這是一種危險的預言如一切預言一樣。但在現代生活的日趨艱苦中，現代人因失去舊日的平衡而感覺苦悶，游移與頹唐，其情感之糾紛錯雜而需要宣慰與調理，在歷史上任何時代沒有甚於今日的。新詩能否擔負起這種偉大的責任，其價值將全由此而定。

「天府之國」

姜蘊剛

益州記上說西川：「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一般人因而把四川叫着「天府之國」。

逸史上說四川：「家有鹽銅之利，戶有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尙。」這是可以配稱爲「天府」的。

通鑑上記着司馬錯的話：「蜀者國之實，可以兼濟中國。」秦惠王果因此先得了四川，遂併吞六國而統一了天下，這眞算得是「天府」了。

東華錄記載有淸一代，各省旱災次數，以四川爲最少。比如鄰省的陝西，百年內的荒災，平均就有九次半，而四川還派不到半次。這不是「天府」是甚麼！

以成都而論，全年溫度平均六十二度，雨量爲三十五吋。在抗戰前人口已經稠密，每方哩達一千五百人。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如比利時荷蘭亦還望塵莫及。要不是「天府」，如何辦得到呢？

四川以米、麥、糖、爲三大農產物；絲蔴、錦緞、藥材，均蜚聲世界；而鹽井之富，爲中國第一；其餘各縣各有特產出名，決非任何省分所可比擬；所以必然被稱爲「天府之國」了！

「天府之國」並非自古而然，至遲在秦以前還是一個水旱交相爲害的鹽鹵之地，民生之痛苦，也非今日任何壞的地域所能相比。但至李冰治水以後，四川二十三萬二千公里平原地帶，遂成爲極幽雅美麗的陸海了。

單以灌縣的水利，直接受其灌漑的有十七縣之多，平時所養活的人口在五十萬以上；而今並作了民族復興根據地，成爲全國人口最集中的大後方，其所貢獻於抗戰的，那就不是數目字所能統計的了。

「天府之國」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容，也不是一個誇大的名詞。我們試誦着太白的詩「峨嵋山月半輪秋，舟入平羌江自流。」及放翁的詩：「馬影斜陽經劍閣，櫓聲淸曉下瞿塘。」我們也會沉醉的罷！

今天要是我還在北平講演這個題目，也許有人以爲描寫過度，或許心嚮往之。但今天就在「天府之國」，而且在天府之國的成都講這一段話，我想在座諸位，或許還會以我的描寫尙欠力量。

平心而論，「天府之國」四字，就是一首詩，就是一首詞，何必還要我講呢！

我今天不想再講甚麼建設問題或意義價值等過於嚴重的內容。（講稿已有川康建設與邊區問題及四川的價值等）藉此春風蕩漾的早晨，談點小風趣，說是小風趣，其實也是一種必要知道的風土常識。能因此而引起大家的智識慾與乎對四川作進一步的研究，那就是今天我講話的成功了。

恐怕大家最要知道的是時令中的杜鵑鳥了。「杜鵑枝上月三更」，「望帝春心化杜鵑」。這杜鵑就叫着蜀鳥，詩詞中常常提到的。何以叫着蜀鳥呢？就是古蜀國望帝的故事了。望帝名杜宇，故杜鵑又名杜宇。在郫縣立國，故郫縣又名鵑城。望帝有臣開明，因慕望帝之美后而篡位爲叢帝，望帝被弒而化爲鳥，是爲杜鵑。胡曾有詩詠之云：「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亡。」現在郫縣城外有望叢祠，尙有兩帝的墳墓。

這個當然是神話，但故事很美麗。要有美麗的民族才有美麗的神話，所以希臘神話，並不比希臘哲學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低。哲學重在推理，神話重在想像；推理在於熟思，想像出於天才；像這類的神話，是民族寶貴的遺產，我們是無論如何該記下來的。比莎氏樂府的哈姆雷特還好。

這個神話，還有另外的故事，就是杜鵑又叫着子規，鑑鳥，還有一個名字叫着謝豹。名謝豹的來源甚爲有趣，故事是這樣的：「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客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尙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主別離也。」（見瑯環記）

另外還時令中尙有一種鳥叫着桐花鳳，這是其他地方沒有的，據唐朝鎭蜀的李德裕告訴我們說：「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鳥翁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飲其露，及花落，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至今成都紫桐已不多，但沿街及宅第中還有，桐花鳥也還有的，確是非常美麗。據人告訴我不可捉，一捉即死，還眞

是一個珍貴的小生物！

鳥之外，我要選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兩種花來談了，一是海棠花，一是太平花。

放翁詩：「騎馬碧鷄坊裏過，市人喚作海棠顛。」想見這位做官的晉老頭子，滿頭滿身插着海棠，騎着馬，在碧鷄坊出風頭的樣子！（宋代碧鷄坊在北門，正如今天的春熙路，繁華所在地。）

與其叫成都為芙蓉城，莫如呼之為海棠城的好。海棠花在成都眞是鮮豔繁盛極了。好像許多新粧娘子的嫩面香腮擺在每個院子裏邊，叫你感着喜氣洋洋，一翻新氣象！

你讀讀范致能的海棠詞就很夠味的：「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款門不問誰家竹，祇揀紅粧燒銀燭。碧鷄坊裏花如屋，燕王宮畔花成谷，不須悔唱關山曲，直為海棠也，合來西蜀！」范先生以就為着海棠，也該到四川來，我說把成都叫為海棠城不是有同情者了麼？

還不止此，詠成都海棠的詩詞，多極了，我盼望有人選印專集曰西蜀海棠集。現在再背誦一首王晉卿詞：「錦城春色花無數，排比笙歌留客住，輕寒輕煖夾衣天，乍雨乍晴寒食路，花雖不語鶯能語，莫放韶光容易去，海棠開後月明前，縱有千金無買處。」這不就是這幾天的花會天氣麼？

說太平花，這是皇宮內的名詞，在北平待久的人，都必知道故宮的太平花最為名貴。從前我也趕過熱鬧，但很失望，不也就是四川邊地的野草開花麼？但也好，究竟是故鄉風物，也覺親切。當時我說無人信，後來從清代高士奇的天祿識餘中得了證據：「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色簇萃成朵，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這太平花還有不少的吟咏，可惜我都記不上來了。只記得曾經有一個小說家即因此寫一部太平花的小說，足見其被重視。在成都這時多極了，原來只是一種土花，庭園不種，或附長於籬笆上罷了。

現在再談談我所喜歡的四川酒，也舉兩種來說：一是郫筒，二是燒春。

風俗錄記載：「郫縣有郫筒池，池旁有大竹，郫人刳其節，傾春釀於筒，信宿，香聞村外，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成都古今記則如此說：「荼蘼花香甚，可以為酒，晉山濤為郫令，以此花釀酒竹中，所謂郫筒酒也。」說法是兩樣，大約前者是「俗」之所謂郫筒酒，至山濤所釀者必更美，我們已無此口福了。我曾經特別到郫縣去飲郫筒，并到郫筒池邊小飲，但并不覺得其美。後來不在郫縣反飲了較好的郫筒，故拙詩有「鷓鴣催我醉郫筒」之句。最近一次在寒食節那天是廖學章先生在少城公園靜寧招飲郫筒，那確是美酒。誦元代丁復錦江詩：「郫筒有酒君莫惜，明日殘紅如雨飛。」那更是令人沉醉了。

其次是燒春，那確是我最常飲而最欣賞的了。我名此酒曰卓文君酒，曾過邛崍親攜數瓶而歸，卓文君酒名近已傳誦一時，并已入友人詩中。采蘭雜志云：「卓文君井在邛州白鶴驛，世傳文君常取此水以釀酒。」此酒在五代時最為文人所喜，韋莊詞有「錦江春水，蜀女燒春」之句。國史補言「酒有劍南之燒春，」註言：「劍南貢燒春，即是物也。」其實原來的燒春恐已變質，但今天邛州的瀘酒確是不錯，俗名賽茅台，頗值得人一醉。邛州學生李松樵等嘗以此餽贈，李以病死，徐生延義殉國南京，我曾以詩弔他們：「一杯瀘酒醉難休，舊恨天涯獨買愁；昨日菽歌今日哭，包家巷口落花溝。」包家巷乃當日講學的地方，這春暮正是柳絮滿溝的時候。

時間已說得很久了，說去說來，已像白居易說的：「花光焰焰火燒春」的時候了。一時也說之不完，我總覺得這種小風趣確可以使我們遙遠神清。主要的則在我們於這個萬方多難，八方烽火之中還安然住在「天府之國」中來談談「天府」之事，實是非常的幸福。可是福是要惜的，不惜福的人是要損福的。惜福的辦法，則只有努力充實自己，更當恢宏志氣。不然，中國除了「天府之國」，還有天堂的蘇杭，還有文化故鄉的北平，還有六朝金粉的南京，這時都怎樣了呢？

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晨七時半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六號

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初版

(沿版)每冊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不許轉載

社長　王雲五

編輯者　蘇繼廎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國立編譯館招考研究生啟事

本館爲養成高級人員分任編譯[illegible]工作特招致曾受高等教育並有服務經驗者[illegible]人由本館[illegible]王雲五先生親自訓練茲將(甲)應選資格(乙)研究及服務時期(丙)待遇(丁)報名手續等條件列左

(甲)應選資格須具備左列各項

一 曾在國內外大學畢業並服務三年以上對所任職務[illegible]

[illegible]

二 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上三十八歲以下者

三 男性而未結婚者

四 身體強健能服勞耐苦者

五 精神體格不[illegible]者

(乙)研究及服務時期

六 研究時期定爲六個月

七 研究期滿[illegible]本館認爲不適於服務者[illegible]外應繼續服務二年以上

(丙)待遇

八 研究時期[illegible]由本館供給[illegible]月[illegible]元服務開始時[illegible]由本館[illegible]另給五百元[illegible]每年[illegible]一次

十 研究期滿經本館決定繼續服務而不願[illegible]或不經本館[illegible]自行[illegible]者應[illegible]研究[illegible]全部[illegible]

(丁)報名手續

十一 應選者應以國文撰自傳三千字以上詳述(甲)家世(乙)[illegible](丙)服務經過(丁)個人[illegible]成功失敗(戊)[illegible]生活及興趣(己)讀書及業餘之消遣(庚)其他有關[illegible]文字選譯一種外國文字選譯[illegible]大學[illegible]本人照片及體格檢驗證書於本年六月[illegible]白[illegible]館[illegible]信封[illegible]報名字樣

十二 本館[illegible]於本年七月[illegible]面[illegible]不合[illegible]面試[illegible]